

國立政治大學
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論文

從現實建構主義分析 1979 年後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競逐

The Analysis of the Post-1979 Rivalry Betwee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rough Realist
Constructivism

指導教授：張景安 博士

研究生：林茵茵 撰

中華民國 111 年 01 月

謝辭

碩士學業即將進入尾聲，在歷經一段時間的寫作後，我的碩士論文終於順利完成。撰寫碩士論文是一項具相當程度挑戰性的任務，在此過程中，需要與自己反覆地溝通對話、整理蒐集到的各式資料，並不斷梳理想法才能清楚地表達相關內容。最終能完成這個艱難的挑戰，首要感謝的便是我的指導教授張景安老師，以及兩位口試委員，崔進揆老師與陳立樵老師。

起初擬定論文方向及內容架構時，景安老師便不厭其煩地與我討論可以進行的方向。在一次次修改後，我的論文主題逐漸聚焦，也漸漸發展出完整的結構。於後續寫作過程中，景安老師亦仔細點出各個可以加強的細節。老師不僅在學術上給我很多專業意見，更重要的是對我的啟發。除了專業知識外，老師不斷精進自我的態度亦是我的學習典範，而我也很榮幸能夠成為老師的指導學生。另外，我也非常感謝兩位口試委員在寫作過程中給予的幫助。兩位老師在一開始便建議許多可以擴充深化的方向，進揆老師給了我許多國際關係領域的專業知識及建議，立樵老師則是以多年研究伊朗的經驗點出更多可深入探討的面向。因此，我由衷感謝三位老師無私地給予幫助，老師們的每項建議都使我的論文更加完整與豐富。

同時，我的家人與朋友在寫作過程中也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每當我的寫作面臨困難時，我的家人總是以不同方式支持並鼓勵著我。而我的朋友則是寫論文過程中的好夥伴，我可以與他們交流寫作心得，或是相互砥礪對方持續前進。感謝中東與中亞研究學程的學長姐及同學、阿文系的同學與學弟妹，以及外交所的好朋友們，因為有朋友們的支持，我在寫論文的過程中一直都不是孤軍奮戰的。從大學到研究所期間，我一直都很感謝政大對我的栽培。在碩士學業結束後，我將邁入新的人生階段，而我也會帶著這段時間吸收到的知識與啟發繼續前行。

茵茵

摘要

1979 年伊朗革命的爆發導致伊朗既有的巴勒維政權被推翻，引發後續中東地區政治格局一系列的轉變。隨著伊朗新政府外交路線轉向，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和伊朗的關係也急轉直下，兩國逐漸發展出在政治及宗教立場相對的競逐狀態。從 1979 年發展至今，兩國競逐程度與擴及領域都有日漸擴大的趨勢，今日其競逐也延伸至區域內的代理人衝突，兩國的緊張情勢又被形容為中東地區的冷戰。

本文將以 Barkin 提出的現實建構主義 (Realist Constructivism) 分析沙國—伊朗競逐架構下的衝突面向及其形成軌跡，並依據現實建構主義框架內權力結構因素、規範結構因素，及兩因素的交互作用解釋沙國與伊朗之競逐發展。藉由以上三個面向的討論，可釐清沙國與伊朗於權力結構因素所生之衝突，以及教派主義對兩國競逐之影響。同時，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之交互作用亦能解釋兩國競逐自 1979 年至今之發展過程。通過前述探討，可發現於沙國—伊朗競逐中，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兼具影響力，且會以不同形式對競逐產生作用。前者以地緣政治影響力競逐為主軸，並衍生於安全及經濟面向之衝突；後者則可見兩國對內及對外政策輸出與教派主義之間存在相互強化之循環。此外，本文亦發現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間存在相互影響之特性，並導致兩國競逐規模自 1979 年起逐步擴大。針對以上發現，筆者認為沙國與伊朗政府應審慎考量以教派主義作為政治權力競逐工具之潛在風險，並減少對教派身份之強調。如此一來，可避免加劇區域不穩定性，亦可防止遜尼派與什葉派國家之衝突進一步擴大。

關鍵詞：沙國—伊朗競逐關係、地緣政治競逐、教派主義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n 1979 led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Pahlavi regime in Iran, triggering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As the Iranian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ies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has also deteriorate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ompeted in terms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aspects since 1979, and the scope of competition has also expanded. Today, some scholars even describe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as the Co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article will use Realist Constructivism to analyze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since 1979. Realist Constructivism contains the power structure, normative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of the two.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normative structure, we can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materi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sectarianism on rival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normative structure accounts for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evolution since 1979.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normative structure are both influential to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and they will play a role in different forms. The former is dominated by the competition for geopolitical influence, while security and economic conflicts are derivative disputes. The latter affects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by a mutually reinforcing cycle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sectarianism. Additionally, the second argument is the existence of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normative structure, which has led to the outspread of rivalry since 1979.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finding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Saudi and Iranian governments should carefully examine the potential risks of using sectarianism as a tool for political rivalry and reduce the emphasis on sectarian identity. In this way, it can avoid regional instability exacerbation and prevent the tension between Sunni and Shiite countries from further rising.

Keywords: Saudi-Iranian rivalry,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sectarianism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8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8
第二節 文獻回顧.....	9
第三節 研究問題.....	28
第四節 分析框架.....	31
第五節 研究方法.....	35
第六節 研究限制.....	36
第七節 章節安排.....	37
第二章 權力結構因素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39
第一節 國家安全問題.....	40
第二節 經濟資源競爭.....	47
第三節 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角逐.....	53
第四節 權力結構因素矛盾對兩國競逐之影響.....	65
第三章 規範結構因素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69
第一節 伊斯蘭教於兩國統治之重要性.....	70
第二節 教派主義對兩國內部政策之影響.....	82
第三節 教派主義與兩國區域活動之關聯.....	88
第四節 規範結構因素矛盾對兩國競逐之影響.....	93

第四章 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互動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96
第一節 1979 年伊朗革命對兩國競逐之推動：雙方規範結構之重大分歧及政治 權力結構之初分.....	97
第二節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對兩國競逐之推動：教派主義成長下雙方陣營的權 力集中化.....	106
第三節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對兩國競逐之推動：教派主義再成長與多國衝突表 象的教派化.....	114
第四節 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互動對兩國競逐之推動.....	122
第五章 結論.....	125
參考文獻.....	129



表次

表一、本文可延伸討論之方向.....	28
表二、沙國與伊朗競逐三階段的發展.....	124



圖次

圖一、教派主義與政策輸出關聯示意圖.....95



第一章 緒論

1979 年伊朗革命後，中東地區的政治情勢產生一連串改變，其中德黑蘭人質危機使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後稱伊朗）和美國關係走向惡化，同時也牽動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後稱沙國）與伊朗關係的變化。隨著伊朗新政府外交路線的轉變，沙國與伊朗的競逐自 1979 年後日漸清晰。在數十年的演變下，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早已不是侷限於兩國雙邊關係框架下的矛盾，其涵蓋領域與地域擴及範圍十分廣泛，使沙國—伊朗之競逐成為足以撼動中東政治局勢之關鍵議題。

對於沙國與伊朗競逐結構下之衝突，可從權力競逐的角度探討造成兩國產生矛盾的原因，也可見與教派相關之爭論出現於兩國競逐中。沙國與伊朗之衝突面向涵蓋物質權力及觀念認同等議題，在兩國競逐關係背後形成一個複雜的結構。本文將梳理沙國—伊朗競逐架構下造成兩國發生衝突的相關議題，並探討雙方競逐關係自 1979 年之發展，以分析沙國—伊朗競逐之形成脈絡。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過往探討沙國—伊朗競逐的相關研究，大多會側重在某個議題說明造成兩國競逐關係的原因，其中又以權力結構因素的論述居多，相對之下規範結構因素的影響力較容易被忽略。然而，在國家對外政策形成的過程中，除了實際利益的考量，觀念及認同等規範結構因素亦具有影響力。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兩國逐漸形成具教派色彩之對抗陣營，這說明教派因素在兩國競逐中存在作用，亦證明

在權力結構因素外仍有其他推動雙方衝突之原因。因此，筆者也將分別從權力結構及規範結構之角度，探討沙國與伊朗之競逐形成。

鑑於過往文獻偏重權力結構因素分析之傾向，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以一個囊括權力與規範因素的視角，去理解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關係。首先，對於偏重以權力角逐解釋競逐狀態的研究而言，本文補充了規範結構因素中教派主義的影響力，使其不再僅是被淡化的角色。而未來在分析兩國競逐狀態時，研究者除了能觀察到國家基於物質權力考量所作出的行為外，還能進一步理解影響這些決策背後的觀念，使規範結構因素的影響力更為鮮明。

此外，本文亦將權力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互動納入討論範圍，而兩者的互動在過去也較少被提及。藉由探討兩因素互動所生之影響力，可以強調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之間其實具有相互影響的特性。由於權力結構因素的影響力比規範結構因素更為明顯，兩者的連動能力也經常被忽略。經討論兩者能相互影響的特性後，可凸顯政府或政治組織過度強調教派認同之潛在負面效果，亦可使大眾意識到其風險。綜上所述，以涵蓋權力及規範結構因素的途徑探討沙國與伊朗之競逐關係，有助於更全面地剖析塑造競逐的各項成因，並了解兩國關係如何在各種因素的堆疊及推動下發展成今日的樣貌。

第二節、文獻回顧

回溯過往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的相關研究，部分學者會側重在兩國於權力因

素的矛盾與競爭，以此作為解釋雙方關係緊張化的論點 (Ighani, 2016 ; Kaddorah, 2018) ; 也有部分學者在兩國的衝突中，探討教派主義在其中發揮的影響力 (Seznec, 2015 ; 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 ; Litvak, 2017) 。隨著切入衝突視角的不同，對於兩國競逐狀態的理解也會隨之改變。例如在偏重權力結構因素作用的研究中，規範結構因素對衝突的影響力相對減弱，在此類研究的結論中，規範結構因素的作用可能被忽略，而權力結構因素的衝突才是造成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之主因。另一方面，納入規範因素的研究肯定教派主義於競逐之作用，認為教派主義思想對於誘發衝突擴大是具有影響力的，在此類研究中，教派主義的角色及作用便與強調權力結構因素矛盾的文獻存在落差 (Robinson et al., 2018) 。

前述例子顯示現有研究在權力及規範因素間各有其側重角度，連帶影響研究者對於競逐狀態的認識，這會導致其探討兩國競逐狀態時忽略另一面向之因素。筆者將針對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之相關文獻進行討論，比較學者採取不同視角分析沙國—伊朗競逐的原因及其優劣勢，並從中歸納出後續可進一步探究的方向，以完整刻畫出造成兩國競逐狀態之因素及其發展過程。然而，沙國與伊朗競逐研究的文獻相當豐富，其關注焦點亦有不同，以下將針對既有研究分成三個與本研究相關之主題進行討論。

第一部分將回顧「沙國與伊朗之競逐」的相關文獻，並探討應納入後續討論範圍的各項因素。過去研究對於沙國—伊朗競逐形成原因之主張，部分強調權力結構因素的作用，認為權力結構因素才是主導兩國矛盾發生的誘因，將教派主義

視為掩蓋權力結構矛盾事實的角色。另外也有部分研究關注規範結構因素矛盾對沙國—伊朗競逐關係之影響，肯定如教派認同、種族議題等規範結構因素的作用。而筆者將根據從各種角度觀察競逐的利弊，歸納出後續應納入考量的各項因素。

第二部分為「權力結構因素之矛盾—沙國與伊朗在不同場域之競逐關係」，討論雙方在權力結構因素中的矛盾。過去研究中提及沙國與伊朗在許多層面都面臨利益衝突，例如石油市場、地緣政治競逐等。通過整合既有研究提及的議題，可以從多個角度探討兩國在權力結構因素層面所累積的衝突，有助於了解兩國在這些議題的相關發展。第三部分為「規範結構因素之矛盾—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之角色及作用」，透過相關研究對於教派主義作用之解釋，可進一步釐清教派主義在兩國競逐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從過去兩國於競逐中與教派主義相關的政策，更可以探究教派主義被應用於競逐之深層動機，及其如何在競逐中發揮影響力之過程。

比較過往沙國—伊朗競逐之相關文獻，可發現三項較為常見之特徵。第一，為強調權力結構因素作用之文獻，且其排除規範結構因素之影響力。在此類文獻中，因其否定教派主義於競逐之作用，故將忽略規範結構因素存在之影響力。第二，是各自從不同議題切入觀察沙國與伊朗之競逐，並以權力結構因素衝突解釋兩國關係之文獻。雖此類文獻對單一議題的解釋較為深入，但同時也缺乏各議題對競逐影響力之比較。第三，部分文獻不否定教派主義之作用，僅將教派主義視為用於政治競逐的意識形態工具。這些研究雖提及教派主義，卻缺乏對其影響力

之深入探討，因此也未能解釋教派主義為何被用於競逐，及其如何產生作用之過程。綜上所述，本文將針對既有研究中提及之權力結構面向衝突進行整合與比較，同時探討沙國—伊朗競逐中教派主義被運用之動機及其作用過程，以梳理權力結構因素及規範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之影響力。

一、沙國與伊朗之競逐

關於沙國與伊朗的競逐狀態，部分學者強調本質上是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競爭，例如 Kaddorah (2018)、Ighani (2016)，他們主張沙國和伊朗競逐狀態最主要是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同時他們也淡化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當中的作用，認為衝突的發生與教派主義並無直接關聯。然而，也有學者肯定其他規範結構因素在兩國競逐過程中之作用，例如 Litvak (2017)、Ostovar (2016)、Windecker 和 Sendrowicz (2016)、Heiden 和 Krijger (2018)，他們提及的規範結構因素包含教派認同差異、國家認同及種族認同，其中又以教派認同的討論最為廣泛，且這些學者指出規範結構同樣具有加劇競逐程度以及推動衝突之作用。

在研究沙國與伊朗權力結構衝突的文獻中，學者分別提到兩國在不同議題上的矛盾。例如 Pasha (2016) 以聯合全面行動計畫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 為核心，探討沙國與伊朗在此議題之發展。於其研究中，作者明確指出沙國將伊朗核協議的簽訂視作危害其國家利益的事件，而美國對此議題的態度也牽動著沙國與伊朗關係的變化。另外，Seznec (2015) 從原油及天然氣產

業的角度，說明沙國與伊朗在經濟面向的競爭。而石油資源作為維繫兩國經濟命脈的重要資源，是支持其國家運轉的核心產業，在兩國的競逐格局下也經常是產生爭議的領域。最後，Ighani (2016) 則提出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是基於地緣政治考量而展開，教派主義在其中僅是加劇衝突的角色；Kaddorah (2018) 也同意沙國與伊朗是地緣政治的競逐關係，與教派主義關聯不大。在以上的研究中，可知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架構涉及到許多面向，即國家安全、經濟及地緣政治。然而若僅以單一面向探討兩者競逐，便可能忽略其他權力結構因素的影響，故將其整合有助於以不同的角度探討雙方產生矛盾的因素。同時，關注權力結構因素作用的文獻相對也會忽略規範結構因素對競逐之影響力，因此共同考量規範結構層面的衝突也能更全面地了解兩國競逐的發展。

學者 Windecker 和 Sendrowicz (2016) 認為沙國與伊朗競逐的根本原因是基於阿拉伯民族與波斯民族的敵對關係以及地緣政治考量，因教派差異在 1979 年以前並未造成雙方衝突，因此今日的競逐也非因教派而起。且在其研究中，作者傾向將教派主義當作雙方號召支持者的工具，並不認為教派主義本身有推動競逐之作用。然而，此研究的推論雖可證明現今雙方的衝突根源並不僅限於教派矛盾，卻不足以將衝突根源歸於雙方的民族差異，因沙國與伊朗的民族差異與教派差異同樣是長期存在的現象。此外，作者提到以教派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論點也可延伸討論，因教派主義既然能作為競逐中動員群眾的工具，便說明該思想對於群眾乃至於政府皆是具影響力的。就此而言，教派主義不但是探討沙國與伊朗競

逐時可加入的規範結構因素面向，還能探究教派主義被應用於競逐中的動機與其產生影響力的過程。

在提及規範結構因素的研究中，教派主義是最常被學者討論的一個議題，因此後續在規範結構矛盾面向也將聚焦於教派主義在競逐中的角色與發展。其中，教派主義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經常被用於動員支持者的工具，因此該概念亦反覆出現於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成為一項被廣泛討論的議題 (Ighani, 2016 ; 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 ; Kaddorah, 2018 ; Kausch, 2018)。自 1979 年伊朗革命後，沙國與伊朗開始在其國家角色定位上產生衝突 (Cerioli, 2018)。Windecker 和 Sendrowicz (2016) 描述伊朗的自我認同是一個擁有光榮千年歷史的文化國家，而非殖民主義的產物，因此伊朗認為海灣地區的自然資源、具有戰略意義的荷莫茲海峽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也宣稱其擁有的獨立島嶼都屬於伊朗。在另一篇 Heiden 和 Krijger (2018) 的著作中，基本上也同意前述關於伊朗的自我定位，並額外指出伊朗也將自己視為穆斯林世界的核心以及對抗西方國家勢力介入中東的領導者。另外，沙國也自視為海灣地區君主國家的保護者、兩大聖城守護者以及穆斯林社群的領導者。由於兩者對於穆斯林社群領導者的角色定位重疊，加上何梅尼革命意識形態的催動，沙國與伊朗展開以教派為基礎的意識形態角逐，進而推動 1979 年以後教派主義的持續發展。

除了教派主義在 1979 年以後凸顯之重要性，其影響力也反映在兩國的政策上。例如沙國政府將其國內的什葉派視為效忠伊朗的第五縱隊，可能對國家安全

造成威脅，因此長期以來沙國對其內部什葉派都具不同程度的歧視 (Wehrey et al., 2009 ; Saab, 2018 ; Neo, 2020)。反之，伊朗內部遜尼派也遭到政府歧視，例如對其擔任公務人員資格的限制，這其中也包含伊朗政府對遜尼派之不信任，擔心其洩漏國家機密 (Lumsden, 2019)。同時，兩國的外交政策亦反映出教派主義之作用，如雙方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戰亂中分別支持同屬教派的武裝團體，在區域競逐中逐漸浮現依教派區分的大致輪廓 (Robinson et al., 2018)。前述案例皆能說明教派主義對兩國政策產出之影響力，也證明其在兩國競逐架構中被考量之必要性。

根據過往的文獻可將影響競逐狀態之原因劃分為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前者包含兩國擴張物質權力時所生之矛盾，後者則涵蓋觀念、認同等非物質因素的影響。從以往沙國、伊朗競逐關係的研究中，可觀察到部分學者主張權力結構因素為衝突主因，排除規範因素之作用，如此便將忽略規範因素對於兩國競逐造成的影響 (Ighani, 2016 ; Kaddorah, 2018)。另一方面，在討論到規範結構因素作用的文獻中，教派主義是較為突出的議題 (Seznec, 2015 ; 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 ; Litvak, 2017)。通過探討教派主義的影響力，可以補足沙國與伊朗在權力結構因素衝突以外的矛盾面向，了解規範結構因素在競逐中的重要性。故除了權力結構因素外，本文也將同時考量規範結構因素，以分析推動競逐狀態形成之原因。

二、權力結構因素之矛盾：沙國與伊朗在不同場域之競逐關係

根據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的研究，雙方在權力結構因素的矛盾與競逐大致呈現在以下幾個方向：第一，國家安全問題；第二，經濟利益糾葛；第三，地緣政治影響力擴張，其中包含與土地主權爭議相關的地緣政治議題，以及兩國在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建構，以下將針對此三面向逐一討論。

2015年7月，在維也納簽署的聯合全面行動計畫，簡稱伊核協定，由美國時任總統歐巴馬推動伊朗與美、中、俄、英、法、德等國簽署，目的在於限制伊朗發展核武，換取國際社會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JCPOA的簽署表示美國和歐洲希望看到伊朗融入國際社會，但海灣阿拉伯國家和該地區其他國家仍擔心伊朗的區域影響力日益增加 (Ighani, 2016)。學者 Teitelbaum (2016, p.3) 指出：「華盛頓對伊朗協議的默許使伊朗成為能快速發展核武器技術的國家 (nuclear threshold state)，不受約束地繼續其軍事彈道飛彈計畫並推進懷有敵意的區域議程，這對利雅得而言意味著歐巴馬總統對伊朗的態度較為友善，而歐巴馬總統稱沙國需要進行改革的評論，或是他認為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需要實現戰略平衡的觀點只會加強利雅得的這種看法。」伊核協定整體而言不僅提升了伊朗在國際上的地位，也強化其在海灣地區的戰略影響力，同時也升高了伊朗與以沙國為首的海灣國家之間的緊張情勢，而沙國未能改變美國的相對優先順序，也破壞了自己與美國的關係，這暴露了沙國自身的弱點，同時也為伊朗所樂見 (Litvak, 2017)。

兩國在經濟資源上的競爭，尤其反映在國際的原油市場上，伊朗與西方國家

達成核協議簽署後，也會加強沙國與伊朗在國際原油市場上的競爭 (Ighani, 2016)。

沙國主導著石油輸出國組織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以石油作為武器，控制國際市場上的原油價格，阻止伊朗以高價出售其生產的原油，形成兩國在另一新面向的競爭。另外，經濟層面的競爭可能會在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以及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當中構成問題，因為其他的海灣國家或許可得利於與伊朗的貿易往來，但這和沙國欲建造一個反伊朗陣營的期望背道而馳。因此，沙國與其他海灣遜尼派國家的立場分歧，可能會進一步造成海灣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內部分裂，如 2017 年爆發的卡達斷交危機，而新興的經濟競爭層面在未來仍會持續發展 (Ighani, 2016)。

沙國在國際原油市場中佔據著領導地位，不論是原油儲量或是生產量都是伊朗的數倍之多。1973 年沙國以石油禁運試圖阻止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雖成功干預了國際油價，卻仍無力改變西方國家的決定。此後沙國緩慢地購買在國內運營的國際石油公司資產，這使沙國政府得以控制其原油運營和銷售，同時保持與國際石油公司的良好關係，此舉使其成為當今石油技術的領導者 (Seznec, 2015)。

由此可見，沙國在國際原油市場中早已站穩腳跟，而伊朗不論是在儲備量或產量上都無法與沙國競爭，且多年來的經濟制裁也使伊朗面臨產能不足的問題。雖然如此，伊朗在經濟層面與沙國相比卻不全然居於弱勢。例如英國石油公司 (BP) 將伊朗列為天然氣儲量的領先國家，認為其有潛力成為僅次於俄羅斯的天然氣第

二大出口國 (Seznec, 2015)。此外，伊朗居於海灣國家石油出口的交通要道，該地理位置優勢也為其提供在競逐中可使用的籌碼。最後，中東地區以外如中國及印度等，都是具有龐大石油需求的國家，考量到國際環境變動及經濟層面之考量，伊朗也有機會與兩者發展經濟合作，以確保其於競逐中不居於劣勢。

在地緣政治競逐層面，沙國與伊朗的競逐已擴及到其他海灣國家與伊朗的領土主權紛爭。例如伊朗與巴林及科威特兩國都有油田歸屬的爭議，另外目前受伊朗管轄的大小通布島 (Greater and Lesser Tunbs) 以及阿布穆薩島 (Abu Musa) 三個島嶼，也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後稱阿聯) 與伊朗之間長期存在的土地主權爭議 (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5)。由於阿聯與伊朗先前對於大小通布島以及阿布穆薩島的相關決議與現況都對阿聯不利，為了在島嶼主權問題上奪得主控權，阿聯也將該議題從兩國爭議擴大為區域競逐議題，即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關係 (Sharifi-Yazdi, 2015)。當此議題進入區域競逐框架的討論範疇，島嶼主權爭議的性質也從雙邊轉為多邊，成為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層面競逐面臨的矛盾之一。

同樣基於地緣政治考量，沙國與伊朗各自在區域內尋求國家或非國家的盟友，並將勢力介入戰亂地區以代理人戰爭的形式擴張其區域影響力。自 2003 年伊拉克戰爭之後，伊朗善用當時權力真空的狀態以及伊拉克當地的龐大什葉派人口，取得伊拉克新政府對伊朗的友好態度，使其地緣政治影響力成功擴及伊拉克，而後形成「什葉新月」(Shiite Crescent)，從德黑蘭經巴格達和大馬士革延伸到貝魯特 (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事實上，什葉新月的概念最早不是由伊朗提

出，而是 2004 年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 (Abdullah II) 為了呼籲遜尼派國家對抗伊朗什葉派力量崛起而使用的新名詞，而這也反映了遜尼派國家將伊朗視為什葉派核心的恐懼。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什葉新月使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勢力範圍自海灣地區一路延伸，經由北側連貫到地中海東岸。什葉新月的核心成員包含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真主黨和敘利亞，而其共同目標則是對抗以色列、美國，以及包含沙國在內支持美國的阿拉伯國家 (Clausen, 2020)。2014 年 9 月，葉門胡賽組織 (Houthis) 佔領葉門首都沙那 (Sanaa) 一事，即被沙國視為伊朗從南部包圍其邊界，對沙國而言也代表伊朗什葉派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張 (Litvak, 2017)。此外，伊朗也支持巴林以及沙國東部省 (Eastern Province) 什葉派教徒的訴求，除了造成沙國與伊朗關係惡化，也進一步深化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歧 (Kaddorah, 2018)。對於以沙國為首的遜尼派國家而言，伊朗不但在地緣政治上聯合了許多什葉派盟友，也正從內部影響海灣國家的穩定性，因此遜尼派國家也在地緣政治競逐的框架下逐漸向彼此靠攏。

自伊朗革命及兩伊戰爭爆發起，海灣阿拉伯國家便以 GCC 作為抵禦伊朗勢力擴張的同盟，例如在 2011 年巴林爆發反政府示威之際，海灣君主制國家便以 GCC 的軍事武裝部隊半島之盾 (Peninsula Shield Force, PSF) 進入巴林，防止伊朗介入巴林事務 (Cerioli, 2018)。沙國在 2015 年聯合九個阿拉伯國家，發起「果斷風暴行動」(Operative Decisive Storm) 干預葉門內戰，並組成伊斯蘭反恐軍事聯盟 (Islamic Military Counter Terrorism Coalition)，其中包含除了伊朗、伊拉克、

敘利亞以外的 41 個伊斯蘭國家。另外，沙國也積極尋求與美國的合作，在美國總統川普任內，沙國在利雅得舉辦了阿拉伯伊斯蘭—美國高峰會，有 52 個穆斯林國家與會，其中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呼籲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孤立，時任總統川普也指責伊朗激起教派衝突與恐怖主義。最後，沙國也將土耳其視為重要盟友，雖然兩者在穆斯林兄弟會、埃及、利比亞革命的議題上有所分歧，但兩國也在 2015 年簽訂了戰略夥伴合作關係 (Kaddorah, 2018)。然而，這並不能稱之為一個穩固的遜尼派陣營，首先是因為海灣阿拉伯國家對伊朗的態度以及反對立場並不一致，例如卡達斷交危機就可以清楚地說明 GCC 內部對伊朗態度的分歧；第二是遜尼派國家內部的歧異，例如沙國薩拉非教派與穆斯林兄弟會的衝突，也可以說明遜尼派內部並不是處於和諧的狀態；第三是土耳其想同時維持與雙方的關係，即使某些時候土耳其可能站在與伊朗對立的立場，但這不代表他打算完全與伊朗為敵，其於沙國與伊朗間搖擺的立場也使其無法成為沙國堅定的遜尼派盟友 (Kaddorah, 2018)。綜合來看，沙國的同盟夥伴雖多，卻也伴隨著內部向心力不足的隱憂，如 GCC 是競逐架構下最核心的遜尼派盟友，但其內部對於伊朗的態度不一，而外部的同盟夥伴也並未與沙國建立起密不可分且堅定的合作關係。

權力結構因素在國際政治中具決定性之作用，因物質利益所生之矛盾也牽動著兩國關係的發展，以往研究個別指出了沙國與伊朗在不同場域中展開的權力角逐，這些矛盾在層層堆疊下使兩國的競逐狀態持續發展至今。然過去研究對於兩國之權力結構因素矛盾大多僅針對單一面向進行探討，或未對其提出的各個面向

深入闡述權力結構因素矛盾與兩國競逐之關聯。故於權力結構因素一章將會整合這些議題進行討論，分析並比較兩國於各議題之物質利益矛盾，說明沙國與伊朗在以上場域之衝突如何影響競逐狀態的發展。

三、規範結構因素之矛盾：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之角色及作用

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關係中，教派主義是規範結構因素中最具影響力的議題，故於本節規範結構因素之回顧將聚焦於教派主義對競逐關係之影響。除了探討教派主義在兩國競逐中扮演的角色，筆者也將進一步探究沙國與伊朗將教派主義應用於競逐之動機，以及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之影響力，以說明教派主義如何造成兩國於規範結構因素層面的矛盾。

對於教派主義之英文翻譯，較常見於文獻中的用法為“Sectarianism”。

Bishara (2018) 曾將“Sectarianism”與“Confessionalism”進行比較，認為“Sectarianism”是指對於特定宗教的狂熱歸屬感，而“Confessionalism”是指對同一宗教內部不同教派的狂熱歸屬感。但就通用的情況而言，討論沙國與伊朗競逐下的教派主義多使用“Sectarianism”描述，指受到遜尼派及什葉派身份影響的政治矛盾，與 Bishara (2018) 所指分屬不同宗教的情況有所不同。考量名稱之通用性，本文將以教派主義搭配“Sectarianism”的翻譯進行闡述，其內涵亦與常見的用法相同，為沙國與伊朗分別主張的遜尼派和什葉派身份認同，及政治競逐中顯現的教派傾向。

學者 Mabon (2017) 指出過去探討沙國與伊朗競爭的相關文獻大致可分為三個研究方向：第一派主張欲分析競逐狀態最好從海灣地區的權力分配以及權力平衡著手；第二派主張研究宗教如何塑造競逐狀態才能對其有更好的理解，且必須先考慮中東地區的教派劃分才能理解區域同盟的結構是如何形成的；第三派則主張結合前兩者的要素，包含內部及外部因素分析，以理解合法性及權力的問題，最終可以解釋宗教如何被應用於政治目的。其中，第一派學者是從權力的角度理解兩國競逐狀態的內涵，偏重認同物質因素所帶來的影響；而第二派學者既然從宗教的角度切入，便表示認同宗教信仰差異對於塑造衝突的能力，但僅從規範結構因素的角度觀察，可能會忽略其他權力結構因素的影響。因此，第三派學者同時結合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因素考量競逐狀態的形成，對於剖析衝突的因素會更加全面。

根據 Mabon (2017) 的分類，第一派由權力切入觀察沙國與伊朗競爭狀態的學者，有些便將這種競逐狀態定義為以地緣政治競爭為本質的衝突，主張地緣政治考量才是造成競逐狀態的根本原因，淡化教派主義的影響力，如學者 Kaddorah (2018) 和 Ighani (2016) 都是持此觀點。依第二派所述只考慮規範因素分析競逐狀態的學者較少見，畢竟很難只談論規範的影響力而不考量權力因素對衝突的作用。第三派同時考慮權力與規範結構因素的研究佔較多數，例如 Litvak(2017)、Windecker 和 Sendrowicz (2016)、Sez nec (2015) 等。雖然在這些研究中多將教派主義視為政治競逐使用的意識形態工具，學者也並未深入闡述教派主義之影響

力，但其可作為教派動員的工具便代表教派主義對於大眾思想是具有號召力的，因此可歸納出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中是有作用的（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Litvak, 2017）。

然而，第三派研究仍有偏重權力因素的傾向，教派主義在衝突當中的角色僅被定為一種被國家使用的「工具」，或是競逐演變出的「結果」，雖其影響力是受到肯定的，但不被認為是造成衝突的原因之一。以往文獻對於教派主義於兩國競逐過程中的角色，較多仍停留在討論其「是否」具有作用，例如上述將其視為工具的研究便是肯定其影響力，但至此尚未能清晰地刻畫出教派主義在競逐過程中的角色及作用。Valbjørn (2020) 指出，除了討論教派主義「是否」具影響力，還能進一步討論國家「為何」要以教派主義作為工具，及其「如何」在衝突中發揮影響力。藉此可以解釋國家推動教派主義的動機，強化教派主義與政治現實的連結；亦能梳理教派主義發揮作用之過程，探討規範結構因素對於國家行為產生的影響，使其角色不再僅以被動的工具型態出現，而是具主動影響國家行為效果的一項因素。

在沙國與伊朗對於自我國家定位的回顧中，兩者都認為自己是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而遜尼派與什葉派的身份更是其主張的重要依據，因此教派議題可明顯見於兩者競逐中（Cerioli, 2018；Heiden & Krijger, 2018）。事實上，兩國的自我定位與教派因素、統治基礎有著更深的連結。首先，沙國的王室在建國初期與瓦哈比主義（Wahhabism）便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其政權依賴瓦哈比主義賦予的統治

正當性以及對王室的認可以維持穩定。Nevo (1998) 提到宗教信仰及對王室之認同是沙國建構集體認同的兩個關鍵要素，而至 1980 及 1990 年代，沙國政府仍持續提倡宗教規範，是因為瓦哈比主義自其建國起一直都是支持王室的關鍵角色，並保證其統治正當性。而 Khan (2019) 也指出，沙國政府至今尚未找到可替代瓦哈比主義的正當性來源，故維護瓦哈比主義地位最高性可視為其維繫統治之必要措施。

另一方面，1979 年伊朗革命後的何梅尼政權則是強調神權政治以及伊斯蘭教的重要性，而其提出由宗教學者行國家管理的模式亦賦予神職人員進入政治核心的機會 (Adib-Moghaddam, 2021)。什葉派信仰在 1979 年以後被定為伊朗的國教，其地位受到憲法明文保障。根據伊朗今日統治政權訂下之國家基本原則，神聖法 (Divine Law) 是其統治正當性與政治權威的唯一來源 (FIDH & LDDHI, 2003)，便說明什葉派信仰是伊朗政府獲得政權正當性的主張依據，因此什葉派信仰的最高性也成為不容挑戰的價值。以上案例顯示沙國與伊朗的統治基礎都與其教派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其直接關係到該政權的正當統治與否，與國家穩定息息相關。同時，在兩國競逐中教派議題也成為攻擊對方統治正當性的利器，如伊朗指責瓦哈比主義及沙國王室的統治是不符合伊斯蘭的，沙國也譴責伊朗政權奉行的什葉派信仰是對伊斯蘭教的偏離和顛覆，並稱其為叛教者 (Heiden & Krijger, 2018)。筆者認為，兩國發展教派主義並在部分政策上帶有教派主義色彩，應是基於教派與其國家統治權力的密切關係，而這也是可進行深入討論的方向，有利於釐清兩

國應用教派主義於競逐中之動機。

關於教派主義如何影響國家作為，及其如何在競逐中產生作用，可透過沙國與伊朗的對內及對外政策檢視。在對內政策方面，兩國的國內少數教派政策都被指出存在歧視問題，如沙國什葉派被國家排除擔任政府要職的機會，伊朗遜尼派也只能從事政府認為國家安全風險相對較低的工作，即金融及農業等職缺 (Majidiyar, 2013 ; Faramarzi, 2018)。其背後原因與兩國政府將內部少數教派視為國家安全威脅有關，而這樣的偏見可視為受到教派主義影響，進而反映在政策上的現象。在對外政策方面，兩國於競逐的過程中逐漸建構起以 GCC 為核心的遜尼派政治同盟，以及伊朗的什葉新月影響力分佈地帶，而兩國在區域衝突中支持相同教派的武裝團體，也可視為受到教派主義影響而產出的外交政策。透過內部及外部政策的探討，可檢視教派主義對兩國國家政策輸出的影響，同時也能反映教派主義對兩國競逐之作用。

教派主義的概念作為一種規範結構因素，在兩國競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於過往的文獻中獲得肯定，但其角色及作用尚有討論空間可使其更為具體。過去的研究為兩國發展教派主義的動機提供了一個方向，而其對內及對外政策也反映出教派主義對國家作為之影響力。本文將以此為出發點探討沙國與伊朗在競逐中使用教派主義之動機，以說明教派議題「為何」會出現於兩國競逐；另外，通過沙國與伊朗對內及對外政策的討論，可說明教派主義「如何」在競逐中發揮影響力，進而成為對兩國競逐具推動效果之規範結構因素。

現有的研究個別為影響沙國與伊朗之間競逐狀態的因素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向，以不同的角度切入觀察也各有利弊。以其作為基礎，筆者認為欲全面地探討沙國與伊朗競逐狀態背後之影響因素，以往文獻仍有再深入探討之空間，以下將針對其利弊及可補充之處進行說明（如表一）。

首先，兩國基於權力結構因素矛盾在不同場域展開的權力競逐，主要的爭議問題可整合為三大面向，分別為國家安全問題、經濟利益糾葛及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競爭。提出這些爭議點的研究都各自以直觀的視角說明引發衝突的原因，但這些論點大多分散於不同研究中，將難以同時比較權力結構因素矛盾的各個面向。此外，僅以物質權力競逐的角度詮釋造成兩國矛盾的原因，相對便忽視了規範結構中觀念對於國家行為之影響力。在考量國家政策以及雙方競逐狀態成因時，以往研究顯示除了權力結構因素外仍包含規範結構因素之影響，若單考慮前者將未能全面考量造成競逐狀態的各項成因，這會導致國家做出決策時的動機被忽略，並對於競逐形成過程的認知產生偏頗，不利於分析國家行為及決策背後的影响因素。鑑於論點相對分散與忽略規範結構因素作用的問題，筆者將整合權力矛盾的不同面向進行比較，同時加入規範結構因素的討論，使兩國競逐推動因素的探討更為豐富。

其次，部分研究雖有討論教派主義之角色，但尚未能解釋規範結構因素推動競逐發展的完整過程。其中將教派主義視為工具的解釋方式，可能使教派主義成

為一種為了強化物質能力目的而被使用的陪襯，便未能注意到其本身影響國家行為的能力。這在探討競逐狀態時可能會低估教派主義之作用，因此需要進一步探究其被使用的動機及作用過程，方能理解教派主義對於競逐之具體作用。根據過去的文獻，兩國強調教派主義概念的動機是有跡可循的，其影響力也反映在部分國家行為上。而筆者將探討沙國、伊朗統治正當性與其教派信仰之關聯，說明兩國應用教派主義之動機；並從其內部及外部政策觀察教派主義對國家行為之影響力，以梳理規範結構因素作用之完整過程。

針對上述可進行補充之處，筆者欲並列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的討論，整合比較過去研究提及兩國在權力結構因素角逐的主要議題，加上探討國家推動教派主義的動機及相關的國家行為，從權力及規範兩方面討論塑造沙國與伊朗衝突的因素。如此一來，可以避免僅考慮單一因素而忽略另一類因素可能面臨的侷限，同時對教派主義於競逐之作用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以完整地描繪出兩國競逐狀態形成之過程，對於競逐狀態也會有更清晰及具體的理解。

表一、本文可延伸之討論方向

面向	討論方向	說明
權力結構因素	國家安全矛盾	整合過往文獻中提及的權力結構因素矛盾，探討並比較沙國與伊朗在這些議題上的利益衝突。
	經濟利益糾葛	
	地緣政治影響力競爭	
規範結構因素	兩國統治正當性與教派之連結	探討沙國與伊朗應用教派主義之動機；即教派問題「為何」在競逐中具影響力。
	兩國對內之少數教派政策	探討教派主義概念對兩國政策輸出之影響力；即教派主義「如何」對競逐產生作用。
	兩國對外之區域外交政策	

來源：筆者整理

第三節、研究問題

本文的研究問題欲探討沙烏地阿拉伯及伊朗之競逐過程中，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之作用。自 1979 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後，沙國與伊朗逐漸在中東地區形成壁壘分明的兩大強權競爭態勢，且兩國的競逐也擴散到區域內其他國家。本文將以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分別探討兩國競逐格局背後造成矛盾的各項因素，最後再以兩結構間的互動總結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如何共同推動競逐狀態的演進。

問題討論的對象定為沙國與伊朗主要涉及兩大面向的原因。首先，沙國與伊朗作為中東地區的兩個區域大國，其關係發展對區域政治形勢具有舉足輕重之影

響力。兩國在土地面積、人口、天然資源及政治影響力等層面，都能相當程度地撼動中東地區的政治局勢。其次，除了兩國本身在區域中的重要性，兩者的競逐關係更是本文將其列為觀察對象的主因。綜觀今日中東地區各地發生的衝突，如敘利亞及葉門內戰等，沙國與伊朗都是極其重要的外部行為者，而兩者的競逐關係更是緊密牽動著中東各地衝突的發展。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觀察，各地的衝突經常被理解為沙國與伊朗的代理人衝突；從教派的角度觀察，沙國與伊朗分別被視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領導國家，其教派主張從單純的教派差異演變至今，已發展成教派主義並出現於各地的衝突中。而教派主義不只反映在沙國與伊朗的內部政策，更隨著兩國的競逐關係延伸到區域衝突中。因此，鑑於兩國關係與區域政治局勢的密切關聯，將沙國與伊朗作為目標對象並探討其關係發展，不但能研究兩大國間的競逐演變，也能以其為脈絡觀察中東地區的政治局勢變化。

時間的設定則定為 1979 年伊朗革命爆發至伊朗總統羅哈尼 (Hassan Rouhani) 任期結束為止，因此前沙國與伊朗在美國的雙柱政策架構下同為美國的合作夥伴，在 1979 年以前兩國的競爭格局尚未明朗化。1979 年伊朗政權易主後，中東區域格局產生劇烈轉變，沙國與伊朗的關係逐漸從合作轉為競爭。隨著何梅尼在區域內宣傳其革命思想，沙國與伊朗的關係趨於惡化，雙方開始在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層面展開競逐。至今沙國與伊朗的競逐已深入區域衝突中，且受教派主義影響，雙方的區域盟友也依教派形成粗略的輪廓。而 1979 年也被多位學者認為是沙國與伊朗關係發生重大轉變的轉捩點，因伊朗輸出反君主制國家之意識形態，對沙

國的君主制政權形成威脅 (Ostovar, 2016; Ahmadian, 2018; Heiden & Krijger, 2018; Kaddorah, 2018; Khan, 2019; Ghoble, 2019)。另外，本文觀察時間結束點定為羅哈尼總統任期結束之際，主要考量到新任總統萊希 (Ebrahim Raisi) 施政路線改變將影響沙國及伊朗之關係發展；加上新冠疫情爆發重創中東國家經濟，而疫情對兩國內政帶來之壓力亦可能導致沙國與伊朗之區域政策轉向。

本文欲探討的權力結構因素意指雙方在物質能力的角逐，其競逐擴及的不同場域主要包含以下三個面向，分別為國家安全問題、經濟資源競爭、以及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角逐 (Seznec, 2015; Ighani, 2016; Teitelbaum, 2016; 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 Litvak, 2017; Kaddorah, 2018)。沙國與伊朗在這些面向的衝突曾在不同的研究中被提及，並被視為引發衝突的爭議點，雙方基於在不同領域累積的矛盾日漸演變成今日激烈的競爭關係。然而，這些產生衝突的議題大多分散在不同研究中，且多會以作為兩國矛盾主因的角色被理解。因此本文欲整合以上提及的面向，避免過於強調某單一因素的重要性，以綜合的視角梳理兩國競爭關係背後的權力結構因素。另一方面，本文也納入規範結構因素的討論，探討教派主義在沙國與伊朗競爭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力。規範結構因素的範疇包含觀念、理想、政治道德等非物質因素 (Barkin, 2003)，關於觀念及認同等因素與一國的國家行為及決策之間的關係，在國際關係領域的不同理論各有主張，不同學者對教派差異因素是否發揮作用也提出不同的觀點。鑑於教派認同的矛盾確實在競逐中為兩國政府所強調，且教派主義的觀念也反映在國家政策上，足以證

明教派主義對於競逐狀態之影響力。本文於規範結構因素之討論將聚焦於教派主義的影響，探討兩國在競逐中強調並捍衛其教派價值之動機，說明教派為何會在競逐架構中成為具重要性之議題。同時，根據沙國與伊朗各自在內政及外交上的決策，可以分析教派主義的思想如何透過政策實施深入社會，以及如何在反覆實踐下轉而成為思想層面的輸入來源，進而在兩國競逐過程中逐漸產生實質影響力。

過去多數討論沙國與伊朗關係的文章傾向以權力結構因素競逐所生之矛盾解釋雙方衝突的根本原因，相對淡化了教派矛盾的影響力 (Ighani, 2016; Kaddorah, 2018)。然而，在權力結構因素之外，沙國與伊朗之間對於彼此教派的敵意亦為探討雙方競逐關係需共同考量之因素，才能避免低估教派主義於兩國衝突之影響力。本文將結合權力及規範結構因素的討論，包含兩種因素在兩國競爭狀態下各自發揮的作用，以及兩者交互作用下會對原有政治格局帶來的影響。藉由以上三個部分的討論，可以具體說明沙國與伊朗在權力結構面向產生的衝突，以及規範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之影響力，最後再以兩者的互動，解釋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自 1979 年以後之動態發展。

第四節、分析框架

J. Samuel Barkin 在 2003 年提出了現實建構主義的概念，主張國際關係學界中的現實主義以及社會建構主義兩者之間是可以相容的。Barkin (2003) 整理了過去主張現實主義及社會建構主義為互相矛盾之觀點，並對其加以探討及反駁，

最後他提出的現實建構主義揉合了現實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的核心概念，以兩者的結合在國際關係領域中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本文將以 Barkin (2003) 所提出的現實建構主義作為研究問題的分析框架，首先將國際關係領域中的現實主義、社會建構主義與現實建構主義進行比較，說明本文選用現實建構主義之理由，再闡述現實建構主義概念的相關內涵，及如何將其應用於本文之問題探討。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典範，其下又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派別，Barkin (2003) 針對現實主義下的各個派別，整理出四點現實主義最普遍的共通點。第一，以「權力」作為最主要的研究標的；第二，「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因國家是使用權力的主要行為者；第三，「理性」，指國家應理性的運用權力；第四，「物質能力優先」的假設。從上述特點觀察，現實主義以權力作為討論核心，且與物質能力緊密連結。若採用現實主義作為本文研究問題分析框架，會使討論偏向物質能力競逐的方向，無法同時兼顧權力與規範對於兩國競逐狀態之作用，亦未能解釋兩國在選擇區域盟友時而隱含教派主義概念的現象。故現實主義對本文之研究問題未能提供完整的解釋，僅能說明部分構成兩國競逐形成之原因。

另外，社會建構主義強調觀念及文化才能真正反映國際體系的內涵及特徵。根據社會建構主義所提出的互動模式，國家認同會決定其如何界定國家利益，據此展現出的行為在國際上與他國進行互動後，互動的過程又會重新建構其國家認同。以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國家的行為深受非物質因素的影響，然而中東地區的政治同時卻也帶有現實主義的色彩，因此社會建構主義亦無法完整解釋本文研

究問題。例如在沙國和伊朗的代理人衝突中，雖然雙方的核心盟友多為同教派的國家或組織，但伊朗仍可能與遜尼派的團體達成合作，如巴勒斯坦的哈瑪斯。這反映出沙國與伊朗在選擇區域政治盟友時，教派同質性並非首要考量，亦證明教派認同對兩國競逐不具絕對主導的能力，故於規範因素以外仍須考量權力因素的作用。

相較於現實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面臨的局限，Barkin (2003) 提出的現實建構主義使兩者的理論內涵得以相互補充，進而回應本文之研究問題。在討論兩理論相容性時，Barkin (2003, p.325) 提到：「主張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不兼容的建構主義者通常會聚焦於現實主義與物質主義 (materialism)、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的連結。」然而，Barkin (2003) 指出物質主義並不是承襲自現實主義，並以古典現實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間的矛盾說明兩者的差異。另外，Barkin (2003) 也認為現實主義者稱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不相容，是因為將美國的建構主義特色套用到所有建構主義上，並以此說明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是可相容的。

Barkin (2003) 的現實建構主義肯定規範結構 (normative structure) 的重要性，即社會建構主義關注的觀念 (idea)、認同 (identity)、規範 (norm) 等問題，且其亦回顧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們的文章，指出古典現實主義也同意道德理想 (moral ideal) 是國際政治研究中必要的一部份。現實建構主義融入古典現實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關注的重點，即權力與規範，並探究規範結構與權力運用之間的關係。Barkin (2003) 以權力結構 (power structure) 與規範結構進行討論，並

指出僅討論任一面向都無法解釋國際環境變動。透過檢視權力結構影響規範結構改變的過程，以及規範結構影響權力結構改變的過程，以兩者的互動才能解釋動態的國際關係變化 (Barkin, 2003)。因此，現實建構主義不但能解釋沙國與伊朗競逐中權力層面與規範層面的矛盾，還能說明兩國競逐關係自 1979 年至今的演變。

另外，承襲自現實主義的特徵，Barkin (2003) 也指出權力在此架構之用途與角色。首先，國家可以運用權力推動其偏好的規範結構，使該規範在國際上處於優勢，故道德是隨環境變動而非普遍存在的。由於權力可用於推廣規範，規範也可被用於追求權力，因此當一國推動某種規範時也可能被視為一種追求權力的自利行為。其次，Barkin (2003) 也提到當接受不同規範的團體發生目標分歧時，他們之間的相對權力 (relative power) 就會變得重要，詮釋者所擁有的權力大小會影響其解釋及推廣規範之能力。由此可見，權力在現實建構主義當中仍然佔據重要的地位，而現實建構主義的目的便是觀察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因素的相互關係。

現實建構主義同時考量權力結構及規範結構因素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及其以兩因素互動解釋國際環境變動的特性可應用於本文之研究問題探討。首先在權力結構因素部分，通過探討沙國與伊朗在不同議題上產生的權力結構矛盾，可以解釋權力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之影響力。其次，在規範結構因素部分，藉由檢視兩國教派與統治權力的關係，以及兩國的內部及外部政策，可說明教派主義概念

於沙國—伊朗競逐關係之作用。最後，將以權力結構及規範結構的互動解釋國際政治變遷之概念，代入沙國與伊朗自 1979 年至今的競逐狀態演變，沿著競逐發展過程中的三個重要轉捩點（1979 年伊朗革命、2003 年伊拉克戰爭、2011 年阿拉伯之春），可分析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互動如何自 1979 年後持續推動競逐狀態的發展。

第五節、研究方法

考量到資料搜集的難易程度與議題的特性，本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資料來源會以二手資料為主，筆者將蒐集與沙國—伊朗競逐議題相關的文獻，如英文專書、期刊、研究機構報告，以及研討會的發表論文等，再將其進行整理。此外，若是談及兩國政府的態度或是官方曾發出的聲明，也將參考當時的新聞發布或官方網站上的公開資訊。獲取途徑主要則是通過網路搜尋及圖書館電子資料庫，而對於資料來源也將進行篩選，以確保其資訊之可信度。

在後續的過程中，將針對蒐集到的各式材料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歸納與研究。在權力結構因素章節，將比較不同學者針對沙國—伊朗權力結構競逐提及的面向，並從中找出較具影響力且可深入討論的議題，以分析兩國在這些議題上的關係發展。在規範結構因素章節，將從沙國與伊朗政府各自與教派的連結著手，分別整理瓦哈比主義與沙國王室，以及什葉派與伊朗政府關係之相關文獻，從中歸納兩國政府與教派的連結。同時，筆者也將從相關文獻分析兩國對內的少數教派政策

以及對外的區域外交政策，以探討教派主義於國家政策之影響力。最後，在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互動的部分，首先會比較文獻中共同提及的區域重大事件，作為觀察兩國競逐發展的三個時間分段點。接著再從文獻分析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在這三個時間點後產生的轉變，以探討兩因素的互動如何自 1979 年起推動沙國與伊朗的競逐發展。

第六節、研究限制

針對前述所規劃的主題和內容，在後續的研究上可能面臨到兩點主要的研究限制。首先，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後，兩國的競爭升級為代理人戰爭的型態，然而兩國各自與中東北非地區的不同國家或非國家組織都有合作關係。這些組織或國家的數量多且分佈廣，很難逐一在後續進行討論，因此本文主要會聚焦在兩國於阿拉伯半島上的發展，討論範圍不會擴及北非。然而，影響沙國與伊朗關係發展的因素不僅限於與阿拉伯半島相關的事物，故將討論範圍限縮在阿拉伯半島可能會忽略兩者在北非相關活動衍生的效應。

第二，沙國與伊朗同時都是中東地區的重要國家，若要以最貼合該地區的視角來觀察此議題，以阿拉伯文及波斯文的文獻作為主要參考資料將最為理想。然而，受限於語言條件，雖使用阿拉伯文的文獻能以更貼近當地的視角研究此議題，但考量到使用英文材料較不易存在文意理解落差，筆者將以英文的參考文獻為主，輔以部分的阿拉伯文資料。然而，以英文文獻作為主要參考資料來源，可能會受

到文獻原作立場之影響，無法完全以當地的視角研究此議題。另外，使用以英文翻譯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資料，可能會面臨某些用詞或語意表達與原文存在些微落差的問題，無法完全貼合以該語言所欲表達的語境。

第七節、章節安排

對於研究問題之討論，本文將分別於第二、三、四章聚焦於不同層面的探討。

第二章的核心議題是權力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競逐之影響，該章將分為三大議題探討兩國於權力結構因素的矛盾，即國家安全、經濟資源競爭與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角逐。在分析兩國於三大議題的利益衝突後，將針對這三個議題進行比較，整理出權力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狀態之影響。可以發現，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關係中，權力結構因素之作用是以地緣政治影響力競逐為主軸，並衍生於安全、經濟面向等議題之衝突。

第三章的關注焦點是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競逐之影響，而本文的規範結構因素則會聚焦於教派主義。第三章將分為三大部分闡述，第一是沙國與伊朗統治政權與教派之關聯，藉由探討該議題可以嘗試釐清兩國「為何」重視教派議題，即教派主義被運用於競逐之動機。第二及第三部分將從沙國與伊朗的對內少數教派政策及對外區域外交政策入手，分析教派主義對其國家政策的影響力，以說明教派主義「如何」在其競逐中發揮作用。從教派主義被使用的動機，串聯到其如何反映在國家政策上，可解釋規範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產生影響之過程。藉

由以上討論，可發現規範結構因素之作用表現在兩國政策輸出與教派主義流行的循環上；經兩國對內及對外具教派傾向之政策產出，教派主義逐步深化，進而與沙國及伊朗之政策輸出形成一個彼此強化的迴圈。

第四章則會以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之互動切入，將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以三個重大轉捩點劃分為三個不同的觀察階段，分別為 1979 年伊朗革命、2003 年伊拉克戰爭及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在這三個時間點後，會以權力結構對規範結構之影響，以及規範結構對權力結構之影響，說明兩因素的互動下兩國競逐的發展過程。而第四章與前兩章的不同之處，在於以兩因素互動檢視可觀察到競逐演變之過程，藉由各階段的比較也可以發現，在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的交互作用下，沙國與伊朗之競逐於教派主義與兩國地緣政治競逐範圍都有擴大的趨勢。

最後，通過第二、三、四章的討論，可以歸納出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分別對沙國—伊朗競逐之影響，同時兩項因素的互動亦說明競逐狀態自 1979 年起之演變過程。藉上述三章之探討，可得知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皆對沙國—伊朗競逐具影響力，因此需共同考量兩項因素對競逐關係之作用；另外，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亦具相互影響之特性，並導致兩國競逐範圍自 1979 年開始逐漸擴大。對此，筆者認為沙國與伊朗政府需審慎考量以教派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工具所存在之風險，並減少對教派身份之強調。如此一來，可防止兩國在區域內的教派競逐集團繼續擴大而加劇區域不穩定性，同時也可避免激化遜尼派與什葉派國家之衝突。

第二章 權力結構因素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長期以來，沙國與伊朗在歷史、政治、社會、宗教與文化等面向都有其各自的發展脈絡，而今日兩國也分別被視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重要大國。在冷戰時期，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兩國共同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然自 1979 年伊朗革命後，隨著伊朗新政權與過去合作夥伴的關係改變，沙國與伊朗在區域內的競逐也逐漸成形。在國際環境與兩國政策的推動下，雙方發展出日漸龐大的競爭集團，而兩者產生矛盾的面向更是錯綜複雜，如權力競逐與教派認同都是經常被提及的議題。為避免教派因素的作用模糊沙國與伊朗之間實際存在的利益衝突，本章將先從權力結構因素著手，探討兩國於權力結構面向發生之衝突，並針對這些議題進行討論與比較，以釐清權力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造成之影響。

沙國與伊朗的權力結構矛盾面向可分為三個部分討論，分別為 (1) 國家安全問題、(2) 經濟資源競爭以及 (3) 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角逐。國家安全問題向來是一國存續之關鍵，此部分將會談及伊朗核子計畫的發展以及聯合全面行動計畫對於兩國關係的影響。聯合全面行動計畫簽署所產生之政治效應對沙國而言象徵其地緣政治影響力將面臨更大的威脅，而這也加劇兩者於安全議題上的矛盾。經濟資源議題將聚焦在兩國於石油資源的競爭與衝突，雙方在石油市場各自具競爭優勢，而其地緣政治競逐也會反映在經濟議題上，成為衍生的矛盾面向。在地緣政治層面的矛盾可從三個議題觀察，分別為領土主權爭議、地緣政治影響力框架的建構與兩國於葉門內戰的發展，以說明沙國與伊朗如何建構其地緣政治影響

力及相關的衝突議題。藉由以上的探討，可觀察到沙國與伊朗在權力結構因素的矛盾以地緣政治競逐為主軸，並衍生出其他於安全及經濟面向的衝突事件。在此結構下，權力結構因素結合了各個議題的爭議，成為影響沙國與伊朗競逐的一個衝突面向。

第一節、國家安全問題

就歷史發展觀察，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是近數十年才逐漸受到關注的議題，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前，兩國的關係多被定調為合作關係，當時其互動主要是基於美國雙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的框架。冷戰期間，特別是尼克森政府時期，美國鼓勵伊朗和沙國合作以抵禦來自蘇聯之威脅（Ahmadian, 2018），故在冷戰的時代背景下，沙國和伊朗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維繫影響力的重要盟友，與其共同抵抗蘇聯的勢力擴張。

而1979年伊朗革命與革命後德黑蘭人質危機爆發所帶來的後續影響，使1979年成為往後中東政治局勢發展的重大轉捩點。1979年後，伊朗與沙國的合作模式結束，同時中斷了伊朗與美國的伙伴關係，此後沙國和伊朗的關係也逐漸惡化（Ahmadian, 2018；Heiden & Krijger, 2018）。1979年的革命雖然並未對區域局勢帶來立即性的顛覆，但伊朗國家內部權力結構重組所衍生的影響卻隨後漸漸滲透到區域內的其他國家，也改變了伊朗與西方強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在區域層面，伊朗革命的成功讓伊朗嘗試在其他中東國家複製革命，例如伊朗鼓勵伊拉克

民眾推翻海珊政權的統治。距離伊朗最近的海灣君主國家也因其輸出革命倍感威脅，導致沙國與伊朗關係逐漸惡化。在與西方強權的關係上，伊朗革命為美國原先在中東的戰略部署帶來強烈的衝擊。當伊朗不再是美國密切合作的區域夥伴，甚至是敵對關係後，西方國家對許多議題的態度也發生轉變，例如在後續幾十年中持續牽動著區域及國際安全的議題——伊朗的核子計畫，而這也是今日沙國與伊朗競逐中的一項重要議題。

一、伊朗核子計畫的發展

事實上，伊朗的核子計畫可以追溯至冷戰時期美國的政策。1953 年艾森豪總統在聯合國發表「原子能和平用途」(Atoms for Peace) 的演說，主張將核子材料用於追求全人類的和平。1957 年到 1973 年這段期間是伊朗第一次接觸到核子的世界，且正是艾森豪總統在 1953 年提出的原子和平計劃使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進入核子時代 (Homayounvash, 2017)。1957 年伊朗和美國簽訂核子協議，這對伊朗而言是可大幅拉抬其聲望的成就；另雙方對此也寄予不少期待，希望該協議在未來能引領兩國在核能領域合作的深化，同時也使伊朗可在原子和平計畫的框架內發展自身的核子科學技術 (Homayounvash, 2017)。

1974 年伊朗原子能組織 (Atomic Energy Organization of Iran, AEOI) 成立，並計劃在未來建立 20 座核子反應爐。這項戰略受到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例如美國、法國和德國，德國當時也和伊朗簽訂協議，助其在布什爾建造核子反應爐

(Khalid & Hashmi, 2020)。然而，1979 年伊朗革命全然改變了伊朗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原先支持伊朗核子計畫的國家也轉為反對者 (Khalid & Hashmi, 2020)。由於與伊朗趨於惡化的關係，伊朗掌握核子技術成為令其他國家忌憚的一項事實，不僅美國擔心伊朗會脫離其軍事影響範圍，海灣國家更是首當其衝。對沙國而言，伊朗革命帶來的不只是合作盟友的政權終結，更是出現了未來可能威脅其國家安全的一大隱患，很顯然沙國並不樂見伊朗新政權的誕生，伊朗革命遂成為兩國從合作轉為競爭型態的分界線。

雖然革命後的伊朗新政權曾一度中止核子計畫，但 1980 年爆發的兩伊戰爭又使其認為有必要持續推動核子計畫以保障自身安全 (Pasha, 2016; Khalid & Hashmi, 2020)。這背後的原因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首先，在 1979 年後美國便希望能推翻伊朗的神權政治，變相使伊朗在日後更積極掌握核子技術 (Pasha, 2016)；其次，兩伊戰爭中支持伊拉克的國家佔多數，包含海灣阿拉伯國家以及美國，這也讓伊朗在國際上的地位受到排擠；最後，兩伊戰爭中伊朗受到的打擊及傷亡，使其確信國家仍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威懾 (Khalid & Hashmi, 2020)，於是伊朗又再度投入核子科學的研究。另一方面，沙國也在 1981 年與其盟友共同成立海灣合作理事會，其成員包含在海灣地區同為君主制的六個阿拉伯國家，以「安全」為關注焦點。GCC 不僅是海灣君主制國家為了維護國家穩定達成的聯盟，也是沙國為了鞏固其區域地位所號召成立的組織。在此框架下，成員們共同對抗伊朗輸出革命帶來的社會動盪，以及其他可能威脅到成員國安全的國家。時

至今日，GCC 仍然是海灣阿拉伯國家間合作的重要平台，合作範圍也從安全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

1980 年代沙國與伊朗的關係緊張，至 1990 年代方有所緩解，為了使伊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伊朗的拉夫桑賈尼（Hashemi Rafsanjani）和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政府通過外交緩和區域的緊張局勢並加強伊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然此時兩國關係確實得到緩解，彼此間的競爭卻並未終止（Ahmadian, 2018）。2005 年，得到伊朗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意（Ali Khamene'i）支持的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當選伊朗總統，強硬派領袖對於核子計畫的立場也趨於強硬（Pasha, 2016），導致伊朗和美國的關係再次惡化。艾哈邁迪內賈德的路線引來更多西方國家的制裁，造成伊朗的經濟形勢更加疲軟，後遭到國內反對，最後在 2013 年總統大選時由改革派候選人羅哈尼贏得選舉。在核子計畫的議題上，羅哈尼成功通過外交途徑與 P5+1 國家（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德國）達成協議，以換取減少西方國家對伊朗的經濟制裁（Khalid & Hashmi, 2020）。

二、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CPOA）的影響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考慮到過去的制裁並沒有阻止伊朗停止推動核子計畫，許多國家開始主張通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伊朗與西方國家的談判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 2013 年伊朗和歐盟才簽署聯合行動計畫（Joint Plan of Action, JPOA）。

JPOA 是一項臨時協議，歐盟承諾暫停部分制裁，伊朗則同意暫停高濃度鈾濃縮活動，而 2014 年 JPOA 的實踐也預告著雙方在未來達成協議的可能性 (Pasha, 2016)。2015 年，在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推動下，P5+1 國家和伊朗最終完成聯合全面行動計畫 (JCPOA) (又稱伊朗核協議) 的簽署，該協議的目的在於透過限制伊朗的鈾濃縮活動以減緩其核武技術的發展，並由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進行核查確保伊朗遵守規範；另一方面，美國和歐盟也會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使其能重返國際社會。

JCPOA 的簽訂最主要是基於西方國家對伊朗核問題的疑慮，其宗旨也在於消除伊朗的核武威脅，按理說 JCPOA 同時也能限制伊朗以核武威脅沙國國家安全的可能性。然而沙國並不滿意 JCPOA 的簽訂，且該協議簽署後沙國與伊朗之間的激烈競爭也未見和緩。沙國政府公開的聲明雖表示其支持美國與伊朗簽訂協議，但公眾輿論的態度卻並非如此。例如 Al-Hayat 和 Asharq al-Awsat 的報導對核協議皆是持批評的態度，沙國王子 Turki al-Faisal 和一些戰略分析者也批評美國和伊朗簽署協議是拋棄 GCC 盟友的行為 (Pasha, 2016)。

關於美國歐巴馬政府的立場，多有學者認為歐巴馬總統對伊朗的態度較為友善，相對沙國在協議後的戰略重要性降低也造成海灣阿拉伯國家產生被美國拋棄的危機感 (Ayoob, 2015 ; Teitelbaum, 2016 ; Ahmadian, 2018 ; Kabalan, 2021)。在 JCPOA 簽署前，西方國家對伊朗實施多年的經濟制裁，卻一直無法迫使伊朗放棄其核計劃，故歐巴馬政府改以外交談判的方式，尋求解決伊朗核威脅的途徑。

同時，學者也指出沙國對於美國之重要性降低可能與美國國內頁岩油與天然氣產量提升有關 (Pasha, 2016)。自 2009 年至 2015 年間，美國的原油產量逐年穩步提升，從 2009 年的 3.2 億公噸成長至 2015 年的 5.6 億公噸，頁岩油產業的成長降低了美國對海灣阿拉伯國家原油的依賴，進而改變美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間的關係。此外，在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席捲中東北非國家之際，歐巴馬政府支持突尼西亞、埃及和葉門的群眾抗議，其立場與主張壓制革命的沙國不同，也因此引起沙國對美國政府的不滿 (Ahmadian, 2018)。最後，沙國也不滿歐巴馬政府一改以往優待美國盟友的政策，以及美國轉而推動中東國家之間權力平衡之作法 (Ahmadian, 2018)。

美國原油產量的提升弱化其與沙國等海灣國家的連結，加上歐巴馬政府的政策轉向更累積美國與沙國間的矛盾。雖沙國官方表示支持 JCPOA 的落實，然該協議並未被沙國視作能夠維繫區域安全的談判成果，反而更像是美國在沙國與伊朗間做出不利於沙國的選擇。學者 Rezaei (2018, p.182) 指出：「對沙國菁英來說，JCPOA 代表美國願意以犧牲與中東阿拉伯國家的聯盟作為代價來容忍伊朗的擴張主義。」。這說明了 JCPOA 不但未有效地打消沙國對伊朗發展核武的疑慮，也未能緩和兩國在安全議題上的矛盾。學者 Pasha (2006) 同樣指出核協議簽署所生之政治效應不利於伊朗與沙國之雙邊關係，且有部分沙國王子公開表達對於 JCPOA 的疑慮，認為核協議並不會改變伊朗在區域內的作為，例如其在黎巴嫩、敘利亞和葉門動搖當地政治穩定的行為。

沙國王子 Turki al-Faisal 曾表示若伊朗突破限制則沙國也將走向核武 (Pasha, 2006)，且沙國也被認為是核武可能擴散的國家，因為沙國已有核子基礎設施，且與巴基斯坦關係密切，有可能直接向其購買核武 (Rezaei, 2018)。歐巴馬政府為了防止核武擴散至沙國，便為沙國升級愛國者反導彈防禦系統 (Patriot anti-missile defense system)。然而，提升沙國的防禦能力也並未減緩沙國與伊朗在安全議題上的矛盾，雖然 JCPOA 限制了伊朗使用核子武器的能力，但兩國持續進行的地緣政治競逐卻不斷地激化雙方的矛盾。

根據部分沙國王子表示 JCPOA 無法有效限制伊朗區域作為的評論，可知沙國所求並非僅是限制伊朗的核武開發能力，除了確保伊朗無法以核武威脅自身國土安全外，沙國還希望能維持自身在中東北非地區的區域影響力，因此區域權力結構的變動也被沙國解釋為伊朗的「擴張主義」。可見對沙國而言，安全問題的範圍不僅侷限在沙國本土，還擴及到其區域影響力的保障，任何危害其中東地區領導者地位的事件也會在安全層面與之發生衝突。這便可以解釋為何 JCPOA 限制了伊朗軍事能力卻不為沙國所樂見，一方面是因為核協議並不能限制伊朗在區域內的行動，另一方面是對沙國而言，JCPOA 更明顯的指向是美國的立場偏向伊朗，這種被拋棄感和危機感為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添上一些不可控的變數。

隨著美國國內的政黨輪替，美國前總統川普及現任總統拜登對 JCPOA 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前總統川普對伊朗的態度較為強硬，且在其任內美國政府與沙國關係密切，更在 2018 年宣布退出核協議並重啟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伊朗也開始

拒絕遵守核協議的規範。現任總統拜登則主張重返核協議，但 2021 年伊朗總統大選後由保守派萊希當選總統，目前雙方就伊朗核子計畫尚未達成一致，JCPOA 未來的約束力也尚未明朗。整體而言，沙國和伊朗在安全層面的矛盾除了沙國對伊朗核武技術的擔憂之外，還牽涉伊朗在區域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擴張行動，而 JCPOA 的後續走向也將影響兩國在安全議題上的發展。

第二節、經濟資源競爭

海灣地區的產油大國，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伊朗等，其經濟體的收入來源有一大部分是來自於石油出口，而這些產油大國同時也符合食租國家 (rentier state) 的特徵。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中，石油租金 (oil rents) 是重要的收入來源，而「租金」的概念可泛指擁有一切天然資源所得的回報 (Beblawi, 1987)。關於食租國家的定義，Beblawi (1987) 指出了幾項特點：第一，沒有純粹依賴租金的經濟體，一個食租經濟體的界定是指其租金的部分較其他部門更佔優勢；第二，食租經濟體仰賴大量的外部租金，而外部租金在規模足夠龐大時便足以維持經濟運轉，且不需要依靠國內其他的生產部門創造收益；第三，食租國家只需少數人投入該項租金的生產，就能將收益分配給大多數人使用；第四，食租國家的政府是外部租金最主要的接收者。海灣地區產油國的原油資源頗豐，經濟結構也高度仰賴石油出口，因而被劃分在食租國家中。然而，食租國家也面臨到經濟結構單一及生產製造部門較不成熟等問題，需進行經濟多元

化改革以避免高度依賴石油市場所帶來的風險。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8 年沙國的石油租金佔其 GDP 的 28.86%，伊朗的石油租金佔其 GDP 的 20.4%，相較於全世界的平均數值為 1.5%，中東北非地區的石油租金則是佔 GDP 的 19.1%，指出該地區的石油生產在經濟活動中是相當重要的一部份。而石油作為沙國和伊朗的重要經濟來源，在兩國的競逐中也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Mabon (2017) 在回顧 Mason (2014) 的著作時提到，石油多方面地影響著沙國與伊朗的競逐，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石油輸出國組織、中東地區的代理人衝突以及國際社會。另外 Fattouh (2021) 也指出石油在沙國的經濟中，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也是決定沙國對外關係的一項關鍵要素。

石油在當今國際環境中依然居於無法取代的地位，因其推動著各國運轉，也成為各國爭相掌握的資源。在沙國及伊朗的競爭中，石油的重要性也使其往往牽動兩國於經濟面向的矛盾，如同 Mabon (2017) 和 Fattouh (2021) 所提及的重要性，石油資源往往牽動兩國於經濟面向的矛盾，在其對內及對外關係也具關鍵性的影響力。首先就國內層面而言，石油收入是兩國推行內政的重要財源，不僅是帶動國家發展的主要動力，也與其社稷的安定息息相關 (Watanabe, 2014)；就區域層面而言，石油出口收入牽涉到兩國在區域內活動的經濟來源，而區域活動則包含兩國在他國的代理人衝突，或是透過經濟援助他國政府以維持或擴大影響力；最後，就國際層面而言，石油也決定了沙國與伊朗和世界大國間的關係，如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因石油不僅是產油國的經濟命脈，也是世界大國產業發

展的動力來源，石油市場的變化如油價波動及石油進出口協議等決定了沙國、伊朗與其他大國的關係，也進而影響兩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簡單來說，石油不僅維繫沙國與伊朗國內的經濟運作，也串連了兩者與國際社會的關係，石油市場的任何波動對全世界而言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

一、沙國與伊朗在石油產業的競爭力

1960 年石油輸出國組織在巴格達成立，創始會員國包含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內瑞拉，後續有其他產油國加入，至今已有 13 個成員國。據美國能源信息署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的資料顯示，2020 年世界前十大產油國中，有五個國家為 OPEC 成員，分別為沙國、伊拉克、阿聯、伊朗和科威特，而這五國的石油產量一共佔世界總產量的 25%。OPEC 作為對全球石油市場影響力最大的國際組織，沙國作為其主導者對世界原油的生產活動自然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例如在 1973 年贖罪日戰爭中，以沙國為首的國家為了打擊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戰爭中支持以色列，便宣布石油減產及禁運，最終導致油價暴漲，衝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情況，而本次石油危機更被形容為歐洲國家自二戰以來面臨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Mabon, 2017)。

時至今日，OPEC 依然是能有效主導油價走勢的國際組織，沙國也仍是對油價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例如在 2020 年初，沙國與俄羅斯對於減產無法達成協議而展開價格戰，在 OPEC 的增產壓力下，雙方最終達成減產協議。沙國在石

油市場的優勢是其與伊朗競逐的一項重要籌碼，因為沙國可以石油作為武器，以拒絕減產的方式防止伊朗以高價售出石油，故就石油層面而言，沙國可以透過控制產量達到打擊伊朗經濟的效果（Ighani, 2016；Mabon, 2017；Even & Guzansky, 2019）。沙國除了具主導 OPEC 的優勢外，其原油的生產規模比伊朗大，且生產成本較低，整體而言沙國在石油生產是較佔優勢的（Seznec, 2015）。然而，維持低油價的策略雖然能減少伊朗的國家收入，但因產油國經濟對石油的依賴性，長期的低油價勢必引起其他產油國反彈，且沙國本身也會受到影響，所以這並非可長期使用的策略，僅能作為短期的競爭手段。

雖然如此，伊朗在石油的競爭中也並非完全處於弱勢。伊朗的地理位置為其提供了良好的戰略條件，其南部連接荷莫茲海峽，是控制海灣國家石油出口的主要通道。在美國前總統川普對伊朗的極限壓力政策（Maximum Pressure）下，伊朗時任總統羅哈尼對美國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的行為曾威脅要關閉荷莫茲海峽，並稱：「如果美國想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將會沒有石油能從波斯灣出口」（Reuters, 2018）。如果伊朗關閉海峽，將會影響自身與海灣國家的出口活動以及全世界的能源供給，也極有可能激化伊朗與美國的衝突。對於羅哈尼的主張，雖然關閉海峽對伊朗而言不是正常情況下的優先選擇，然其扼守海灣咽喉的地理位置確實賦予伊朗重要的戰略價值。

在國際上，雖然伊朗在 2018 年美國退出 JCPOA 後又遭到新一波制裁，但其仍有其他的合作對象。如中國和印度有龐大的石油需求，強烈的經濟誘因也將會

促成兩者與伊朗合作的意願。沙國曾試圖說服中國和印度不要向伊朗進口原油，但沙國的主張卻不足以說服他們放棄向伊朗購買原油。對中國而言，在沙國與伊朗的競爭中若伊朗成功擴大影響力，等同削弱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因此中國並沒有與沙國共抗伊朗的動機；對印度而言，沙國和其競爭國巴基斯坦擁有長期且密切的合作關係，當沙國與印度關係拉近時馬上就引起巴基斯坦的關注，再加上中、印兩國的經濟誘因，兩者都不會成為沙國對抗伊朗的堅定盟友 (Mattis, 2010)。2021 年 3 月，中國和伊朗簽下長達 25 年的合作協議，這項協議將伊朗納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伊朗將出口原油至中國，而中國協助伊朗興建電信網絡、醫院及地鐵等基礎建設。中國和伊朗的協議成為兩國共同應對美國制裁所達成的戰略聯盟，對伊朗而言，與中國合作將加強伊朗與中國於經濟面向之互動，而協議帶來的鉅額投資對其國家經濟亦有正面助益 (陳立樵，2021)。

二、沙國與伊朗的衝突與挑戰

沙國與伊朗在石油資源的競爭除了表現在下游銷售端以外，有時也反映在上游的生產端。2019 年 9 月 14 日沙國的產油設施遭到無人機襲擊，其中包含位於阿布蓋格 (Abqaiq) 的煉油廠 (也是世界最大的煉油廠)，以及胡賴斯 (Khurais) 的油田，是 1991 年海灣戰爭後最嚴重的一次攻擊。這次的襲擊造成沙國每日的原油產量減少 570 萬桶，大約相當於其一半的產能，不僅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也造成國際油價飆漲。對此事件沙國並未直接指控伊朗，反而是美國聲稱伊朗為幕

後黑手，最後是葉門的胡賽組織承認犯下此次攻擊。無人機襲擊油田事件被視為是伊朗對美國極限壓力政策的反擊，同時也與沙國介入葉門內戰有關（Guzansky et al., 2019）。這說明了沙國與伊朗在經濟層面的衝突與雙方於區域內的代理人衝突相關，此案例便可視為地緣政治競逐衍生於經濟面向的衝突事件。關於攻擊事件中伊朗與沙國態度的分析，學者認為沙國不指控伊朗是考量到和伊朗間的軍事差距¹，且沙國不確定美國對其的支持程度，因此避免直接升高與伊朗的衝突；另外，此次事件亦說明伊朗有足夠能力重創沙國石油產業，且沙國在葉門內戰中展現的軍事實力和美國猶豫的態度也間接鼓勵伊朗加強其在海灣地區的活動，瓦解海灣君主國家的防線及其對美軍的信任（Guzansky et al., 2019）。

最後，2020 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在沙國和伊朗國內造成嚴重的衝擊，也為沙國與伊朗的競爭格局帶來一些改變。從沙國方面來看，沙國受到疫情的嚴重打擊，截至 2021 年底其國內確診人數已突破 60 萬人。為了防止疫情擴散，沙國驅逐了上千名外籍勞工，勢必會造成勞動力流失。而伊斯蘭世界中每年最重要的活動之一——朝聖，每年都會為沙國帶來世界各地大量的旅客，但受到疫情各國限制人員流動的影響，大幅減少沙國通過朝聖活動能流入的觀光收入。最後在 2020 年初，沙國與俄羅斯的石油價格戰造成油價大跌，隨後疫情造成全球石油需求減少更讓油價再度下跌，對沙國經濟帶來嚴重的衝擊（Brew, 2020）。在伊朗

¹ 2021 年全球火力（Global Fire Power, GFP）報告中，伊朗排名為全球第 14 名，沙國排名則是第 20 名。

方面，原先美國的制裁已經讓伊朗的石油出口減少，所以在疫情期間伊朗在石油出口上受到的影響反而較小，但同樣也是因為制裁導致伊朗面臨疫情時有醫療器材短缺的問題，其國內同樣也飽受疫情肆虐的困擾（Brew, 2020）。

沙國和伊朗近兩年都面臨不同的外部挑戰，在其對外政策卻反映出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Brew（2020）指出，伊朗的作法是升級與沙國及美國的衝突，但仍維持在避免全面開戰的程度，例如胡賽組織在 2019 年攻擊沙國油田的行動便視為伊朗激化衝突的決策；而沙國則是以國內的政治穩定為首要考量，且正在試著從區域衝突中脫身。兩國在區域代理人衝突中一進一退的差異，使伊朗有更多的空間可向外發展其影響力。而未來疫情所帶來的壓力將會迫使兩國將資源投入國內發展，或是趁其對手分身乏術之際穩固自身地緣政治影響力仍未可知，其執政者決定的政策優先次序都將牽動著中東地區局勢的變化。

第三節、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角逐

「地緣政治」一名詞最早是由瑞典學者 Rudolf Kjellén 提出，在多數西方學者的觀點中，地緣政治是一門與歷史、地理及政治相關的科學（Haggman, 1998）。而本文所討論之地緣政治因素將以地理位置為基礎，探討沙國與伊朗於此面向產生之政治衝突。在研究沙國與伊朗競逐的相關文獻中，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重要性一再被強調，也有學者主張地緣政治考量才是主導兩國競爭格局發展的因素（Barzegar, 2008；Ighani, 2016；Kaddorah, 2018）。自 1979 年開始，兩國的地緣

政治競逐首先反映在伊朗以散播革命思想擴大影響力的作為，以及海灣遜尼派國家對伊朗影響力之圍堵。而後沙國與伊朗逐漸發展出各自的區域盟友，且兩者的競逐也隨著區域衝突的陸續爆發擴大到其他國家。就兩者的地緣政治矛盾而言，這不僅與兩國的關係有關，還涉及到整體區域國家的未來發展。

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層面的矛盾可分為三個面向觀察，首先是（1）領土主權爭議、（2）兩國地緣政治影響力之建構，以及（3）兩國在區域活動發生的衝突。關於領土主權爭議，起初雖為阿聯與伊朗的雙邊議題，然而隨著阿聯將該議題區域化以及沙國—伊朗競逐的發展，其領土主權爭議逐漸成為海灣遜尼派國家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競逐標的。針對兩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建構，可以分別從GCC及什葉新月的發展觀察，而沙國與伊朗各自與該框架內的國家或組織合作，是為兩國在地緣政治競逐中的核心盟友。最後，兩國的衝突也表現在葉門內戰的發展，而在沙國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相關議題中也可見到兩國分別以GCC及什葉新月為核心架構展開的雙邊對抗。

一、沙國與伊朗競逐下的領土爭議

本節欲討論的領土爭議將聚焦於阿布穆薩島、大通布島和小通布島三個島嶼，這雖不是直接發生於沙國與伊朗之間的土地主權爭議，卻已然被囊括在兩國競爭的框架之下。首先，從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劃分上來看，這些土地主權的爭議確實是屬於沙國主導的國家陣營與伊朗之間的衝突，即阿聯與伊朗的領土主權爭端；

其次，這些領土爭議也被指出不僅是單純的主權糾紛，而是已經擴大為區域競逐的議題，演變成阿拉伯國家與伊朗間的矛盾（Sharifi-Yazdi, 2015）。

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都是位於海灣東部的島嶼，其歸屬爭議可追溯至數世紀以前。1960 年代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的主權歸屬是伊朗與英國政府間在外交上經常產生爭議的問題，而時至今日在英國勢力撤出後，阿聯與伊朗對於這些島嶼的主權歸屬也仍存在爭議。1971 年，在英國的協助下沙迦（Sharjah）和伊朗簽訂諒解備忘錄，規定雙方對石油的利益分配，但針對阿布穆薩島的主權問題則是寫道伊朗和沙迦都不會放棄對該島的權利，也不會承認對方對於島嶼的權利；也就是說備忘錄並沒有解決阿布穆薩島的主權問題。在大小通布島的議題上，伊朗和拉斯海瑪（Ras Al-Khaimah）也未達成協議，但伊朗的軍隊卻控制了大小通布島。對此，英美兩國強烈批評伊朗的行為，阿聯官方也譴責伊朗使用武力控制該二島嶼，但英美兩國和阿聯都沒有對此採取相對應的軍事行動。Sharifi-Yazdi（2015）指出，這可能是英美對於伊朗日漸增長的軍事及外交實力的一種默認，且阿聯官方對此事的反應並不如媒體激烈，伊朗能夠輕易地控制該島嶼也被懷疑是否與其放棄對巴林的主張有關，但卻無證據能證明這項交易存在的真實性。

1980 年兩伊戰爭爆發，受到戰爭及革命的影響，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的問題一度浮上檯面，伊拉克提出應將島嶼歸還阿聯的主張甚至為其在戰爭中贏得多數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伊朗則是堅持不會放棄對島嶼的權利。1992 年伊朗將近百名外國人以不具伊朗簽證為由驅逐出阿布穆薩島，使島嶼的主權爭議再起。

伊朗的行動引起阿拉伯媒體的強烈不滿，一些阿拉伯世界的媒體甚至稱伊朗入侵了阿布穆薩島，媒體激烈的反應更進一步促使伊朗時任外交部副部長 Abbas Maleki 評論道：「阿布穆薩島的新聞報導量比島嶼本身還要大」² (Sharifi-Yazdi, 2015, p.74)。另外，Sharifi-Yazdi (2015) 也提到，伊朗此次的行動被許多西方媒體的分析員認為是 1990 年海灣戰爭後波灣權力移轉的一種反映，因為伊朗希望在伊拉克戰敗後能躋身新的區域強權之列。

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的主權歸屬在英國勢力撤出海灣之際便是懸而未決的議題，亦無明確的條約能支持阿聯的兩個酋長國對島嶼的權利主張。Sharifi-Yazdi (2015) 認為 1992 年事件的發酵是阿聯希望以此為由，在阿布穆薩島議題上為沙迦爭取到比原先備忘錄所約定更優渥的權利，對阿聯而言是一改先前居於劣勢的機會。另外阿聯也試圖將島嶼的爭議國際化，讓這個問題不再單純只是阿聯與伊朗之間的矛盾，將其性質轉為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競逐過程中的關鍵議題。同時，Sharifi-Yazdi (2015) 也指出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的象徵意義已經大於實質意義，除了島嶼本身的經濟及戰略價值，還有其他的附加價值為其帶來更高的討論聲量，例如國家擴張權力的需求。

從阿拉伯國家對阿聯的支持可以看出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的主權爭議

² Boustany, Nora. (1992). *Iran seeks wider Mideast role*.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2/10/12/iran-seeks-wider-mideast-role/6258aa40-7c08-4b9d-b124-8433c17e01e7/>

已然成為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競逐中的一項標的，如 GCC 部長理事會對於伊朗佔據這些島嶼便表示強烈反對³，另伊拉克也曾透過島嶼的主權議題成功聚攏阿拉伯國家在兩伊戰爭中對自身的支持。可見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的議題都具有凝聚阿拉伯國家的力量，在阿聯有意為之下，這也成為在沙國領導的阿拉伯國家陣營與伊朗之間的關鍵領土爭議。這三個島嶼雖面積不大，然在地緣政治中的象徵意義卻不容小覷，如伊朗在 1992 年對阿布穆薩島的進一步掌控便被視為波灣戰爭後的權力移轉。在其性質跳脫出單純的兩國領土糾紛後，該議題在阿拉伯化及國際化的演變下逐漸提升其於沙國—伊朗競逐中的重要性，使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成為雙方在地緣政治的競爭中不能輕言退讓的必爭之地。

二、沙國與伊朗的地緣政治勢力建構及區域活動

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的第二個競爭面向可探討兩國在區域內的地緣政治勢力建構，在沙國方面會以討論海灣合作理事會的作用為主，在伊朗方面則會著重什葉新月的建構及發展，分析兩國如何透過這兩個框架達成與區域盟友的合作。

（一）沙國：海灣合作理事會（GCC）

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是 1981 年由沙國和其他五個海灣阿拉伯國家所組成的

³ Arab Times staff. (2021). *GCC backing for UAE in islands row*. Arab Times. <https://www.arabtimesonline.com/news/gcc-backing-for-uae-in-islands-row/>

國際組織，分別為科威特、巴林、卡達、阿聯和阿曼。當時的時空背景正好是 1979 年伊朗革命以及 1980 年兩伊戰爭陸續爆發的時期，海灣阿拉伯國家在政體上同屬君主制，他們共同面臨到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的威脅，擔憂國內群眾也在本國發起革命，伊朗對於海灣君主國家而言頓時成為最大的安全威脅；另外，兩伊戰爭也為海灣君主國家帶來國家安全的疑慮，各國對「安全」的迫切需求也被視為造就 GCC 成立的最主要原因 (Aljabri, 2017)。

GCC 創立後緊接在 1982 年建立了半島之盾作為抵抗外部威脅的軍事武裝部隊，伊朗和伊拉克被視作兩大造成 GCC 盟國安全威脅的國家，但在 2003 年伊拉克戰敗後，伊朗成為 GCC 最主要的防禦目標。在海灣君主國家中，只有阿曼不將伊朗視為嚴重的安全威脅，因其認為可以透過對話來降低伊朗的威脅性，且阿曼甚至協助伊朗與 P5+1 國家於核子計畫之斡旋，與其他海灣君主國家相比，阿曼與伊朗的關係相對緩和 (Aljabri, 2017)。回到 GCC 成員國對於安全的需求，成員國間深化彼此的軍事及國防合作，致力於制定集體安全策略。在 2000 年麥納麥峰會後，六國最終達成協議規定各自在海灣地區的國防和安全責任，且據此協議，任何外國干涉成員國內政的行為也會被視為干涉理事會的內政 (Aljabri, 2017)。

在成員國的國防合作下，PSF 成為 GCC 框架下保障彼此不受外國勢力侵犯的安全機制，也曾數次參與區域內的軍事行動。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時，PSF 派遣三千名士兵前往支援，但礙於當時對於軍事介入的流程及時機都尚未有

明確規範，所以 PSF 在此次戰爭中並未發揮太大的作用。在 1990 年後，PSF 的軍事及防衛能力才顯現出來 (Aljabri, 2017)。在後續幾次區域內的重大事件中，都能看見 PSF 的重要性及沙國對 GCC 事務的影響力，如 2003 年美軍攻打伊拉克時，PSF 的軍隊駐紮在科威特，防止其受到來自伊拉克邊境的攻擊。另 2011 年巴林受到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影響，國內爆發示威活動之際，沙國與巴林政府便是仰賴 PSF 的軍力穩定情勢。近幾年相對矚目的葉門內戰也與沙國和 PSF 有關，2015 年沙國聯合九個阿拉伯國家在葉門發起果斷風暴行動，阿聯、科威特、卡達、巴林、摩洛哥、埃及、約旦和蘇丹都在其中。沙國稱葉門的胡賽組織是受伊朗政府支持的武裝勢力，因此對其發動軍事攻擊，並欲恢復哈迪政府在葉門的統治。雖然這次的軍事行動並不是以 PSF 的名義，實際上卻有大量的資源來自 PSF (Aljabri, 2017)。這些事件顯現出沙國是 GCC 中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因沙國能主導 GCC 的重要決策以及 PSF 的行動，而其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分佈也在海灣遜尼派國家間形成一個以沙國為核心的地帶。

雖然 GCC 是沙國建構其地緣政治影響力最重要的框架，但 GCC 內部或是沙國與其他所欲聯合的遜尼派國家間卻不能視作一個穩固的遜尼派聯盟。GCC 建立至今，合作的議題早已不限於國防安全的合作，還囊括了其他面向，如政治、經濟、貿易、旅遊等等，相對地沙國與 GCC 成員也更容易在某些議題上產生分歧。首先如前述阿曼對於伊朗的態度，便說明了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阿曼不太可能成為沙國的堅定盟友。事實上許多 GCC 成員國對伊朗的態度也與沙國不

同，例如阿聯與伊朗之間有密切的貿易往來，且伊朗本身也具有龐大的市場潛力，這使阿聯雖在傳統上被認定為沙國的盟友，但同時他也不願意放棄與伊朗的經濟合作 (Beydoun & Zahawi, 2016)。另一個例子則是 2017 年震驚世界的卡達斷交危機，關於沙國主導其他海灣國家與卡達斷交的原因牽涉到許多議題，除了沙國王室與半島電視台的衝突，及卡達支持穆斯林兄弟會等，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因為卡達與伊朗保持良好的關係引起沙國不滿。因此，GCC 成員國雖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沙國的盟友，但細究每個成員國的態度後，其於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將在天平的兩端做出何種程度的取捨仍未可知，相對確定的是 GCC 成員國及該框架在沙國建構其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過程中的確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 伊朗：什葉新月 (Shiite Crescent)

在伊朗方面，與其地緣政治影響力密切相關的議題則是「什葉新月」的成形與發展。2004 年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曾發出警告，稱出現了一個意識形態導向的什葉新月，範圍自貝魯特一路延伸到波斯灣。自此，什葉新月成為一個廣受討論的新名詞。所謂什葉新月是指從黎巴嫩貝魯特開始一路延伸至伊朗的新月形地帶，在此區域的政權或政治組織是以什葉派為主，包含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伊拉克和伊朗，而這也象徵伊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可從地中海東岸橫跨至海灣地區。

對以沙國為核心的 GCC 國家及其他遜尼派國家而言，什葉新月的出現代表

伊朗地緣政治影響力建構逐漸成形，讓這些本來就將伊朗視為一大安全威脅的國家又添了幾分擔憂。Barzegar (2008) 指出什葉新月對阿拉伯遜尼派國家而言潛藏了伊朗的三項野心，其一是動員區域內的群眾，其二是建立一個意識形態取向且友善的什葉派政權地帶，範圍涵蓋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和海灣地區，其三是擴張伊朗在區域內的政治地位及權力。Barzegar (2008) 的研究反映出對於遜尼派國家而言，伊朗是以擴張主義的概念發展及建構什葉新月地帶，同時這些國家也視伊朗為安全威脅，擔心伊朗藉由什葉新月的影響力推翻本國的既有政權或干擾內政穩定。此外，將什葉新月視為一個什葉派意識形態導向的聯盟也會加深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歧，例如強化遜尼派國家政府對於本國什葉派人民的不信任感，長期下來不僅會撕裂什葉派及遜尼派人民的情感，也不利於國家的社會穩定。

自 1979 年伊朗革命後，伊朗便致力於建造一個跨國網絡來支持其區域戰略目標，即反美與反以色列等意識形態之宣傳。在後續中東地區的政治動盪中，伊朗也成功掌握數次關鍵的機會，將其地緣政治影響力一步步擴大至今日的規模。其中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就是改變中東格局的重要因素，在美國推翻伊拉克海珊政權後，原先與伊朗敵對的遜尼派政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伊朗態度友善的什葉派政權。伊朗藉伊拉克政權易主之際，成功將其影響力擴張至伊拉克，也突破了遜尼派國家對其之封鎖。另外，2011 年阿拉伯之春對什葉新月的發展也有不可抹滅的貢獻，在中東北非的民主浪潮下，敘利亞的群眾抗議規模不斷擴大與激化，最後演變為激烈的內戰。伊朗在敘利亞內戰中支持阿薩德政府軍，並與得到遜尼

派國家支持的反政府軍相互對抗，藉此進一步將影響力延伸至敘利亞，同時也貫通了與黎巴嫩真主黨的聯繫，形成一條在地理上連續的勢力分佈帶。

伊朗自革命後突破重重封鎖，在中東北非的政治變局中拉攏數個什葉派友善政權或非國家行為者，於其區域跨國網絡建構的背後，學者指出了幾項伊朗能夠成功擴大影響力的關鍵。第一，當伊朗的侍從者（client）面臨外來資金來源有限時，伊朗作為其庇護國（patron）的地位也會更加穩固；第二，伊朗以務實及彈性的角度尋找在推動國內進程與伊朗目標相符的組織，並積極建立與這些個人或團體的聯繫，支持其侍從者在國內的活動；第三，侍從者在國內欲推動的進程與伊朗的區域進程是相互呼應的（Clausen, 2020）。觀察什葉新月的成員可以發現大多在區域內或是國際上是處於相對孤立無援的境況，例如黎巴嫩真主黨被阿拉伯國家聯盟、GCC 和許多西方國家列為恐怖組織，這便加強伊朗作為其庇護國的重要性，也強化兩者的合作關係。

此外，Clausen (2020) 還指出伊朗推動外交政策及目標的能力不能僅從教派衝突的角度觀察。伊朗與其盟友的教派共同性只是其中一項特點，在宗教之外仍存在其他共同價值，如反帝國主義、反美、反以色列等，都是其合作框架中的部分理念。以伊朗對哈馬斯的軍事援助為例，可以說明伊朗在選擇區域盟友時並非全然是教派導向的，只要有共同的目標，所屬教派不同也不妨礙雙方的合作。Barzegar (2008) 也認為什葉新月是務實取向而非意識形態導向的聯盟，地緣政治考量往往才是主導伊朗外交政策及區域策略的關鍵因素。綜觀伊朗建構的什葉

新月地帶，除了成員間教派共同性以外，也反映出務實層面的戰略合作，而誇大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力不但不利於平息糾紛，更可能適得其反導致衝突進一步擴大。

三、沙國與伊朗的區域活動：葉門內戰的發展

最後，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層面的競逐除了領土爭議區域化及政治聯盟的建構外，近年來兩國在葉門內戰中扮演的角色與發展也備受國際矚目。葉門內戰經常被認為是沙國與伊朗在區域內的代理人衝突，常見的解釋也會稱葉門的胡賽組織因與伊朗同屬什葉派，故為伊朗在葉門內戰中的代理人。然而，Haidar (2018) 認為將胡賽組織單純視為伊朗的代理人是一種過於簡化的說法，Juneau (2016) 亦不認同胡賽組織為伊朗之代理人，而葉門的衝突也不全然是以教派作為區分敵我的界線。對於伊朗與胡賽組織之間的關係，Clausen (2020) 提到兩者同屬什葉派只是一部份促成其合作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為伊朗和胡賽組織在區域內欲推動的進程不謀而合，即反美及反以色列；加上葉門的地理位置及戰略重要性，才促使伊朗以務實的方式介入葉門事務。從教派而言，葉門胡賽組織屬於什葉派分支的宰德派 (Zaydism)，伊朗則是屬於什葉派之下的十二伊瑪目派。宰德派又稱五伊瑪目派，集中於葉門西北部，雖其為什葉派分支，然而相較於其他什葉派分支，宰德派的教義及宗教實踐反而與遜尼派更接近 (Juneau, 2016)。Clausen (2020) 指出單以教派關聯性不足以讓胡賽組織順勢成為伊朗的代理人，胡賽組織最終能

獲得伊朗支持事實上是葉門內部一連串的歷史與政治事件演變而成的結果。因此，伊朗對胡賽組織的支持主要仍是基於地緣政治考量，加上兩者間存在的共同目標與共享價值，使胡賽組織也成為伊朗區域聯盟下的一份子。

2014 年 9 月，胡賽組織成功控制葉門首都沙那，由於胡賽組織與伊朗的合作關係，此次事件被沙國視為伊朗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再一次擴張，試圖從沙國南部包圍其邊界 (Litvak, 2017)。2015 年以後，沙國聯合其他國家對葉門內戰進行軍事干預，發起兩階段的軍事行動，分別為果斷風暴行動與恢復希望行動 (Operation Restoring Hope)，試圖恢復哈迪政府的統治，更重要的是解決胡賽組織對沙國帶來的威脅。多年的內戰消耗不但沒有將葉門的衝突引導至終點，反而在其國內釀成嚴重的人道危機，受到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響，葉門的情況更是雪上加霜。然而，美國總統拜登在 2021 年宣布將撤出葉門內戰，且不再支持沙國軍隊；同時，沙國國內受到疫情衝擊也面臨到許多挑戰，Brew (2020) 指出沙國為維持國內穩定正在尋求從葉門內戰中脫身以減少資源耗費。沙國與伊朗之地緣政治競逐延伸至葉門內戰之發展，至今葉門的衝突亦持續延燒；然美國撤軍的決定與疫情對沙國與伊朗帶來的壓力是否會為葉門內戰帶來轉機仍是未來須持續關注的議題，同時葉門內戰的發展走向也會決定沙國與伊朗在區域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分佈版圖。

第四節、權力結構因素矛盾對兩國競逐之影響

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因權力結構因素所生的矛盾可以從三個面向檢視，即國家安全、經濟資源與地緣政治。在國家安全層面，伊朗在冷戰時期受到西方國家支持而開始發展的核子計畫，在 1979 年革命後突然成為西方國家與其區域競爭對手急於消除的夢魘，而伊朗對核子技術的掌握能力也進一步加劇與沙國的緊張關係。2015 年 JCPOA 的簽署雖限制了伊朗發展核子武器技術的能力與進度，實際上卻沒有緩和沙國與伊朗的矛盾。從沙國的角度來看，核子協議不但不能限制伊朗在區域內的活動，反而更明顯的是美國歐巴馬政府對伊朗的態度趨於友善，為沙國及其海灣國家盟友帶來更多的壓力。從沙國對 JCPOA 的態度反映出，對於沙國而言，除了保證本國不受到伊朗核武威脅以外，伊朗在區域內與之發生的地緣政治衝突，如雙方參與的葉門內戰，也會被沙國視作伊朗試圖動搖區域穩定的行為，同時與沙國形成安全層面的衝突。

在經濟資源層面，沙國與伊朗的經濟結構都高度仰賴石油出口的收入，而石油收入也是兩國對內發展經濟，對外串連與世界大國間的關鍵連結。沙國作為 OPEC 的主導國家，對國際石油價格的影響力與其原油生產能力都勝於伊朗，為沙國在與伊朗的競逐中提供一項至關重要的籌碼。然伊朗也掌握海灣國家石油出口要道的絕佳戰略位置，另外部分大國如中國及印度，因有龐大的原油需求也與伊朗達成合作，甚至中國與伊朗之間長達 25 年的合作協議也略見雙方形成戰略聯盟的雛形。在 2019 年葉門胡賽組織發動無人機襲擊產油設施事件的背後，反

映出雙方的地緣政治競逐也會延伸到經濟相關領域，造成兩國在經濟面向的衝突。在經濟層面的競逐中兩國各自挾不同優勢，而經濟能力是支撐兩國對內及對外行動的決定性條件，不僅關係到國內政權的穩定與否，也與兩國有能力在區域行動中投注多少規模的資源息息相關。

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的矛盾則是反映在三個部分，首先，從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主權爭議的阿拉伯化與國際化中可以看出，雖然這是介於阿聯與伊朗之間的爭議事件，但被賦予足夠的象徵性意涵後，也會被囊括進沙國與伊朗競逐的範疇，成為關乎陣營利益的重要議題。其次，沙國和伊朗各自也都致力於營造一個能拓展其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聯盟，前者主要仰賴 GCC 的框架，後者則是什葉新月的建構。沙國以 GCC 聯合海灣地區阿拉伯國家，意欲共同抵抗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擴張，且 GCC 之下的半島之盾部隊也能以實質的軍事力量介入阿拉伯半島上的衝突，進而維繫聯盟在區域內的影響力。伊朗自 1979 年後則抓住了數次區域發生重大變局的機會，與部分政權或團體建立起具有共同戰略目標的聯盟。而什葉新月的地域範圍也從地中海東岸橫跨至海灣地區，成為伊朗突破遜尼派國家封鎖而建立起的一條連貫地帶。最後，在其建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同時，兩國於區域國家之衝突也是地緣政治角逐的一部份。例如沙國與伊朗的競逐延伸至葉門內戰，雖葉門在多年的內戰消耗下早已民不聊生，然交戰方的衝突卻尚未落幕，而葉門內戰的最終發展也將為決定阿拉伯半島地緣政治影響力分佈的關鍵因素。

觀察沙國與伊朗在上述三個權力結構因素面向的矛盾並將其綜合比較後可以發現，兩者的競逐大致以地緣政治發展為主軸，即 GCC 與什葉新月影響力的建構與鞏固。在雙方陣營的地緣政治競逐架構下，安全議題與經濟面向矛盾又會加劇沙國與伊朗的衝突。例如安全議題的討論顯現沙國相當關注 JCPOA 能否作為伊朗在區域行動的限制，同時美國對伊朗態度的轉變也被沙國視為可能對其安全形成威脅的警訊，以上兩點都反映出沙國積極尋求其地緣政治影響力之保證。而經濟議題則是關乎兩國的內政穩定與外交政策走向，在對外方面，國家收入決定該國能在地緣政治競逐中投入的物質能力支持，因此雙方競逐也會延伸到經濟相關議題。整體而言，沙國與伊朗的權力結構競逐架構可視為以地緣政治影響力為核心，並向外衍生於其他面向的矛盾。

另外，近年來國際環境的變動也會為兩國的競逐添上一些變數。首先，美國作為支持沙國最重要的大國，其政策轉向也將牽動著中東局勢的變化。隨著美國抗中政策的明朗化，美國也逐步調整其於全世界的資源分配。例如 2021 年拜登總統宣布不再支持沙國於葉門內戰的軍事行動，也中止提供沙國在葉門活動所需之軍售及情報，勢必將影響沙國與其盟友在葉門內戰中的行動。同時，其他世界大國如俄羅斯、中國、歐盟等，其中東政策也會牽動沙國—伊朗的競逐發展，在區域的層次之上還有全球層次的競爭或對抗可能影響中東局勢，因此也須考量到外部行為者對區域事務的影響力。其次，新冠疫情也對中東國家乃至於全世界造成非同小可的衝擊。沙國和伊朗本身在國內就面臨一些挑戰，例如失業率、經濟

結構失衡等，疫情的衝擊無疑對其內政帶來更大的壓力。如同學者 Brew (2020) 指出的，沙國在疫情之下以保障國內政治穩定為首要條件，伊朗在區域政策上則有升級衝突的傾向。在面對疫情的嚴峻考驗下，沙國與伊朗各自會如何調整其區域政策尚與疫情的發展有關，種種的外部條件也都可能影響兩國競逐狀態的走向。



第三章 規範結構因素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在權力結構因素的作用之外，思想層面的對立情緒也可能以無形的方式影響國家作為，即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競逐產生之影響。和實際的利益衝突相比，規範結構因素之影響較難通過統計量化的方式呈現，也較難精確地比較不同時期規範結構因素作用與衝突之間的相關程度，但其對於國家間的關係發展仍具影響力。本章將探討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的影響，而規範結構因素的範疇將聚焦於教派主義對兩國關係發展的討論。因教派認同是目前沙國與伊朗的規範結構分歧中相對凸顯的議題，故針對教派主義進行深入探討有助於分析規範結構因素對兩國矛盾之影響力。

關於教派主義對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之作用，本章將以三大議題進行論述，分別是伊斯蘭教於兩國政權統治權力之重要性、教派主義對兩國內部政策之影響以及教派主義與兩國區域活動之關聯。首先，探討伊斯蘭教於兩國統治之重要性時，將從沙國與伊朗政府各自與教派的緊密連結切入。藉由該議題的討論，可說明教派議題於競逐中之重要性根源，也是兩國政府強調教派認同之動機。對此議題，可發現兩國政權都仰賴教派賦予其之統治正當性，為兩國維繫國家統治的必要條件，因此其政府有保障特定教派最高地位之必要性，同時這也是可用於競逐之依據。

其次，兩國對內少數教派政策之部分將討論沙國對內部什葉派與伊朗對內部遜尼派的政策。藉著內部政策的探討，可見到兩國政府對少數教派的態度受到教

派主義影響，進而防止少數教派進入權力核心，而這亦是教派主義對國家行為影響力的一種展現。最後，兩國對外區域政策的部分則是從沙國與伊朗的外交政策觀察，探討教派主義於國家對外行為之影響力。在教派主義的流行下，沙國與伊朗在對外政策上也顯現出趨於明顯的教派傾向，如沙國政府在區域內塑造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威脅形象，伊朗政府也開始強調什葉派團結的重要性，皆說明教派主義於其外交政策之反映。通過本章的探討，可發現教派主義會受到教派政策產出的強化，而當其普遍流行後又會加強兩國政府對特定教派的偏見，再次輸出具教派主義傾向的政策，在政策產出與思想輸入之間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

第一節、伊斯蘭教於兩國統治之重要性

沙國與伊朗皆為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伊斯蘭教對其人民生活及國家政治都具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在1979年後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格局逐漸清晰化的過程中，「教派主義」成為研究兩國競逐時經常被提及的議題。雙方在區域內的活動，如葉門的代理人衝突，或伊朗與什葉新月盟友的結合，雖不能將其政策簡單以教派主義一概而論，卻時而可見教派主義對其政策的影響力。另外在競逐伊斯蘭國家領導者的地位時，兩國也經常會批評對方所奉行的教義是與伊斯蘭不符的，顯示宗教的詮釋權與相關權利也是兩國欲競爭的目標。除了將教派主義視為一種政治工具，更可進一步探討主政者「為何」將教派主義運用於競逐中，以解釋教派議題被利用於競逐中的可操作性。本節將分為三個部分闡述，首先是教派主義在競

逐中的角色；後續會分別探討在沙國與伊朗國內宗教及統治權力的關聯性，分析教派主義被運用於競逐之動機與原因。

一、教派主義在競逐中的角色

在伊斯蘭教建立初期，穆斯林對於哈里發的合法繼任人選產生分歧，後逐漸發展成遜尼派與什葉派兩個主要派別。長期以來，儘管各派別對伊斯蘭教義的詮釋各有不同，如此差異也並未在穆斯林世界發展出教派主義的潮流。「教派主義」在目前的研究中普遍被認為是一種當代的新興現象，不能投射出過去的歷史發展 (Potter, 2015)。因此，比起追溯伊斯蘭教教派的歷史發展，教派主義的形成與近數十年的國際環境變動之間反而具有較強的關聯性。

教派主義 (Sectarianism) 在牛津英語詞典中是指「強烈支持一個特定的宗教或政治團體，尤其是當這種支持導致不同團體之間的暴力時」。Potter (2015) 指出，從廣義的解釋角度來看，派別 (sect) 可以是依據種族、部族、宗教或是政治意識來劃分的群體，這使定義教派主義變得非常複雜。而他也認同 Haddad (2011) 的說法，認為教派主義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同時，Potter (2015) 提到教派主義具有宗教的意涵，甚至帶有負面的意義，如教派衝突經常被用於形容宗教—政治的矛盾事件，像是伊拉克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的衝突便是一個例子。

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研究中，教派主義或教派衝突都是經常被提及的。作為海灣地區兩大強權，沙國為遜尼派領導國家，伊朗則是什葉派的代表國家。兩者

在區域內的代理人衝突常被形容為教派衝突，例如兩國在敘利亞、葉門等地支持與本國同教派的勢力，或反對與本國不同教派勢力的行為，就會被歸於教派衝突的範疇。據前段對於教派主義較通俗的定義以及學者的意見，教派主義大致涉及三個元素，分別是支持特定政治或宗教團體、和宗教相關，以及導致衝突或暴力的結果。雖然沙國與伊朗部分的對內及對外政策具有教派主義的特徵，然需特別釐清的是教派因素固然對兩國的政策具有影響力，卻不能稱這些矛盾是因教派分歧而生。因此，即使兩國競逐議題與教派主義相關，也不等於是教派主義主導著競逐的持續進行。

事實上，中東地區的教派主義興起與近數十年的國際環境變動有較密切的關聯。1979 年伊朗革命的後續影響開啟了沙國與伊朗競逐的開端，使沙國與伊朗成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對立強權，為區域格局帶來重大的轉變。2003 年伊拉克戰敗進而造成原有的遜尼派海珊政權崩潰，是另一項在中東地緣政治勢力分佈形成權力真空的關鍵事件。就教派的分佈來看，海珊政權的崩塌為伊朗什葉派政權西進打開一個缺口，而後伊朗也成功與伊拉克新上任的什葉派政權維繫良好關係，打破原來遜尼派國家築起的防線。

2010 年底阿拉伯之春開始發酵，學者指出教派主義的發展在此時也更為流行 (Ostovar, 2017 ; Neo, 2020)。由於阿拉伯之春的影響範圍極廣，各國陷入混亂也被伊朗視為擴張影響力的大好機會。除了支持部分北非國家的革命，伊朗更是藉敘利亞動亂之際支持什葉派的阿薩德政權，連通地中海東岸至海灣地區的勢力

範圍。同時，沙國與伊朗在區域內的代理人衝突，以及兩國的地緣政治勢力劃分也促進了教派主義言論的流行。觀察近數十年的事件發展，可以發現在沙國與伊朗競逐海灣國家領導者地位的過程中，教派主義的概念也隨著兩國的競逐日漸茁壯，而幾次重要的區域事件更是助長了教派主義的發展。過去兩國間雖存在教派差異但仍能保持合作關係，而今日教派卻成為劃分你我的分界線，比起因教派差異而生的衝突，教派主義反倒更像是國際環境變動下衍生的政治問題。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區域內跨國極端組織數量成長，或沙國塑造什葉派威脅的政策都持續強化教派主義在中東地區的流行 (Robinson et al., 2018)。而教派主義言論的盛行，會在意識形態上割裂遜尼派與什葉派穆斯林。於國家內部分屬不同教派的群眾間，教派主義會威脅國家團結與社會穩定；於主要信奉教派不同的國家間，教派主義亦可能加深對他國的敵意，甚至放大現有矛盾激化衝突。然而，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部分被以教派主義檢視的政策背後事實上都有超出教派因素以外的考量。例如伊朗對萊門胡賽組織的支持，雖兩者都屬於什葉派，然前者為十二伊瑪目派，後者則為宰德派，兩教派於教義與實踐層面之相似度不高，學者也指出其反美及反以色列的共同價值才是促成合作更重要的因素 (Clausen, 2020)。另外，伊朗支持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也不是基於教派考量，雖然阿薩德政權信奉之阿拉維派 (Alawites) 被歸納為什葉派分支，學者卻指出部分伊朗神職人員會將阿拉維派視為異端教派，反映阿拉維派與伊朗什葉派於宗教層面並不具高度一致性 (Robinson et al., 2018)。由此可見，教派在兩者的合作中並非主要考

量，且考慮到伊朗與阿薩德政權在中東地區地位相對孤立，加上敘利亞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相較之下這兩項因素才更符合伊朗支持阿薩德政權的動機。

從前段的兩個例子可以得知，雖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存在一些以教派衝突包裝的矛盾事件，然細究其中可能會發現這些衝突既非因教派而起，其聯盟間也未必存在緊密的教派聯繫。在兩國的競逐中，存在一條粗略劃分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界線，然實際上兩國的政策卻又會超出該條分界線。換言之，教派主義對於沙國與伊朗的政策不具有必然的主導能力，但其以教派劃分你我的觀念卻隱隱體現於兩國的競逐發展，在能以教派區分衝突雙方時作為一種團結群眾的力量，也能在有其他更顯著的合作利益時銷聲匿跡。因此，在探討教派主義對兩國競逐的影響時，因其具強調教派差異的傾向，須避免過於放大大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力，以免使矛盾在現有基礎上又進一步擴大（Barzegar, 2008）。

二、沙國王室與瓦哈比主義之連結

在今日的沙國，瓦哈比主義與統治家族間具有密切的合作關係，瓦哈比主義代表宗教的力量，支持紹德王室在沙國的政治權力，反之王室也以其政治力量保障瓦哈比主義在沙國內部的宗教最高權威性。此外，瓦哈比思想也深入滲透到沙國的社會結構中，其主張與教義對於沙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具相當程度的約束力，是沙國內部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宗教思想。

沙國統治者與瓦哈比主義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建國初期的歷史淵源，

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瓦哈比 (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 最早於 1740 年代在內志地區傳播瓦哈比思想，但其主張不受統治者支持並受到打壓，後與穆罕默德·本·紹德 (Muhammad Ibn Saud) 合作才得以逐漸擴大瓦哈比思想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穆罕默德·本·紹德也得利於與瓦哈比派的合作，統治者不僅藉宗教的力量團結人民並征服其他部落，宗教也為其提供統治的政治正當性。對雙方而言，宗教在得到政治力量支持後可免於受到其他外部威脅，而統治者則是通過宗教取得合法正當的統治權力。Nevo (1998) 指出，兩者的結合使沙烏地王國成為阿拉伯半島的政治主宰，同時瓦哈比主義的廣泛流傳也使其成為該區的主要伊斯蘭思想，此種合作關係協助整個區域的統一，並在各個部族的統治權力之上形成一個超越部族力量的統治結構。

瓦哈比主義自 18 世紀沙烏地王國建立之始，到歷經動盪完成國家統一的過程中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王國成立時，瓦哈比主義得到政府力量的支持，成為國家治理最主要的宗教依據，其他伊斯蘭教派或是異教徒的宗教儀式相對受到打壓 (Nevo, 1998)。在後續的發展中，瓦哈比教義也一直是該地區的主流思想，也是當地人民宗教信仰的核心價值。19 世紀初，當第一沙烏地王國受到埃及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 入侵時，雖第一沙烏地王國因此覆滅，瓦哈比思想卻沒有隨之消逝，反而一直是團結該地區民眾的力量。之後陸續成立的第二、第三王國，直到成為今日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瓦哈比主義雖經歷政治動盪卻仍屹立不搖，在沙國轉型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瓦哈比派與統治者之間宗教與政治

的合作關係也持續存在 (Nevo, 1998)。

除了統治階層與瓦哈比派長期合作的歷史淵源外，瓦哈比思想在沙國構築其國家認同的過程中也是一個關鍵的角色。Nevo (1998) 認為宗教信仰以及對紹德王室的忠誠是沙國建構其集體認同時最重要的兩個要素，Khan (2019) 也指出沙國人民對國家的認同須符合兩個標準，即對穆斯林身份的認同以及對統治家族的忠誠。在一般情況下，前者相對容易達到，然後者需考量到沙國內部除了信奉瓦哈比派的民眾外，仍存在其他少數教派，如東部省的什葉派以及納季蘭省 (Najran) 的伊斯瑪儀派 (Isma'ilism)，少數教派與信奉瓦哈比的王室間存在的矛盾也成為沙國推行國家認同時遭遇的困難。

然而，基於瓦哈比主義與沙國王室長期互利共存的關係，沙國王室因為需要借助瓦哈比思想提供的統治正當性，以政治力量大力支持瓦哈比派在國內的地位，使其成為該地區最具優勢的宗教權威 (Pinault, 2010)。相對之下，其他少數教派在沙國的地位便受到排擠，例如什葉派在沙國長期面臨政治、社會、司法、經濟等權利的打壓。1979 年伊朗革命後，教派主義的言論在區域內快速傳播，瓦哈比派的神職人員對此樂見其成，因教派主義的流行有利於瓦哈比主義進一步強化其地位。同時，沙國王室也有意借助教派主義穩固其統治權力，如 Khan (2019) 提到在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席捲各國之際，沙國以教派主義的宣傳阻止什葉派與遜尼派的民眾共同對政府提出改革要求，因此分化什葉派與遜尼派對沙國王室而言是有利於統治的做法。另一方面，沙國王室以瓦哈比思想作為其統治正當性來

源也是教派主義在沙國流行的原因之一，Khan (2019) 指出在沙國可見由上而下的教派主義思想傳播，在沙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可見統治精英以此維護自身利益。綜上所述，對沙國政府而言，推動教派主義除了可以分化群眾便於國家管理，更重要的是可以持續獲得瓦哈比派對其正當性的支持，為保障王室統治權力的一種必要措施。

從歷史因素到近期的發展，瓦哈比思想已然成為沙國政府須以公權力維護的重要價值，保障瓦哈比的地位同時也是穩固王室的統治。然而，除了瓦哈比主義賦予沙國王室的正當性以外，是否有其他的來源可為王室提供政治正當性？對此，Khan(2019)認為沙國政府尚未找到其他可替代瓦哈比主義的正當性來源，這暗示著沙國政府將會持續以教派主義支持瓦哈比思想的最高權威性；此外，Nevo (1998) 的看法也可印證瓦哈比思想仍會是支持王室政權的重要價值。

在 Nevo (1998) 的研究中，他首先提到歷史上國家與宗教間存在兩種互動模式，第一種是國家以其資源推廣伊斯蘭，第二種是以伊斯蘭作為保護國家的屏障，而沙國正是第二種。這反映在沙國統治者從建國初期便依賴瓦哈比派的支持，以其提供之正當性逐步向外征戰直到建立起今日的王國。Nevo (1998) 指出，在面臨外來威脅時，如外部極端思想、鄰國擴張野心等，沙國會以擴大正當性基礎的方式作為回應，而宗教是最主要且幾乎是唯一的正當性來源。隨著國家現代化的需求，西化設備的引進或不同於傳統伊斯蘭規範的生活方式也在國家發展與宗教價值之間產生碰撞。Nevo (1998) 認為，1980 及 1990 年代即使沙國已經掌握

豐富的經濟資源，卻仍持續鼓勵遵守 18 世紀的宗教規範及價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瓦哈比主義所能提供的政治正當性。最後，Nevo (1998) 也提到宗教與政治長期的合作關係已經使兩者不可分離，其中一方的衰弱會連帶撼動另一方的合法地位；當沙國王室將宗教作為其國家集體認同的一部份時，宗教也成為檢視王室統治正當性的一項附加屬性，因此沙國王室為了保證其政權延續也會致力於維護瓦哈比主義的價值。

三、伊朗統治階層與什葉派信仰之連結

1979 年革命後建立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一改過去巴勒維國王執政時期相對世俗化的氛圍，是一個具有濃厚伊斯蘭色彩的政權。與沙國王室和瓦哈比派的政教合作模式不同，伊朗的宗教領袖本身就握有極大的政治權力。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初的組織規劃，到憲法當中對於宗教的規範，都可以說明伊斯蘭教於當今伊朗之重要性，而什葉派的信仰也是伊朗致力捍衛的宗教價值。

伊朗什葉派信仰之崛起可追溯至 16 世紀薩法維王朝 (Safavid Dynasty) 的統治，當時什葉派伊斯蘭被定為國教，當地居民則是信奉什葉派中的十二伊瑪目派。今日伊朗地區什葉派的流行具悠久之歷史脈絡，雖於 1979 年以前什葉派已為當地主要信仰，但 1979 年後成立之新政權卻與過往政權存在一項顯著差異，便是由宗教人士掌握政治權力。研究中提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有兩個基本原則，第一項原則是神聖法 (Divine law) 為正當性與政治權威的唯一來源，第二項原則是

在等待十二伊瑪目出現的期間，精神領導人是唯一對於神聖法有詮釋權力的人，同時精神領導人也是全面掌握伊朗社會與政治權力的角色（FIDH & LDDHI, 2003）。依據這兩項原則，什葉派伊斯蘭被 1979 年革命後的伊朗新政權視為其統治正當性的來源，而精神領導人則是掌握核心權力的人物。另外，研究也指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不只將什葉派伊斯蘭奉為國教，更是把國家視為實現神聖意志的機構與工具，就像是一個由神職人員組成的寡頭政治結構（FIDH & LDDHI, 2003）。

革命後何梅尼提出「宗教學者的政治管理」成為制定憲法的骨架，其意義便是由宗教學者督導世俗政治，以保障國家的安定。在伊朗的政治結構中，宗教人士對於國家政治的影響力十分清晰，基本上也是由宗教人士主導國家的運作。首先，精神領導人處於伊朗國內政治的核心位置，掌握政府機關的人事決定權，且無任期限制。伊朗憲法第 110 條規範了精神領導人的相關權力及責任，其影響力擴及各個層面，包含司法、軍隊、警務、廣播、電視、總統和議會等；此外，精神領導人對於監護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以及專家議會（Assembly of Experts）的人事決定權也使其政治權力擴及國家政治的關鍵議題。

其次，依據憲法第 91 條設立的監護委員會也握有極大的政治權力，其成員包含六位由精神領導人指定的伊斯蘭神學家，以及六位由司法部門推舉並經國會同意的法學家，這六位成員象徵著十二位伊瑪目，任期為六年，且三年會改選一半的成員（Adib-Moghaddam, 2021）。事實上，雖然監護委員會的成員看似由不同機構推選而出，精神領導人對其組成卻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除了六位直接由精

神領導人指定的成員外，另外六位雖是由司法部門提名，但司法部門的領導人卻也是由精神領導人指定，等同其成員皆是由精神領導人直接或間接選擇。監護委員會的權力之一是篩選總統候選人以及欲進入國會或專家議會的成員，以此機制可以將其認為不適任的人選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另外，監護委員會也有通過或否決國會法案的權力，其中只要有四位由精神領導人直接指定的成員投票決議該法案不符合伊斯蘭價值，就可以否決國會所制定的各種法案。因此，精神領導人與監護委員會也是伊朗政治權力核心所在（FIDH & LDDHI, 2003）。

最後，專家議會的職責是選舉、監督以及罷免精神領導人。專家議會包含 88 名議員，任期八年，而這些議員事前須先經過監護委員會的批准取得候選人資格，之後還須由精神領導人任命才能進入專家議會。從其篩選制度觀察，專家議會也可以有效排除與精神領導人立場對立的候選人進入，大幅降低反對者進入權力核心的機率；而這也反映出 1979 年革命後形成的政治結構是以神職人員階層為中心的。以精神領導人為核心，國家的立法機構與監督機構都與其有親近關係，另外總統的人選也須得到精神領導人的支持。於此情況下，精神領導人也成為伊朗國內實際上掌握最高政治權力的角色，而什葉派信仰在現代伊朗政治中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除了政府組織功能可以反映出精神領導人與宗教的重要性，伊朗憲法更是直接保障什葉派伊斯蘭相較於其他教派或宗教在國內的最高地位。憲法第 12 條的一開始便明確寫道：「伊朗的官方宗教是伊斯蘭教和十二伊瑪目賈法里派，而這

一原則將永遠不變。」憲法第 12 及 13 條也承認了遜尼派的合法地位，同時將祆教、猶太教和基督教列為國家認證的少數宗教。然而，研究指出雖然憲法規定予以遜尼派充分的尊重，但實際上遜尼派仍受到政府歧視，例如政府當局不允許遜尼派穆斯林在德黑蘭興建清真寺 (FIDH & LDDHI, 2003)。後三者在伊朗則是面臨更嚴重的歧視，雖憲法允許其於「合法範圍內」行宗教儀式，但政府卻大幅限制其權利；而這些異教徒在就業層面也飽受歧視，致其有居於次等公民待遇的感受 (FIDH & LDDHI, 2003)。

什葉派信仰作為伊朗政權的統治正當性來源，不論在政府機構或是在其他教派及宗教間都得到了國家公權力的支持與保障，得以持續居於國內的最高地位。這一點和沙國的情況類似，因兩國皆是以特定的教派信仰作為其統治正當性的依據，理所當然地政府也會致力於保障該教派的最高權威性。對於國家而言，這不只是要確保特定教派相對於其他教派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關係到其政權的穩定與否，因此教派議題才會浮現於兩國競逐中。更進一步來說，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教派主義的流行使兩國經常面臨到對自身統治正當性來源的攻擊；而作為回應，兩國也會批評對方所信仰的教派不符合伊斯蘭教的價值，教派主義的概念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強化。綜上所述，基於教派地位於其政權穩定之重要性，這也成為兩國統治者在競逐中以教派主義作為攻防的重要動機。

第二節、教派主義對兩國內部政策之影響

沙國王室與瓦哈比主義的歷史淵源，及伊朗政府以什葉派信仰作為立國原則，皆反映出兩國以特定教派信仰延伸出的統治正當性，是其致力於維護的目標。基於教派與統治權力間的密切關聯，兩國國內的少數教派處境也會受到沙國—伊朗競逐關係的影響，成為受中央政府忌憚進而排擠的一個族群。對此，本節將透過沙國什葉派以及伊朗遜尼派的處境，進一步說明教派主義的觀念「如何」反映在沙國與伊朗對內的少數教派政策，以便更具體地探討教派主義對於兩國政策的影響力。

一、沙國什葉派之處境與政府對其之政策

沙國的瓦哈比主義屬於遜尼派，主張應回歸先知穆罕默德時期的社會規範，以古蘭經作為一切生活的依歸。瓦哈比主義也屬於遜尼派的基本教義派，強烈反對任何異端行為，而什葉派與遜尼派對宗教的教義與實踐多有不同，因此什葉派也被瓦哈比派認為是一種異端思想。由於瓦哈比主義是沙國王室所認定的國教，對沙國政治深具影響力，故其對什葉派的強烈敵意也反映在沙國政府對什葉派少數的政策。長期以來，什葉派在沙國都面臨到結構性的歧視，而政府對什葉派的歧視也多半是源於瓦哈比神學對什葉派的敵意 (Majidiyar, 2013 ; Meijer, 2016 ; Khan, 2019)。

什葉派在沙國總人口比例當中約佔 10%到 15%之間，在沙國東部省以及西

南部的納季蘭省都有什葉派人口居住 (Jones, 2007 ; Majidyar, 2013 ; Khan, 2019) 。東部省是沙國重要的產油區，佔有全世界約五分之一的探明石油儲量，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也位於該省，其中約有一半的勞動力人口是信奉什葉派；另外，居住在東部省的什葉派多是十二伊瑪目派，此區域也較易受到什葉派多數的地區影響，如巴林、伊拉克和伊朗 (Majidyar, 2013) 。由於東部省對沙國石油經濟的重要性，該區也被政府認為有相當重要的戰略價值。納季蘭省則是位於沙國與葉門的邊界，當地的什葉派教徒多屬於伊斯瑪儀派，而該地區以作為伊斯瑪儀派的精神所在地聞名，其地位更可追溯至 1640 年代 (Khan, 2019) 。東部省和納季蘭省是沙國什葉派主要的分佈地區，而因其教派受到官方瓦哈比主義的排擠，一直以來和遜尼派並不具有同等地位，如沙國政府任命的最高神職人員和司法部門就曾公開攻擊該教派的人民，對伊斯瑪儀派規範的調侃也經常發生 (Khan, 2019) 。

事實上，沙國政府對什葉派的排擠不僅限於言論上的攻擊，教派主義對其政策的影響更是關乎什葉派在社會上的處境，長期以來他們在宗教、司法、政治、經濟等層面都受到政府結構性的歧視 (Majidyar, 2013 ; Wehrey, 2013 ; Khan, 2019) 。

在宗教方面，Majidyar (2013) 指出什葉派不能在遜尼派與什葉派混居的城市建造清真寺，如達曼 (Dammam) 和胡拜爾 (Khobar)；而什葉派的宗教儀式舉行也會受到限制，曾有什葉派的神職人員稱其宗教活動會被官方媒體忽略 (Wehrey, 2013) 。因什葉派身份受到的歧視也反映在司法上，如東部省的蓋提夫 (Qatif) 和哈薩 (Ahsa) 設有什葉派法庭裁決民事糾紛，但東部省其他區域或沙國內的其

他省份則無什葉派法庭的設置。另什葉派法庭的法官人選也是由司法部門直接指定，且其判決結果可被遜尼派法庭否決，或是由遜尼派法庭重審已在什葉派法庭審理過的案件 (Majidyar, 2013 ; Wehrey, 2013)。

此外，高級學者理事會 (Council of Senior Scholars) 為沙國的最高宗教機構，負責提供國王宗教事務建議，其頒布的官方宗教命令也足以影響社會及政治生活的各個面向。然該理事會的成員包含遜尼四大法學派的代表，但什葉派卻無代表參與 (Wehrey, 2013)。同時，什葉派也被排除於政府機構要職以外，如內政部長、國防部長及外交使節團等；研究進一步指出對什葉派民眾就業的排擠也擴及私部門，因內政部會對私人企業的高階主管招募進行監控 (Majidyar, 2013 ; Wehrey, 2013)。最後，什葉派信仰在沙國的教育體系中也受到打壓，如教科書中對其有貶義的暗示，信仰伊斯瑪儀派的學童也會被嘲笑且須接受瓦哈比思想的教育 (Wehrey, 2013 ; Khan, 2019)。

在長期受到教派歧視的情況下，東部省自 1950 年代以來一直是沙國政治反對力量的熱點，2011 年以後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響，國內教派的分野更是趨於明顯 (Matthiesen, 2014)。雖然沙國統治者曾試圖改善什葉派的社經地位，但學者也指出這些改革多為不連續且不長久的 (Majidyar, 2013)。就沙國政治結構而言，教派主義的流行對於王室或是瓦哈比神職人員都是有利可圖的，而學者也指出，促進教派主義確實可以確保高階神職人員持續掌握政治權力並提供實質的物質利益 (Wehrey, 2013)。進一步而言，教派主義可以實現沙國政治與宗教權力的相

互保證，以教派歧視政策限制什葉派的權力取得，確保瓦哈比主義的最高地位，宗教力量便可持續支持王室統治的正當性。整體而言，教派主義的思想充分反映在沙國對其內部什葉派的政策，同時教派主義的流行也會持續強化兩教派間的對立情緒，加深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歧。

二、伊朗遜尼派之處境與政府對其之政策

相對於什葉派在沙國為教派少數，遜尼派在伊朗反而屬於少數族群。根據伊朗官方的統計資料，有 99% 的伊朗人信奉伊斯蘭教，而遜尼派約佔伊朗總人口數的 7% 到 10% 之間，另也有遜尼派的領導人稱事實上遜尼派人口數高達 25% (Faramarzi, 2018 ; Lumsden, 2019)。不過亦有學者反對 25% 的說法，認為遜尼派其實約僅佔 10%，即八百萬人 (Asadzade, 2018)。雖然對於遜尼派於伊朗國內人口的比例存在不同意見，卻不影響遜尼派作為伊朗少數教派的事實；此外，類似於沙國什葉派的情況，伊朗的遜尼派也因教派差異受到政府政策上的歧視。

伊朗遜尼派與沙國什葉派同樣都是與其本國國教相異的教派，而伊朗什葉派統治階層與沙國瓦哈比神職人員也都認為對方信仰的教派是伊斯蘭教的異端，皆對彼此抱有較排斥與對立的態度。這樣的抵觸情緒不僅影響兩國對彼此的看法，也向下延伸到對內部相異教派的政策；更有甚者，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下，兩國也都各自將國內的相異教派視為潛在的安全威脅，並試圖剝奪其部分公民權利。如同伊朗憲法中明確指出什葉派相較於遜尼派的優先地位，雖憲法也尊重遜尼派

信仰，在實際政策層面卻反映出對遜尼派權利的諸多限制。

Lumsden (2019) 指出伊朗的遜尼派主要受到四個層面的歧視，分別為政治、宗教、經濟與司法。首先於政治層面，遜尼派被排除於總統候選人以外，因憲法第 115 條規定總統須篤信伊朗的官方教派。Lumsden (2019) 指出在 1979 年後便無遜尼派人士被指任為政府部會首長，在遜尼派為多數的錫斯坦—俾路支斯坦省 (Sistan and Baluchestan Province)，遜尼派為公務人員的比例也低於 15%。第二，於宗教層面，遜尼派不能於主要城市中興建清真寺。雖 2015 年伊朗官方稱德黑蘭市內有九座遜尼派清真寺，遜尼派卻回應這些僅為祈禱室 (Faramarzi, 2018)。此外，遜尼派的教育在公立學校中也是被禁止的，同時人權團體也提出伊朗警方攻擊或取締遜尼派集會的案例，其中遜尼派的重要領袖如 Molavi Abdulhamid 也受到官方的出境或國內旅遊限制 (Lumsden, 2019)。

第三，遜尼派在經濟層面也受到部分限制。遜尼派在就業權利上受限於 *gozinesh* 條款，該法律能限制教派及種族少數族群參與公民生活之權利。政府可藉由此機制篩選對伊朗國教與宗教學者政治管理原則不忠誠的人，因此宗教與種族少數族群就業時可能受此機制影響。另外，Faramarzi (2018) 在其研究中也提到遜尼派較易取得銀行、農業等類型職缺，因此類型的工作被政府認為較不具安全風險。最後，Lumsden (2019) 提出遜尼派在司法審判中的困境。在其研究中，Lumsden (2019) 引用 2018 年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顯示至少有 140 名伊朗遜尼派人士因宗教活動被監禁；此外，人權團體也指出至少有 38% 的

政治監禁犯為遜尼派，而遜尼派的比例又高於其他宗教或教派。同時，遜尼派也會因宗教集會或散佈宗教思想受到逮捕，進而受到毆打虐待或不司法程序的審判。對此，Lumsden (2019) 提到遜尼派政治犯遭到的指控可能較為模糊，如不敬真主或危害國家安全等，而這些指控也往往使其得到更嚴重的審判。

對於遜尼派受伊朗政府結構性歧視的主張，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Asadzade (2018) 以 2017 年秋季的各省失業率統計資料，反駁 Faramarzi (2018) 稱遜尼派多數省失業率較高的說法。他認為這些省份的失業率和全國平均相差不多，故不能稱遜尼派的社經條件整體而言低於什葉派。然而，Asadzade (2018) 也承認伊朗政府未能將遜尼派融入其政治體系，並剝奪其權利使其難以進入政府高層。Faramarzi (2018) 在其研究中提到，羅哈尼總統的特助 Ali Younesi 曾在公開訪談中承認對遜尼派的歧視政策（如內閣或省長的資格排除），這些主要是因為強硬派什葉宗教人士對遜尼派的偏見，害怕遜尼派人士握有權力後會威脅國家安全。另外，Lumsden (2019) 也認為伊朗政府對遜尼派領導人士的限制反映出政府對其之不信任，擔心遜尼派會成為聯合他國遜尼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族群。

在長期對遜尼派的歧視政策下，遜尼派多數地區的低發展程度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入侵伊朗的破口，為其安全帶來新的挑戰 (Aman, 2016 ; Lumsden, 2019)。

事實上，伊朗前總統羅哈尼和精神領導人哈梅內意都曾公開呼籲要減少對遜尼派及其他少數族群的歧視。在政策施行層面，如 2016 年增加遜尼派於國會的席次、在錫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指派遜尼派官員、派任遜尼派大使赴越南等，都是伊朗

政府為減少歧視做出的努力。然而，遜尼派領導者卻認為改變的幅度有限，學者也認為伊朗政府在減少歧視的方向仍有更多的努力空間 (Aman, 2016 ; Lumsden, 2019)。

綜合沙國對什葉派與伊朗對遜尼派之政策，可以發現兩國在其內部政策都對對方所屬的教派抱有敵意，並排除其進入權力核心。兩國對於相異教派的排擠都源於其政治權力核心，對沙國政府而言，其境內什葉派可能受到伊朗影響，成為破壞國家穩定的因素；對伊朗政府而言，其境內遜尼派也可能與區域內的其他遜尼派國家聯合，被視為威脅國家安全的隱憂。對比兩國競逐形成前的情況，沙國與伊朗各自對國內相異教派的懷疑與不信任是在競逐形成後才被放大檢視的問題。在兩國競逐的國際環境下，加上教派主義言論的流行，教派主義不僅是政策推動所造成的結果，更會在政策實踐後逐漸成為影響決策者觀念的因素。而兩國對於相異教派忠誠度的懷疑正好可以印證這個觀點，教派主義的流行使權力核心階層對相異教派產生防備，在排除其權力的過程中，教派主義的觀念也在政策推動下反覆循環，逐漸深化兩教派間的分歧。

第三節、教派主義與兩國區域活動之關聯

1979 年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勒維國王政權後，伊斯蘭什葉派於伊朗政治結構中的重要性驟然提升。革命的成功鼓勵了遜尼派與什葉派的伊斯蘭運動人士，使其更活躍於政治事務 (Robinson et al., 2018)。另一方面，革命的後續影響也開啟

了沙國與伊朗於區域內的競逐，而今日兩國於區域內的活動或政策中，也可見教派主義對其之影響力。

在伊朗 1979 年的新政權成立後，何梅尼成為伊朗的政治與精神領袖。雖伊朗的新政權是立基於什葉派信仰，但何梅尼不僅將自身定位為什葉派穆斯林的領導人，同時更是泛伊斯蘭主義的領導人。何梅尼將「宗教學者的政治管理」一概念融入憲法，精神領導人遂成為伊朗的統治者，而此後這也成為伊朗欲於中東地區推行革命的基本概念 (Robinson et al., 2018)。受到革命鼓舞，伊拉克什葉派試圖推翻世俗的海珊政權，伊朗也協助黎巴嫩什葉派建立真主黨。伊朗向外輸出革命的外交路線使其他阿拉伯遜尼派國家產生擔憂，因其擔心什葉派將會改變區域內以遜尼派為主導的權力結構，而其中最明顯的便數沙國 (Robinson et al., 2018)。

作為回應，沙國積極推動瓦哈比意識形態作為對抗什葉派革命的途徑，學者更進一步提到，伊朗革命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間加入了更多教派與意識形態的驅動因素 (Robinson et al., 2018)。此外，於 1980 至 1990 年代期間，沙國為了抵抗伊朗輸出革命的壓力，也向外宣傳反什葉派的言論。例如透過增設瓦哈比學校，以及輸出反什葉思想到其他無什葉派的地區（如南亞），以達到孤立伊朗的目的 (Ighani, 2016)。在過去數十年間，遜尼與什葉的教派分歧在國際環境變動下被放大檢視，而教派主義也成為政治競爭中使用的一種手段。這個概念經時間的洗禮逐漸浸染區域內人民的思想，不論是統治階層或一般民眾，對於相異教派的偏見也會因教派主義的潮流受到強化。

關於教派主義的思想如何滲透進整體的社會生活，Siegel (2015) 的研究以社群軟體的角度切入，提供另一個面向的視角。在其研究中，Siegel (2015) 將近七百萬條推特分為反什葉、反遜尼與反教派主義三大類，發現這些文章大部分來自海灣地區，尤其以沙國為大宗。而沙國成為教派主義言論最興盛的地區，一方面反映出沙國有大量活躍的推特用戶；另一方面，Siegel (2015) 則認為是因為沙國有較多神職人員會在推特上發布煽動性的教派主義言論。此外，Siegel (2015) 也發現在區域內發生重大事件時，反什葉或反遜尼的內容會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在事件平息後才回到平均狀態。例如遜尼派國家參與沙國主導介入葉門內戰的行動時，推特上便出現一股強烈支持遜尼派的風潮，而這也恰巧說明了將社群媒體用於團結民眾的支持是一個快速且有力的途徑。

在研究中搜集的教派主義推文中，反什葉的數量明顯高於反遜尼，反映出什葉派屬於少數族群的現況。在這些反什葉言論的背後，值得注意的是，Siegel (2015) 提到神職人員、海灣國家統治階層以及沙國官方媒體對於教派主義言論的操控。首先，社群媒體的特性之一就是意見領袖可以更快速地發布消息並擴大觸及範圍，因此公眾人物的言論本身就具較大影響力。其次，反什葉的言論在公眾人物或帳號的推文被提及，更會加強教派主義於區域內的流行。例如 Siegel (2015) 提到胡賽組織、阿拉維教派或是海灣國家內的什葉派不盡然相同，但海灣國家統治者與沙國媒體卻持續以這些不同什葉派間的微弱聯繫，將其串聯成一個與伊朗相關的結構。另外，Siegel (2015) 指出海灣阿拉伯國家中對介入葉門內戰的看法也

依教派分為兩派，沙國什葉派對此提出抗議後遭到政府鎮壓；而在遜尼派為多數的海灣國家中，其內部的什葉派也會擔心因區域內其他地區什葉派的活躍而遭到本國政府的報復。

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教派主義被國家領導階級用於取得國內民眾支持，同時也反映出教派主義的概念已深入當地社會生活，將遜尼與什葉派劃分為兩大綜合群體。教派主義不僅是達到政治目的可使用的手段，這個概念也融入到市民生活中，對統治階層與普通市民的觀念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雖然教派主義並未全面或必然會造成遜尼與什葉的對立，卻反映在沙國與伊朗競逐中的部分政策上，成為衝突中需要關注的一項觀念影響因素。

於兩國競逐的國際結構下，教派主義觀念對政策產出的影響力亦能自伊朗的對外政策中分析。如同前述提到，何梅尼將自己視為泛伊斯蘭主義的領導者，而非侷限在什葉派的範圍，代表其希望能在伊斯蘭世界中獲得更大的號召力。從另一角度觀察，在穆斯林世界以遜尼派為多數，因此過分強調什葉派的身份認同對於伊朗拓展國際影響力也未能有太大助益；同時，也有學者認為伊朗與阿拉伯國家間存在不同的文化、社會及歷史背景，較難進行意識形態層面的整合（Barzegar, 2008；Litvak, 2017；Ostovar, 2017）。因此，在 Ostovar（2017）的研究中，他提到多數學者並未視伊朗於 1979 年後的政策是具有教派主義特色的，或是試圖推動支持什葉派發展的區域進程；然而，他卻提到近數十年間伊朗外交政策中的教派主義元素反而增加了。

伊朗前任精神領導人何梅尼與現任領導人哈梅內意皆不鼓勵什葉派教派主義，而是主張穆斯林社群應團結合作，這點說明了伊朗官方對教派主義的基本態度（Ostovar, 2017）。儘管如此，Ostovar（2017）認為由於 1979 年後興起的什葉派極端思想以及伊朗反君主國家的主張，伊朗還是被中東國家指控為教派主義或擴張主義，例如土耳其和部分海灣阿拉伯國家。雖然伊朗官方的態度為提倡穆斯林團結，但其區域盟友多為什葉派團體，因此伊朗也會推動支持什葉派發展的政策，例如伊朗革命衛隊將其盟友形容為一個團結的什葉派陣線，這便強化了什葉派作為特定群體的形象。

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下，以沙國為首的遜尼派及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各有其區域盟友，其中的教派分屬更加強了教派主義的既定印象。如同即使教派主義與伊朗官方態度相互矛盾，在國際環境的推動下，伊朗的外交政策也趨於具教派主義的特色，而遜尼派國家支持遜尼團體及歧視內部什葉派的政策同時也進一步深化兩教派間的分歧（Ostovar, 2017）。觀察教派主義在兩國競逐下的發展，它以實際國家政策的型態出現在國際場域，被動作為達成政治目的之途徑；此外，在競逐發展過程中，教派主義也成為主動影響思想層面的一個重要概念，雖其不能絕對主導兩國的政策輸出，然教派分屬的觀念卻已然普遍存在於社會中，成為政策考量的因素之一。

第四節、規範結構因素矛盾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透過前述討論，筆者分別闡述了教派主義「為何」會被應用於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也藉兩國對內及對外的政策輸出說明教派主義「如何」對政策制定產生影響。關於伊斯蘭教於兩國統治之重要性的討論中，教派與兩國統治正當性之密切關聯是教派主義被用於競逐中的重要動機，一方面特定的教派價值是沙國與伊朗維繫其統治權力必須維護的根本；另一方面，批評對方所屬的教派也能作為一種削弱對方統治正當性的方式。自 1979 年革命爆發至今，教派意識從一開始居於非討論焦點的地位，經教派主義政策的渲染，今日已成為足以影響政治事務的議題。在國際環境的推動以及兩國長期的相互角力下，教派主義已然成為當代中東地區所面臨的一個政治問題。

在兩國對內政策之相關探討，沙國與伊朗對其內部相異教派的歧視政策說明教派主義的概念已深入統治階層的想法。沙國什葉派與伊朗遜尼派都被其本國政府排除於權力核心之外，同時他們也被視為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一個族群。因其所屬教派與本國區域競逐對手的教派相同，統治階層質疑其對國家的忠誠度，進而對其政治權力設下諸多限制。在長期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況下，兩國的教派歧視政策正一步步加深遜尼與什葉間的分歧，而這些分歧也進一步加強兩國政府對國內相異教派的懷疑。這不僅證明了教派主義觀念的融入，也顯示出對其內部政策制定過程所具之影響力。

從兩國對外政策與教派主義之關聯的討論，可見到自 1979 年伊朗革命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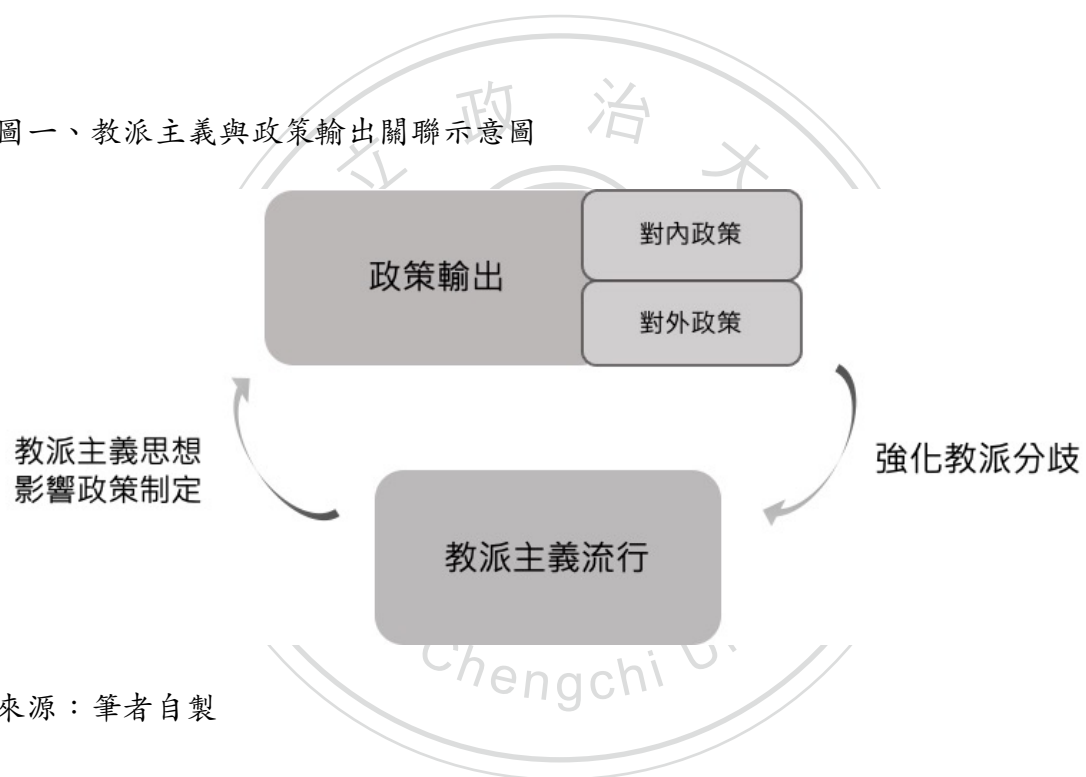
面臨伊朗輸出革命與宗教開始活躍於政治場域等壓力，沙國等遜尼派國家開始擔心什葉派力量會動搖遜尼派於區域之主導地位。作為回應，沙國積極推動瓦哈比思想，並在與伊朗間的競逐更加強調教派意識的重要性，例如構建一個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威脅形象。這不僅是為了圍堵什葉派的勢力擴張，也是為了團結遜尼派國家的力量。社群媒體中大量的教派主義言論，可以證明新興媒體已經成為國家凝聚群眾力量的新渠道，而遜尼派國家統治階層也以此方式散播教派主義的思想。

從另一角度觀察，伊朗外交政策起初不被認為是教派主義。然而，阿拉伯之春後，其外交政策卻被認為具教派主義之特色，而伊朗政策方向轉變也可以說明教派主義思想對於政策產出的影響力 (Ostovar, 2017)。基於國際環境與務實層面的考量，伊朗的重要區域盟友多與其同為什葉派，如此的教派劃分為其外交政策多添上了教派主義的色彩。在區域結構與兩國競逐的推動下，即便強調什葉派身份不利於伊朗拓展影響力，但其仍受到教派主義潮流的影響，在其對外政策上展現出更多教派主義的特徵。

本章從沙國與伊朗國內宗教與統治權力的關聯切入，探討教派成為兩國競逐中一重要議題的原因，並分析教派主義被運用於競逐中之動機。再者，筆者也藉由兩國對內及對外政策，說明教派主義如何影響雙方的政策產出，同時也成為影響兩國競逐發展的一項規範結構因素。自 1979 年起，沙國與伊朗的競逐層面日漸擴大，在區域結構與兩國政策的推動下，教派差異從單純宗教層面的爭論，演

變至摻雜政治考量的議題。教派主義可以是追求政治目的的工具或歧視政策導致的結果，也是規範結構因素中推動競逐發展的要素。因其不僅反映在政策輸出層面，也會循環成為思想層面的輸入來源（請參考圖一）。而在數十年的往復中，教派主義思想經由政策實施滲入社會，成為推動競逐發展背後之一項規範結構因素。

圖一、教派主義與政策輸出關聯示意圖



來源：筆者自製

第四章 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互動

對競逐狀態之影響

在前兩章的內容中，筆者分別檢視了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對於沙國—伊朗競逐狀態的影響；於該兩因素的範疇內，沙國與伊朗面臨不同層面的利益衝突，同時其政策輸出也加強教派主義流行，形成一個彼此強化的循環。至此，可以說明現實建構主義架構下，權力與規範結構因素各自對兩國競逐所具之影響力。然根據 Barkin (2003) 所提出的概念，不論是僅從權力或規範因素切入觀察，都無法解釋政治結構的變動；反之，通過權力與規範結構因素之交互作用，才能說明政治局勢的變遷，進而分析兩國競逐狀態之發展與變化。

於現實建構主義的框架中，權力結構會影響規範結構，造成國際關係之規範結構改變，反之亦然；在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的相互影響下，兩者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改變，故能解釋動態的國際環境變化 (Barkin, 2003)。筆者於本章將以三個重要的區域事件，分別為 1979 年伊朗革命、2003 年伊拉克戰爭與 2011 年阿拉伯之春，作為探討競逐關係變化的時間分段點。然而，該三項重大區域事件雖被列為特定時間段，但應將權力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互動視為連續的過程，而非依此三項事件區分開的三個片段。本章將依此架構檢視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之互動，以說明沙國與伊朗自 1979 年至今的競逐關係演變。可以發現，這三個事件各象徵著權力與規範結構的重大改變。1979 年伊朗革命造成雙方規範結構產生嚴重分歧與政治權力結構的初步成形；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的政治局勢推

動教派主義的成長，以及雙方陣營的權力集中化；2011 年阿拉伯之春則使多國陷入政治動盪，教派主義在此背景下再次成長，沙國與伊朗在各地的競爭集團也出現教派化的表象。最後，在此三階段權力結構因素及規範結構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沙國與伊朗的競爭集團逐漸清晰，教派主義亦有大幅成長，整體而言雙方競逐的地域擴及範圍呈現擴大趨勢。

第一節、1979 年伊朗革命對兩國競逐之推動：

雙方規範結構之重大分歧及政治權力結構之初分

1979 年伊朗革命推翻了伊朗固有政權，由帶有強烈什葉派色彩的政權取而代之，該事件為當代中東政治局勢投下一顆強而有力的震撼彈，而伊朗革命也被視為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中的關鍵事件 (Ostovar, 2016 ; Ahmadian, 2018 ; Heiden & Krijger, 2018 ; Kaddorah, 2018 ; Ghoble, 2019)。從規範結構與權力結構改變的兩個角度可以說明伊朗革命於兩國競逐之重要性，首先，就規範結構而言，沙國與伊朗在 1979 年後產生嚴重的矛盾。伊朗新政權所宣揚的意識形態，例如批評瓦哈比主義、對外輸出革命鼓勵人民推翻君主制政權等，都直接構成伊朗與沙國在規範結構層面的衝突 (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其次，何梅尼在革命後以穆斯林社群領導者的身份自居，但沙國為伊斯蘭教兩大聖城之所在地，其國家角色認同也是穆斯林社群領導人；而兩國對各自國家角色定位的重疊，也造成雙方形成角色認同衝突 (Pinault, 2010 ; Cerioli, 2018)。1979 年後，何梅尼向區

域人民宣傳其意識形態，其中批判沙國統治者、質疑沙國作為聖城守護者之正當性，以及散播革命思想鼓勵其人民推翻王室的主張都激怒了沙國政府（Ansari & Aarabi, 2019）。另一方面，沙國也向外進行反什葉及反伊朗的宣傳，針對伊朗做出教派層面的回擊。1979 年伊朗革命後沙國與伊朗在規範結構層面發生嚴重的衝突，而兩者在意識形態場域展開的競逐也可視為兩國規範結構產生重大分歧之關鍵標誌。

其次，就權力結構而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成立象徵中東地區政治權力結構的一次劇烈改變。何梅尼政權反美的意識形態使美國在中東地區原先採行的雙柱政策面臨終結，伊朗與沙國不再同時作為美國於該區域的主要盟友。而中東地區內部的國家關係也因伊朗革命後的政治變局受到衝擊，何梅尼政權積極鼓勵鄰近國家的人民發動革命推翻政府，例如輸出革命至伊拉克，並欲仿照推翻巴勒維政權的模式再次動搖海珊政權的統治（Renfrew, 1987）。不僅如此，以沙國為首的海灣君主制國家亦面臨伊朗輸出革命的壓力，何梅尼反美與反君主制國家的主張對海灣阿拉伯國家形成政權穩定的威脅。對區域國家而言，何梅尼政府的外交路線與自身國家利益嚴重衝突，因此沙國等遜尼派國家亦開始尋求團結抵禦伊朗的途徑，形成權力結構上的初步集中。同時，伊朗也支持什葉派的政治勢力，如 1982 年黎巴嫩真主黨的建立，而至今黎巴嫩真主黨仍然是伊朗在區域內的重要盟友，也是後來什葉新月的成員之一。1979 年伊朗革命造成伊朗內部權力結構重組，進而牽動區域國家之間的關係，故其所致之權力結構改變在沙國與伊朗的

競逐發展中亦富有重要的意涵。

一、權力結構對規範結構之影響：兩國規範結構出現嚴重矛盾

1979 年伊朗革命帶來伊朗國內政治權力結構的重組，其中最鮮明的特徵便是巴勒維國王時代的結束，後續經歷平行政府時期，最後由何梅尼政府接掌國家管理。不同的政治團體對於國家的基本原則、核心價值與發展方向等都會有其獨特的一套模式與主張，而在特定政治團體取得國家統治權力後，可以透過國家權力的運作貫徹甚至傳播其欲宣揚的價值。伊朗從巴勒維時期過渡到何梅尼政府時期，同樣也經歷了國家核心價值的轉變，何梅尼政府在掌握國家權力後更具有宣傳其核心價值的影響力。

何梅尼提倡的價值體系包含三項重要概念，分別是什葉派思想、反美與反以色列，以及反對君主制國家。第一，什葉派信仰無疑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的基本原則，國家對於什葉派的實踐明訂於伊朗憲法中，為其奉行的核心價值。何梅尼的宗教理念，即宗教學者的政治管理，主張應由宗教學者擔任政治管理的角色，因此在伊朗的政治結構中，神職人員也成為掌握核心權力的階層。何梅尼通過推行該理念，將伊朗打造為一個以什葉派信仰為核心的國家，對其而言這也是一個真正符合伊斯蘭的體系。從政治核心向外延伸到社會生活，什葉派信仰在國家公權力的推動下成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教派，而其影響力同時也透過政府的外交政策進一步向區域內其他什葉派地區傳播。

何梅尼政府推行的第二項價值為反美與反以色列，主張伊朗將成為帶領區域

國家對抗西方國家的領導者，同時也對抗親西方的阿拉伯國家 (Heiden & Krijger, 2018 ; Clausen, 2020)。1979 年伊朗革命爆發後，美國駐伊朗的大使館遭民眾包圍，美國的外交人員受挾持長達 444 天，為德黑蘭人質事件。此次人質危機使伊朗與美國關係趨於惡化，也是後續伊朗政府走向反美的開端。1980 年代，伊朗喊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這除了反映出伊朗拒絕向蘇聯或美國任何一方靠攏，更凸顯了伊斯蘭教之重要性，及其政府將以伊斯蘭信仰作為國家發展核心價值之決心。另外自二戰以來，以巴議題長期都是中東國家關注的焦點，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也曾數度為此開戰。伊朗何梅尼政府在以巴議題上採反對以色列的立場，同時伊朗也積極在區域內尋找與其具相同價值取向的盟友。例如，1982 年伊朗資助的黎巴嫩真主黨成立，該政黨的組織宗旨之一便是消滅以色列，而至今伊朗與黎巴嫩真主黨仍維持密切的合作關係。此外，伊朗也支持反以色列的哈馬斯，並提供其軍事援助。

何梅尼政府提倡的第三項價值為反對君主制國家，這一方面代表其對巴勒維君主制政權的批判，但在巴勒維政權覆滅後，反對君主制國家的矛頭也轉而指向其鄰近國家—海灣阿拉伯君主制國家。於伊朗革命後，沙國等海灣君主制國家除了親西方傾向受到伊朗批評，其君主制體制亦飽受詬病。根據何梅尼的追隨者指出，什葉派對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與人民相處模式的理解，是構成什葉派教派傳統的一部份，而君主制的政治結構卻與什葉派對於國家統治者的理解相互矛盾；同時，何梅尼曾表示統治者應與民同生並接受批評，然該理念卻與君主制國

家的運作截然不同 (Koven, 1978)。由於沙國王室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受到瓦哈比派的保障，伊朗一方面從教派的角度攻擊瓦哈比主義不符合真正的伊斯蘭價值，打擊其君主制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也批判沙國王室奢華的生活型態，並質疑其統治正當性與作為聖城守護者的地位 (Windecker & Sendrowicz, 2016 ; Ansari & Aarabi, 2019)。

事實上，1979 年伊朗革命後，伊朗成為奉行什葉派信仰為基本原則的國家，並不足以使沙國與伊朗的關係交惡；更精確地說，真正導致兩國在規範結構層面發生嚴重衝突，並使兩者關係逐漸惡化的關鍵是何梅尼呼籲推翻沙國君主制政權等，會危及其政治穩定的宣傳 (Ansari & Aarabi, 2019)。伊朗從瓦哈比主義與王室兩方面入手，不但批評沙國統治者本身，亦質疑其統治正當性的來源，即瓦哈比主義。為了減輕伊朗造成的壓力，沙國同樣採取教派途徑回應，而非淡化教派的重要性，這也間接成為推動日後教派主義興起的原因之一。首先，面對伊朗對瓦哈比主義的攻擊，沙國批評什葉派才是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指控什葉派為伊斯蘭教異端，以及什葉派信徒為背道者 (Heiden & Krijger, 2018 ; Gambrell, 2019 ; AlSaied, 2021)。其次，沙國更加大向外宣揚瓦哈比思想的力道，開始向全世界輸出沙國版本的基本教義派。在 1980 至 1990 年代期間，沙國在各地增設瓦哈比學校、資助清真寺等，同時積極輸出反什葉思想，與伊朗進行意識形態層面的對抗 (Wehrey et al., 2009 ; Ighani, 2016 ; Yosufi, 2016 ; AlSaied, 2021)。此外，沙國也進行電視福音佈道，利用衛星頻道宣傳遜尼派基本教義派，而這也造成印尼等地

基本教義派的流行 (Hassan, 2018 ; Ansari & Aarabi, 2019)。

因石油產業帶來的豐厚收入，沙國有雄厚的資本能和伊朗在區域甚至全世界進行意識形態的競逐，也讓教派主義的傳播更為快速 (Ansari & Aarabi, 2019)。沙國在 1979 年後針對伊朗意識形態攻擊所做出的回應，使教派議題在此之後獲得強勁的成長動力，而兩國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也不斷刺激遜尼派與什葉派群眾對於自我教派身份的審視，使教派問題的重要性在其競逐中逐漸成長。因此，從 1979 年伊朗政治變局後兩國展開意識形態競逐來看，1979 年伊朗革命可以視為兩國規範結構形成重大矛盾的轉捩點。

二、規範結構對權力結構之影響：區域政治權力結構之初分

1979 年以後，伊朗精神領導人何梅尼向區域宣傳的意識形態及其外交政策，導致伊朗與美國、沙國等國家關係惡化，進而使伊朗的國際地位面臨被孤立的危機。首先，1979 年伊朗革命之後續影響改變美國原先在中東地區推行的雙柱政策架構，伊朗不僅中斷了與美國的合作關係，德黑蘭人質危機更使伊朗與美國的關係走向惡化。另外，何梅尼反美的意識形態讓美國與伊朗的矛盾逐漸擴大，加上海灣國家與美國相對密切的合作關係，伊朗在海灣地區的國際地位也因此受到衝擊。其次，若只考慮伊朗與海灣遜尼派國家的關係，何梅尼政府的意識形態亦與其存在嚴重矛盾。如前段所述，何梅尼向外輸出反君主制的革命思想，對海灣各君主國形成直接的政治威脅，因此 1979 年後伊朗在海灣地區面臨孤立亦非出

乎意料之結果。

然而，在此國際情勢下伊朗仍堅持其外交路線，並嘗試在區域內尋找其他政治盟友。1982年第五次以阿戰爭爆發，以色列出兵黎巴嫩，是為巴勒斯坦問題的延續。隨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與以色列軍隊在黎巴嫩南部的衝突逐漸升溫，伊朗的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獲得了一大成就，即黎巴嫩真主黨的建立 (Ansari & Aarabi, 2019)。伊朗為真主黨提供軍事、經濟及意識形態層面的支持，而與真主黨的政治合作也是伊朗反以色列意識形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從後續的發展來看，真主黨至今一直扮演伊朗在區域內的忠實盟友，在區域事務上多與其站在同一陣線，也在伊朗逐步突破外交孤立的過程中產生助益。例如，有學者指出真主黨在伊朗—阿拉伯國家—以色列三方關係中的重要性，真主黨協助巴勒斯坦武裝團體軍事培訓，加強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的衝突對立，可避免伊朗在其他兩者關係穩定的情況下面臨更嚴峻的孤立局面 (Byman, 2006)。

同時，在敘利亞與伊朗的政治聯盟中，真主黨亦具關鍵性的影響力。1982年以前，敘利亞原本也擔心會受伊朗革命意識形態的衝擊，但真主黨的出現卻創造敘利亞與伊朗的共同利益。對敘利亞而言，與真主黨形成同盟可為其與以色列談判的籌碼，因此敘利亞也加入支持真主黨的一員 (Byman, 2006)。另外，伊朗、敘利亞與區域國家之關係亦有雷同之處；伊朗因強烈的意識形態面臨孤立困境，而敘利亞與伊拉克、以色列、美國的緊張關係也使伊朗與敘利亞逐漸走向彼此。基於長期與伊拉克的矛盾，敘利亞是阿拉伯國家中少數在兩伊戰爭中支持伊朗一

方的國家。雖然在此階段敘利亞與沙國等海灣國家的關係還未出現嚴重分歧，但伊朗、敘利亞和真主黨之間已開始出現政治合作動機，逐漸將三者推向更緊密的合作。

在沙國方面，自 1979 年後沙國等海灣遜尼派國家便開始面臨伊朗革命思想散播的壓力。例如緊接在伊朗革命爆發的幾個月後，沙國發生麥加禁寺圍困事件，其領導人主張推翻沙國王室政權，使其政府切身感受到伊朗革命造成的影響力 (Ansari & Aarabi, 2019)。而何梅尼除了以言語鼓勵革命，亦對沙國內部什葉派採取實際作為，刺激其對沙國政府的反抗心理。伊朗政府透過媒體向沙國什葉派宣傳反政府思想，同時也支持阿拉伯半島伊斯蘭革命組織 (Organization fo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OIRAP)。OIRAP 為沙國的地下政治組織，目標為在阿拉伯半島發動什葉派伊斯蘭革命，1980 年早期 OIRAP 也曾發行月刊，批判沙國政府對什葉派的政策。伊朗政府對於沙國內部什葉派的鼓動，或是對什葉派反抗勢力的支持，都促使沙國政府與其什葉派民眾的關係惡化，導致 1980 年代許多沙國政治運動人士被迫流亡，而這些什葉派運動遺緒也造成教派主義在沙國的持續流行 (Khan, 2019)。

在伊朗向外擴張影響力的同時，區域內擔憂伊朗威脅的其他國家也逐漸向彼此靠攏，例如 1980 到 1988 年兩伊戰爭期間，阿拉伯國家對伊拉克的支持，便能說明遜尼派國家對抗伊朗的力量集結 (Ansari & Aarabi, 2019)。伊拉克什葉派在貝克爾 (al-Bakr) 及海珊執政時期都受到政策歧視，也被政府視為國家安全的潛

在威脅，在海珊取代貝克爾總統後，對什葉派的偏見更是有增無減 (Robinson et al., 2018)。學者指出，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 (Iraqi Ba'ath) 執政時期，兩伊的地緣政治競逐就帶有強烈的教派色彩，而伊朗革命後何梅尼欲於伊拉克複製伊斯蘭革命的立場，更進一步惡化伊朗與伊拉克的關係 (Robinson et al., 2018)。

1980 年兩伊戰爭爆發，伊拉克獲得以沙國為首的海灣國家支持，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海灣君主制國家有意打壓伊朗日漸擴張的影響力。這些欲抵禦伊朗擴張的國家在兩伊戰爭中展現出的團結傾向，除了是互助陣營雛形的浮現，也代表遜尼派政權與什葉派政權的競逐因兩伊戰爭的發展進一步加劇。

另一項能象徵沙國與伊朗競逐出現權力結構劃分雛形的事件是 1981 年海灣君主制國家聯合成立的海灣合作理事會。在伊朗向外傳播革命思想的時空背景下，伊朗對與其地緣關係最為相近的海灣君主制國家，發動破壞其政權穩定的行動，其中以科威特深受其害 (Kabalan, 2019)。為了共同抵抗伊朗革命思想的壓力，1981 年沙國與五個海灣國家，分別為科威特、巴林、卡達、阿聯和阿曼，組成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另於 GCC 的框架之下，亦有半島之盾部隊作為保障其成員國不受外部軍事侵犯的機制。就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情況而言，沙國與其他享有共同利益的成員國共組 GCC，不但能防止受到伊朗與伊拉克的侵犯，也有利鞏固其於海灣地區之影響力，而伊拉克在 2003 年後也不再是 GCC 積極防禦的對象。若從現今沙國—伊朗競逐回溯到 GCC 成立之初，可以發現 GCC 架構的實現亦能說明在伊朗革命的壓力下，以沙國為首的海灣君主制國家產生政治權力

結構的靠攏，也是沙國與海灣遜尼派國家形成政治聯盟的早期雛形。

在 1979 年伊朗革命造成伊朗政局巨變之後，伊朗與沙國展開意識形態的競爭，象徵著兩國過去的合作關係變調，並在規範結構上出現重大分歧。在雙方的推動之下，何梅尼的革命思想、反君主國家等主張與沙國的反什葉宣傳在區域內快速傳播，而此次的風潮也造成日後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分歧逐漸加深。同時，伊朗在 1979 年後面臨外交孤立的困境，使其踏出尋找區域盟友的第一步，與真主黨和敘利亞基於共同價值與利益逐漸深化關係；沙國等遜尼派海灣國家則在區域事務上展現團結，GCC 的成立更說明遜尼派國家權力結構開始集中。就此階段而言，1979 年劃下沙國遜尼派與伊朗什葉派規範結構競逐的開端，也推動兩國漸漸形成權力結構集團的雛形。

第二節、2003 年伊拉克戰爭對兩國競逐之推動：

教派主義成長下雙方陣營的權力集中化

2001 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時任總統布希向「恐怖主義」宣戰，其中便包含被列為邪惡軸心國之一的伊拉克。2003 年，美國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支持恐怖主義為由，對伊拉克海珊政權開戰。在此之後，海珊政權在伊拉克的統治走向終結，後續的權力真空時期也導致伊拉克國內陷入長達多年的政治動亂。對於沙國—伊朗的競逐而言，2003 年伊拉克戰爭是繼 1979 年伊朗革命後的另一重大轉捩點，於推動競逐發展富有重要意涵，而其重要性可從以下兩

個面向檢視 (Ighani, 2016 ; Leon, 2017 ; Ahmadian, 2018 ; Kaddorah, 2018 ; Kausch, 2018)。

第一，於權力結構方面，伊拉克被移出中東強權之列，同時強化了沙國與伊朗間的競爭 (Ighani, 2016)。海珊政權的覆滅為伊朗減少了一個強勁的區域競爭對手，而在海珊政權之後接替的什葉派新政府又與伊朗有良好的關係，因此對伊朗而言，2003 年的政治變動不僅為伊朗去除一個敵人，反而還增加一個朋友。相反地，對沙國而言雖然海珊政權終結亦是消除其國家安全隱憂，但伊朗區域影響力的擴張卻是沙國不樂見的結果。隨著伊拉克戰後局勢推動教派主義的成長，遜尼派國家逐漸在 GCC 的框架之下達成更密切的合作關係，以對抗伊朗擴張帶來的威脅；而伊朗也因伊拉克政權的更迭，達到地緣政治影響力建構的重大突破。

第二，於規範結構方面，伊拉克戰爭的後續發展為教派主義帶來新一波的高峰 (Leon, 2017 ; Kaddorah, 2018 ; Gambrell, 2019)。伊拉克面臨權力真空後，其內部及外部勢力紛紛加入伊拉克的混亂局勢。他國勢力為了保障本國在伊拉克的利益開始支持分屬不同教派的政治組織，例如伊朗與伊拉克的什葉派政府交好，沙國等遜尼派國家也暗中支持伊拉克內部的遜尼派武裝勢力。對海灣國家統治者而言，他們將伊拉克的亂局視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角逐，同時也是沙國與伊朗的代理人衝突 (Robinson et al., 2018)。在內外勢力交錯的情況下，教派暴力事件不斷重演，跨教派的恐懼也在伊拉克社會逐漸蔓延，進而強化教派主義在區域內的流行。綜上所述，2003 年伊拉克戰爭對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衝擊程度之大，對沙

國與伊朗的競逐發展具關鍵性之影響。

一、權力結構對規範結構之影響：伊拉克動亂下被強化的教派主義

2003 年美國率領多國聯合部隊攻打伊拉克消滅海珊政權，伊拉克隨後陷入無政府狀態，各方勢力都希望在此混亂局勢中謀求利益。面對伊拉克政治局勢的巨變，除了內部武裝勢力的興起外，伊朗與沙國也參與了伊拉克內部的權力角逐，而外部力量的介入更加速了伊拉克教派主義的盛行 (Robinson et al., 2018)。

事實上，在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執政時期，教派主義思想的種子便已種下。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由原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分裂而出，該政黨於敘利亞亦握有政權；然伊拉克與敘利亞分支立場敵對，加上伊拉克視伊朗為敘利亞分支之區域盟友，故導致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權與伊朗關係的惡化 (Robinson et al., 2018)。海珊總統上任後，伊拉克政府對什葉派的敵意更為加深，與伊朗的關係亦趨於緊張。如 1991 年伊拉克爆發反遜尼革命後，政府對什葉派的暴力鎮壓使其累積更多對政府的不滿 (Robinson et al., 2018)。整體而言，海珊總統執政時期遜尼派與什葉派便已存在分歧，而這些內部摩擦在伊拉克陷入動亂後也成為一個易受政治團體操弄的議題。

海珊政權的消亡打破了伊拉克內部及中東地區原有的權力平衡，在伊拉克長期掌權的遜尼派失去政治權力，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什葉派力量。自伊拉克戰敗後，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教派衝突開始增多，至 2006 年，伊拉克已經陷入白熱化的教派衝突 (Yosufi, 2016 ; Robinson et al., 2018)。教派衝突的死傷人數在

2006 年達到三萬四千人，另也有 2008 年的報告搜集不同來源的數據，指出傷亡人數介於三萬四千至七十六萬人不等。雖然伊拉克教派衝突受害者的人數較模糊，但能確定的是此時期教派衝突氾濫，且學者也認為這些衝突多是受到對特定教派敵意所主導（Yosufi, 2016；Robinson et al., 2018）。

除伊拉克內部既存的教派矛盾，外部力量的加入對教派主義流行亦具推波助瀾之效果，而伊朗與沙國等海灣國家更是關鍵的外部行為者。首先，在海珊執政時期，伊朗與伊拉克的關係便已惡化。且在 2003 年以前，伊朗早已介入伊拉克政治，並嘗試影響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權的統治，例如伊朗支持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for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 SCIRI）和巴德爾組織（Badr Corps）在伊拉克的活動（Robinson et al., 2018）。前者為伊拉克什葉派伊斯蘭運動組織，成立於 1982 年，由 Mohammad Baqir al-Hakim 領導，在伊拉克國內進行推翻海珊政權的運動；後者原為隸屬於前者的軍事組織，同樣受到伊朗支持，今日已轉型為伊拉克的什葉派政黨。2003 年以後，伊朗持續借助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和巴德爾組織的力量，試圖從其國內影響伊拉克什葉派政府。與此同時，伊朗也公開支持反遜尼的武裝力量，例如 Asa'ib Ahl al-Haq，或對什葉派民兵組織提供軍事援助，並煽動伊拉克人民發動反美行動（Robinson et al., 2018）。伊朗對伊拉克什葉派的支持讓該國遜尼派擔心自身地位將被進一步孤立，伊拉克遜尼派故而逐漸形成一股反對勢力，伊朗對伊拉克內政的介入遂成為強化伊拉克內部教派分歧的推動力量。

除伊朗外，沙國在伊拉克的行動亦助長教派主義之傳播。對海灣國家的領導人而言，伊拉克戰後的政治動盪反映遜尼派與什葉派間的權力鬥爭，同時也代表遜尼派阿拉伯國家與伊朗之間的權力角逐；因此海灣遜尼派國家支持伊拉克反什葉活動，一方面抑制伊朗在海灣地區日漸擴張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降低其對海灣遜尼派國家造成的威脅（McMillan, 2006；Robinson et al., 2018）。伊拉克官方表示，自 2003 年開始有大量金流從沙國流入伊拉克；美國的伊拉克研究小組亦指出，沙國是支持遜尼派反對活動的金主國（Nasrawi, 2006）。雖然沙國政府否認對遜尼派反對勢力的金援，卻有伊拉克官員指出沙國的資金流向伊拉克遜尼派神職人員，其多以私人捐贈或天課的方式募集，再用於購買武器支持遜尼派的活動（Nasrawi, 2006）。1980 年代開始，沙國便已向外進行反什葉宣傳，強化區域遜尼派與什葉派身分的認同意識；在 2003 年伊拉克什葉派崛起後，沙國的反什葉宣傳於區域內獲得更廣泛的共鳴，也深化了遜尼與什葉之間的教派嫌隙（McMillan, 2006；Wehrey et al., 2009）。

伊拉克戰後嚴重的教派對立不僅源於海珊執政時期的歷史淵源，更與外部力量對教派組織的支持息息相關。在教派暴力盛行之下，伊拉克什葉派被形容為危險的背道者，遜尼派則被描繪為想重新奴役什葉派的群體（Robinson et al., 2018）。當教派主義的思想逐漸深入社會，且教派暴力事件不斷重演的情況下，對於特定教派的偏見與敵意將趨於強化，而教派議題也更容易被當作各方政治宣傳的號召口號。長此以往，教派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再侷限於伊拉克，其外溢效果更將教派

主義傳播到鄰近國家，甚至於整個區域。對此，學者也認為在教派衝突頻繁的背景之下，伊拉克內部形成了一個教派主義與教派暴力事件互相強化的迴圈；在沙國與伊朗對伊拉克事務的介入之下，這個循環進一步使教派主義的概念外擴至區域層面，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形成更多矛盾面向（Robinson et al., 2018）。

二、規範結構對權力結構之影響：區域政治權力結構集中化

2003 年伊拉克戰後自其國內外溢至區域層面的教派主義，為沙國與伊朗的競逐加重教派主義的色彩。規範結構因素的改變同時也推動區域權力結構的變化，對伊朗而言，2003 年海珊政權的覆滅為其帶來向外擴張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機會，也就是什葉新月的成形；對沙國等海灣遜尼派國家而言，伊拉克遜尼派政權的消亡使其需要在既有框架下深化合作關係，建立一個更緊密的遜尼派聯盟對抗伊朗構成之潛在威脅。

「什葉新月」雖然是指伊朗於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勢力分佈範圍，但這個概念最一開始卻不是由伊朗提出的。2004 年，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首次提出什葉新月的概念，並呼籲遜尼派國家應提防伊朗日漸擴張的影響力。該想法提出之際正好處於伊拉克面臨劇烈權力變動的時期，而阿卜杜拉國王以什葉新月定義伊朗的對外擴張，反映了兩個層面的意義。首先，從權力結構而言，伊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擴及伊拉克，說明伊朗突破遜尼派國家的封鎖，與其盟友漸漸在區域內形成一條地理上的連續分佈帶。其次，就規範結構而言，什葉新月將伊朗與其盟

友定義為一個意識形態導向的聯盟，對遜尼派國家來說，這將對其構成一個什葉派導向的安全威脅；另外，以教派區分政治聯盟同時也代表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日益加深的歧異。

雖「什葉新月」之名充滿了什葉派意識形態的暗示，卻不代表伊朗的外交政策是受什葉派身份主導的。實際上，什葉新月的建構具有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的雙面性，其成員與伊朗存在權力結構層面的共享利益，亦在規範結構層面具有共同價值。例如伊朗提供黎巴嫩真主黨軍事支持，不僅能拓展其地緣政治影響力，也符合雙方反以色列的意識形態。2003 年以後，教派主義的興盛加強了什葉新月在規範結構層面相近的形象，相對便可能忽略其成員間的權力合作。同時，在此背景下，教派因素會加強伊朗與伊拉克什葉派間的拉力，亦會增強伊拉克什葉派與遜尼派國家間的推力。伊朗與伊拉克什葉派政府的關係在教派主義的盛行下趨於緊密，加上權力結構因素的作用，使兩者逐漸形成密切的合作關係。從伊拉克什葉派政府的角度來看，獲得伊朗的軍事支持，是其維持政治勢力的關鍵條件；而從伊朗的角度而言，與伊拉克建立關係不但可以打破原先遜尼派國家構成的地緣政治屏障，伊拉克關鍵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日後與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的聯絡更為便捷，可謂其經營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重要據點（崔進揆，2017）。

2003 年以後中東地區的政治權力版圖變化，使伊拉克不能繼續扮演制衡伊朗權力擴張的角色，加上教派主義在區域內的盛行，也讓海灣遜尼派國家擔憂將形成一個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勢力範圍。因此，海灣遜尼派國家也在權力結構

作出相應調整，其中最關鍵的便是 GCC 合作框架在 2003 年以後產生的變化。Çetinoğlu (2010) 提到，雖然 GCC 是受到安全因素推動成立，但在 2003 年以前，因成員國間對彼此的互信基礎並不深厚，許多軍事合作事項也較難達成協議；然而，2003 年以後遜尼派國家面臨什葉新月成形的壓力，GCC 的關注焦點也轉向外部行為者（主要針對伊朗）對其成員國構成之威脅，並深化成員國間雙邊或多邊的軍事合作。

關於 GCC 在 2003 年以後轉而一致抗外的傾向，阿聯與伊朗之間的島嶼主權爭議便是其中一個例子。誠如第二章內容所述，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的主權議題隨著沙國與伊朗的競逐發展，其性質從阿聯與伊朗的雙邊爭議，上升至 GCC 與伊朗之間的土地主權爭議。Çetinoğlu (2010) 指出，該議題在 2003 年以後受到 GCC 的關注，且其成員國保持相同立場支持阿聯對島嶼的權利主張。此外，GCC 成員國也向外發展與世界強權之安全合作，如巴林、科威特、阿聯與卡達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伊斯坦堡合作倡議⁴ (Istanbu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ICI)，GCC 也試圖加強與歐盟的政治及軍事合作。最後，在其組織內部層面，GCC 成員國領導者決定深化既有框架下的軍事合作，將合作範圍擴及成員國的武器走私與安全資訊交換 (Çetinoğlu, 2010)。

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帶來的權力結構變動，與隨後蔓延於區域內的教派

⁴ 伊斯坦堡合作倡議於 2004 年提出，目的為促進全球及區域長期之安全與穩定，並涉及國防預算、軍事訓練及打擊恐怖主義等合作。<https://www.nato.int/docu/comm/2004/06-istanbul/docu-cooperation.htm>

主義思想，將伊朗與沙國陣營推向進一步的權力集中。在伊朗方面，與伊拉克什葉派政府的良好關係使其突破原先遜尼派國家形成的屏障，得以和其他區域盟友建立更便捷的聯繫，同時也讓伊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建構階段邁向什葉新月的成形；在沙國方面，面對 2003 年以後伊朗擴張影響力的壓力，遜尼派國家之間開始加強與彼此的連結，或尋求與外部力量的合作以對抗伊朗力量的崛起，且 GCC 組織內部的政治及軍事合作亦趨於深化，在其政策上顯現出更多共抗伊朗的傾向。

第三節、2011 年阿拉伯之春對兩國競逐之推動：

教派主義再成長與多國衝突表象的教派化

2010 年底，一名突尼西亞小販與當地警方發生糾紛後自焚抗議，激起該國人民對政府的不滿爆發，後演變為茉莉花革命。很快地，突尼西亞的革命浪潮席捲中東北非國家，加上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區域內大部分國家都受到革命風潮的衝擊。在革命風氣的快速傳播下，部分國家統治者被迫下台，如突尼西亞和埃及；部分國家陷入內戰，如敘利亞、利比亞及葉門；而其他零星的示威抗議活動更是在區域內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對中東北非國家統治者形成一大挑戰。

繼 2003 年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之春的到來是另一中東政治局勢的重要轉捩點，此後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也進入更激烈的階段（Cakmak, 2015；Ighani, 2016；Leon, 2017；Litvak, 2017；Ahmadian, 2018；Kaddorah, 2018；Robinson et al., 2018）。在權力結構方面，阿拉伯之春為各國帶來不同程度的政治挑戰或衝擊，沙國與伊

朗的競逐也延伸到陷入動亂的國家，如敘利亞及葉門。阿拉伯之春亦被形容為伊朗向外發展地緣政治影響力的一大機會，使其能在各國政治動盪之際，進一步鞏固或擴張什葉新月的勢力範圍 (Cakmak, 2015)。在政治權力鬆動下，內外勢力的交錯強化區域教派主義的發展，沙國與伊朗擴張至各地的競逐也逐漸出現以教派身份劃分的競爭集團。

在規範結構方面，混亂的政治局勢使教派主義的發展又達到一波新的高峰 (Cakmak, 2015 ; Leon, 2017 ; Hassan, 2018 ; Kaddorah, 2018 ; Kausch, 2018 ; Robinson et al., 2018 ; Gambrell, 2019)。伊朗利用什葉派的身份認同影響區域內的什葉派，加上革命風氣盛行，沙國東部省和巴林都出現什葉派的示威抗議活動 (Matthiesen, 2014 ; Cakmak, 2015)。此外，敘利亞陷入內戰後，沙國與伊朗支持不同政治團體進行教派動員，教派衝突頻傳強化了敘利亞的教派主義發展。如同 2003 年以後伊拉克內部教派主義外溢至區域層面的過程，教派主義在此階段的大幅成長使區域內的遜尼派與什葉派走向更深的教派分歧。

一、權力結構對規範結構之影響：多國混亂下被強化的教派主義

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對區域國家穩定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部分衝擊是人民受到革命鼓舞，勇於上街表示對既存社會問題的不滿，此類型程度相對輕微，不會危及原有政權的統治；另一部份則導致相對嚴重的後果，例如敘利亞在發生示威活動後繼而又出現更大規模的衝突，最後爆發內戰演變成多國牽涉其中的權

力角逐。阿拉伯之春造成的權力結構變動使區域原有的權力平衡受到破壞，在各方勢力逐漸達成新的權力平衡之前，教派主義卻在這個過程中再次被強化。

在討論中東地區教派主義於此階段的大幅成長前，中東北非國家的歷史發展背景也與此息息相關。在兩次世界大戰嚴重消耗英法等殖民強權的國力之前，中東北非國家在獨立前多為受殖民國家統治的地區。1916年，英國、法國及俄國秘密瓜分原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領土，簽訂了賽克斯皮科協定。該協議將中東地區以人工國界劃分，忽略了當地複雜的地理、民族、教派等條件，埋下日後中東地區諸多政治問題的根源。此外，殖民國家在統治中東地區時期，偏好少數教派的分化政策既加強了人民對於教派身份的認同意識，也是導致日後各教派間嫌隙擴大的隱憂。受到殖民遺緒的影響，混亂交錯的身份認同使中東國家在獨立後多面臨到國家認同薄弱的挑戰 (Cakmak, 2015)；到近數十年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過程中，教派身份問題被頻繁用作政治宣傳的口號，教派主義的思想也得以在區域內進一步紮根。

除了中東國家本身歷史發展過程留下的影響外，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各地帶來的政治動盪更是教派主義能於此階段大幅成長的背景因素。首先，2011年巴林爆發反政府示威活動，起初人民先是上街表達對於政治及經濟改革的訴求，但後來卻逐漸演變成伊朗與沙國的攻防戰，也渲染了教派主義在其中的作用。巴林政府指控示威活動中最大的反對團體 al-Wefaq 是和教派主義極端組織有所聯繫，並奉行外國宗教意識形態的團體 (Kaddorah, 2018)。對於人民的訴求，巴林政府

最終請求 GCC 半島之盾部隊進入國內鎮壓革命。在此次事件中，巴林政府以教派主義的指控緩解示威活動的改革壓力，不但模糊了最初的社會改革訴求，其轉移焦點至教派主義意識形態與外國勢力介入的做法，反而容易助長教派主義的發展。

Cerioli (2018) 指出，沙國自 2003 年以後對中東地區的衝突有更深的涉入，且其亦嘗試於教派主義的風潮下謀求政治利益或擴張影響力。在 2011 年巴林的反政府示威中，沙國將什葉派塑造成一個危害區域穩定的族群，以便合理化對什葉派反對者的打擊。而其積極干預巴林反政府示威的行為，也反映出遏止示威活動氛圍擴及海灣地區，以及避免巴林什葉派取得政權的考量。同時，Cerioli (2018) 也提到，沙國在巴林的抗議事件中未以泛伊斯蘭主義的角度平和解決，反而是以教派對抗的形式回應示威壓力。而伊朗對於巴林什葉派示威行動的立場則認為抗議爆發的根源是人民普遍對政府的不滿，不只限於特定什葉派群眾；同時，伊朗也譴責 GCC 派兵巴林為一種入侵行為。另外，雖巴林政府堅持伊朗支持什葉派抗議行動，伊朗卻堅定否認存在介入問題。事實上，伊朗於該事件的涉入程度較為模糊，其支持也多為聲援性質，相對缺乏其他實質作為 (Ahmadian, 2018; Cerioli, 2018)。整體而言，在巴林的抗議活動中，沙國與巴林政府表現出對什葉派較強的敵意，該對立情緒可見於其出兵決策，也造成教派分歧的深化；伊朗則多為口頭表達支持，且其傾向主張抗議是出於全體人民對現況的不滿，相比沙國較為淡化教派身份於其中的作用。

同樣地，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沙國內部亦有改革聲浪出現。其中東部省什葉派人民尋求和平改善歧視問題的途徑，遜尼派人士中也出現要求政府進行改革的聲音。對於內部湧現的改革壓力，沙國政府通過教派主義的操作分化什葉派與遜尼派的改革力量，一方面避免反對聲浪過大影響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卻也強化了教派主義的發展（Matthiesen, 2014；Wehrey, 2014；Khan, 2019）。此外，敘利亞則是另一個國內教派主義因區域混亂局勢而助長的國家。一開始敘利亞人民的抗議主要是針對政府治理問題及改善經濟條件等訴求，但阿薩德政府以暴力方式回應和平抗議，導致衝突愈發擴大演變成內戰。為鞏固其政權，阿薩德政府指控示威者為推動教派主義的伊斯蘭主義者，並強調少數教派不能生活在遜尼派的統治之下，強化少數阿拉維派的恐懼。加上沙國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競爭擴及敘利亞，並在當地持續支持宣傳教派主義的武裝勢力，導致敘利亞內部衝突的教派主義色彩趨於濃厚（Robinson et al., 2018）。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激起中東北非地區的革命浪潮，各地區紛紛面臨政治權力結構的挑戰或衝擊。在上述的案例中，巴林、沙國與敘利亞都出現以教派角度回應，或強調教派矛盾以維護政權穩定的模式。就各國內部而言，當教派議題模糊社會改革訴求，不但會對改革進程造成阻礙，也會加強教派間的分歧；就區域層面而言，教派主義在特定國家流行的外溢效果會使其傳播至整個區域，而區域教派主義也會反向影響各國的教派主義發展。而在 2011 年革命浪潮的時空背景下，教派主義也隨著上述多國衝突的爆發達到新的發展階段。

二、規範結構對權力結構之影響：區域衝突表象的教派化

在區域教派主義盛行下，沙國與伊朗雙方逐漸形成兩大壁壘分明的競爭集團，同時教派身份成為最鮮明的標誌。對沙國而言，伊朗在擴張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一個以什葉派為中心的政治同盟，而沙國也致力於聯合其他遜尼派國家共同對抗伊朗在區域內的發展。隨著阿拉伯之春造成區域多國陷入政治動盪，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涉入他國的權力鬥爭，而兩國也在其中運用教派主義的意識形態，造成區域衝突有更強烈的教派化表象，形成界限清晰的遜尼派與什葉派對抗團體。

自 2003 年伊朗與沙國的勢力進入伊拉克後，其競逐版圖遂擴及該地，2011 年以後兩國的競逐範圍更延伸到敘利亞與葉門。如果將伊朗影響力延伸至伊拉克定義為什葉新月的成形，則 2011 年以後的階段，沙國等海灣遜尼派國家將更擔心什葉新月的影響範圍從新月擴大為滿月；例如 2014 年 9 月，胡賽組織佔領葉門首都沙那就被沙國視為伊朗勢力擴及其南部邊界的象徵 (Cakmak, 2015; Litvak, 2017)。此階段教派主義被頻繁使用於教派動員，致其重要性再次提升，進而通過兩國在敘利亞及葉門的衝突，也可以說明雙方的競逐漸漸出現界線趨於分明的教派競爭集團。

首先，兩者在敘利亞的代理人衝突廣泛使用教派主義作為凝聚政治及軍事權力的途徑。除了阿薩德政府利用教派恐懼穩固政權以外，伊朗也以支持什葉派聖戰等具教派意涵的口號，呼籲黎巴嫩、伊拉克等地的戰士前往敘利亞支持阿薩德

政府軍；此外，伊朗的精神領導人也允許神職人員頒布教令，將什葉派武裝團體在敘利亞的行動視為符合宗教義務的行為（Robinson et al., 2018）。同時，黎巴嫩真主黨也在敘利亞的動盪中支持阿薩德政權。另一方面，沙國的遜尼派神職人員也以反什葉以及反阿拉維派的主張，號召遜尼派投入敘利亞戰事。沙國一開始支持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 FSA），該組織的教派色彩相對較淡；後隨著戰事趨於激烈，沙國也開始支持其他更具教派主義傾向的基本教義派團體，如伊斯蘭陣線（Islamic Front）和伊斯蘭軍（Jaish al-Islam）（Robinson et al., 2018）。在兩國的教派動員下，敘利亞的戰亂從和平示威逐漸變調，演變成遜尼派與什葉派各自以教派號召支持者的衝突。然而回顧衝突爆發初期，教派差異並非造成矛盾的主因，但卻在雙方團體持續操作教派議題動員支持者以後，漸成為足以影響各國政府作為的因素。

其次，葉門內戰亦能說明教派主義的流行如何造成沙國與伊朗競爭集團的教派化。2011年葉門爆發反政府示威時，沙國便已有介入，但當時主要是擔心抗議活動延燒到海灣地區，影響區域政治穩定。隨著葉門內部衝突升溫，該地區的發展也牽動沙國與伊朗分別涉入其中。沙國將胡賽組織視為伊朗的代理人，因此與哈迪總統共同對抗胡賽組織，就等同與伊朗進行意識形態的對抗（Cerioli, 2018）。沙國的主張反映其將胡賽組織與伊朗視為一個共同的什葉派聯盟，而如同應對巴林反政府示威的模式，沙國在葉門也以教派角度切入，將其視為對抗伊朗什葉派力量的正當介入。在教派主義的操作下，教派議題再次成為可被用於動員支持者

的口號，且因沙國長期無差別地將宰德派的胡賽組織歸類於與伊朗相同的什葉派，最終反胡賽組織的團體中也出現將兩者視為相同的案例，說明沙國塑造胡賽組織與伊朗一體化的策略是奏效的（Cerioli, 2018）。

然而，伊朗政府則堅持否認對葉門內戰的軍事介入，亦有學者指出將胡賽組織視為伊朗的代理人是不準確的說法（Ahmadian, 2018；Cerioli, 2018）。與沙國直接以軍事介入葉門內戰不同，伊朗雖與胡賽組織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聯繫，但學者認為其多提供精神與言詞層面的支持，且胡賽組織有其本身欲推動的區域進程，因此不能單純將胡賽組織視為伊朗在葉門內戰的代理人（Cerioli, 2018）。即便如此，沙國與伊朗延伸到葉門的競逐仍存在明顯的教派分界線，可分成支持哈迪總統的沙國遜尼派，與支持胡賽組織的伊朗與黎巴嫩真主黨什葉派（Kaddorah, 2018）。雖然葉門內戰不被認為是因教派分歧而生的衝突，但在區域教派主義的作用下，介入的團體仍出現明顯的教派身份分別。這一方面反映中東地區長期以來，在教派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地緣政治勢力劃分；另一方面則顯示沙國與伊朗雙方的教派競爭集團已隨著區域衝突的爆發擴張到他國。

在 2011 年及後續各國發生的衝突中，沙國將伊朗及其盟友形塑成一個什葉派導向的政治同盟，並聯合其他遜尼派國家與之對抗，逐漸形成兩大清晰的教派競爭集團。雖然教派身份仍不足以主導沙國與伊朗的外交決策，卻已成為能影響其作為的因素。因此，如同兩國在敘利亞的教派動員，種種的教派主義作為都加重了沙國—伊朗競逐的教派主義傾向，且遜尼與什葉派的競爭集團也隨著區域衝

突的爆發擴大到其他地區。

第四節、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互動對兩國競逐之推動

藉由以上三項對區域政治局勢帶來重大轉變的事件，可以在沙國與伊朗的競逐中挑出三個具象徵意義的時間點，檢視兩國競逐的發展進程（如表二）。第一階段為 1979 年的伊朗革命，其後何梅尼政府革命思想的傳播造成伊朗與沙國的關係趨於緊張，而沙國則是輸出反什葉派的瓦哈比主義作為回應，可視為兩國競逐下規範結構矛盾的開端。同時，伊朗面臨的外交困境與何梅尼意識形態散播的壓力也分別推動伊朗及沙國等遜尼派國家政治權力開始聚攏，伊朗向外尋找區域盟友，與真主黨及敘利亞逐漸深化關係；以沙國為核心的海灣遜尼派國家則是組成 GCC，以對抗在區域內鼓吹革命的伊朗。此階段伊朗與沙國在權力結構上發生的轉變，可以視為雙方形成權力結構競逐集團的雛形。

第二階段為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海珊政權崩潰後沙國與伊朗都介入了伊拉克戰後的政治動盪，兩國在伊拉克分別支持不同的教派武裝團體，不但強化了伊拉克內部的教派主義發展，且其外溢效果亦使區域內的教派主義有所成長。此階段伊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突破封鎖擴及伊拉克，而這也被遜尼派國家當作什葉新月成形的警訊。隨著教派主義的成長，對遜尼派國家而言，伊朗與其政治同盟作為一個什葉派威脅的形象趨於清晰。而遜尼派國家在此階段也出現進一步的權

力集中，例如 GCC 內部開始深化合作，展現共同對抗伊朗的傾向。

第三階段為 2011 年以後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該事件造成中東地區多國陷入動亂，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遂從伊拉克延伸到敘利亞及葉門等地。對於區域國家發生的政治衝突，各國政府通過教派途徑的解決方式強化了革命後的教派主義風潮，如巴林政府、沙國與敘利亞阿薩德政府操作教派議題維繫政權穩定的做法。同時，隨著伊朗與沙國介入他國衝突，如兩者分別支持敘利亞不同的教派主義武裝勢力，以及沙國在葉門內戰將伊朗及其政治同盟塑造成一個共同的什葉派威脅，都使區域衝突浮現逐漸清晰化的教派對抗集團。

從 1979 年伊朗革命起，權力與規範結構的交互作用使沙國與伊朗的競逐範圍呈擴大趨勢。受教派主義塑造的教派政治同盟形象影響，雙方權力結構逐漸集中化。沙國等海灣遜尼派國家形成遜尼派政治同盟，並在區域衝突中與伊朗的什葉派新月展開競爭。反之，教派主義被反覆運用於衝突中的教派動員，同時兩國支持教派主義武裝組織的做法也助長了教派主義的盛行。然而，雖然雙方競爭集團具教派化的表象，教派卻仍然不是主導兩者決策的絕對因素，僅是對推動競逐具影響力的因素之一。對於教派主義的作用，Robinson (2018) 提到教派衝突持續的時間越長，教派議題便越可能轉而具有激化衝突的能力；Lynch (2013) 也指出，當憎恨被認為是可控的意識形態工具，其自我延續與內化的能力卻往往被忽略。最後，觀察 1979 年以後的三個階段，可以發現權力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交互作用使權力競逐與教派主義的影響範圍逐步擴張，同時也推動沙國與伊朗的競逐

從雙邊關係演變為多邊關係。

表二、沙國與伊朗競逐三階段的發展

階段	權力結構對規範結構之影響/ 規範結構對權力結構之影響	說明
1979年伊朗革命	兩國規範結構出現嚴重矛盾	伊朗革命意識形態的輸出與沙國的反什葉宣傳，表現規範結構層面之矛盾。1979年後，伊朗與真主黨、敘利亞逐漸深化合作，海灣遜尼派國家組成GCC，反映雙方競爭集團之雛形。
	區域政治權力結構之初分	
2003年伊拉克戰爭	伊拉克內部動亂下被強化的教派主義	沙國與伊朗介入伊拉克戰事，教派暴力事件頻發推動教派主義成長。對應什葉新月成形，GCC深化內部合作，展現共抗伊朗之傾向。
	區域政治權力結構集中化	
2011年阿拉伯之春	區域多國混亂下被強化的教派主義	兩國競逐深入他國衝突，其教派動員再次助長教派主義成長。在教派主義作用下，各地衝突也出現趨於明顯的兩大教派競爭集團。
	區域衝突表象的教派化	

來源：筆者整理



第五章 結論

本文將推動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發展的因素拆分為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分別探討，其競逐架構自 1979 年伊朗革命後逐漸發展，兩國發生衝突的面向亦日趨複雜。藉由個別檢視不同因素對競逐之作用，有助於以更全面的視角理解兩國的競逐成因，對沙國與伊朗的關係發展也能有較完整的認識。

在權力結構因素影響力之相關討論，筆者將沙國與伊朗於權力結構因素的衝突面向分為三項主要議題討論，分別為國家安全、經濟資源競爭，與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建構。在國家安全的問題探討中，沙國將 JCPOA 的簽訂視為不利於其地緣政治影響力保障之結果，從而得知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維繫也被沙國視為與其安全層面相關的國家利益。另外，由於石油產業之發展關係到沙國與伊朗的經濟命脈，兩國的地緣政治競逐也會延伸到石油產業相關議題。例如兩國於葉門內戰的競逐便與胡賽組織對沙國產油設施發動攻擊的事件具關聯性，說明兩者於經濟面向的衝突亦可能是受到地緣政治競逐所驅動。最後，在沙國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競爭中，兩國各以 GCC 和什葉新月作為核心框架，並與其中成員合作以便在區域內鞏固其政治聯盟的影響力。觀察各項權力結構因素對兩國競逐之影響，可發現其以地緣政治競逐為主要脈絡，並延伸到與其他議題相關的利益衝突，進而構成雙方在權力結構因素下複雜的矛盾面向。

針對規範結構因素對競逐作用之討論，分別從兩國統治權力與教派的關聯性分析教派主義被運用於競逐之動機，說明教派議題具重要性之原因；亦從兩國的

對內及對外政策檢視教派主義對國家行為之影響力，說明其作用如何具體反映在政策產出上。以沙國為例，瓦哈比主義與王室的相互依存關係即為教派重要性之根源。在 1979 年後伊朗輸出革命思想的壓力下，沙國以擴大向外宣傳瓦哈比思想的力度作為與伊朗的對抗方式，進而凸顯遜尼派與什葉派的身份分歧。在教派主義的影響下，沙國政府將其國內什葉派視為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對外也將伊朗視為什葉派威脅的核心。據此，沙國在國內以歧視政策防止什葉派的政治權力取得；對外也以塑造伊朗與其盟友為什葉派威脅的形象，拉攏遜尼派國家的團結，而後逐漸浮現可以教派區分的競爭集團輪廓。同時，教派政策又會再次加深對另一教派的偏見，並重複反映於政策產出。在此過程的推導下，可以看到教派主義的發展與政策輸出之間浮現一個相互強化的循環；在教派主義傾向的政策推動下，教派分歧逐漸深化，而當教派主義的概念普遍存在於國家及區域內，該思想也會影響教派政策再次產出。藉由教派主義的討論，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競逐關係之影響力趨於清晰，並可解釋教派主義對其關係發展之作用。

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互動則可解釋沙國—伊朗競逐狀態自 1979 年後的演變，並將此過程依 1979 年伊朗革命、2003 年伊拉克戰爭，與 2011 年阿拉伯之春進行劃分。在各個階段分別以權力結構對規範結構之影響，及其反向的影響模式，說明競逐於該階段產生的關鍵轉變。綜合三個階段來看，三次的區域事件都造成區域權力結構的劇烈變動，依次是伊朗巴勒維政權、伊拉克海珊政權的覆滅及多個中東北非國家陷入混亂的後果。1979 年後沙國與伊朗出現規範

結構之嚴重分歧，2003 年及 2011 年後兩國也在混亂區域推動教派動員，皆促使教派主義逐漸成長與強化。同時，教派主義受到強化後，亦會對權力結構產生影響，使沙國與伊朗雙方盟友的權力結構出現趨於集中的現象。沙國方面形成一個以 GCC 為核心的遜尼派國家聯盟，伊朗方面則以什葉新月成員作為其區域競逐的重要政治盟友，並以此架構介入區域多國的政治發展。在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權力結構因素在三個階段中顯現權力集中化的趨勢；規範結構因素則顯現教派主義逐漸的深化。整體而言，自 1979 年後沙國與伊朗的競逐擴及範圍與教派主義的影響力皆有所擴大，其競逐也從雙邊的矛盾逐步演變為涵蓋區域多國的多邊關係。

藉由上述討論，關於沙國與伊朗的競逐關係可以發現兩項較為重要的特點。首先，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與伊朗之競逐皆具影響力，但兩者會以不同形式產生作用，故兩項因素需同時考量。然而，就一般情況而言，權力結構因素的矛盾與規範結構因素相比之下，較容易顯現或被列舉，這也導致規範結構因素的影響力相對容易受到忽略。儘管如此，規範結構因素的作用仍會反映在國家對內及對外政策之產出，說明其亦具有影響力，故可證明權力及規範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關於兩項因素不同的作用形式，在權力結構因素方面，地緣政治考量形成兩國權力競逐的主要脈絡，並向外衍生於其他議題的衝突；在規範結構方面，教派主義則是透過政策產出與思想輸入的循環，加強兩國於規範結構層面的分歧，同時也會影響實際的國家政策施行。

其次，除了兩因素個別對競逐造成之影響，透過兩因素互動的討論也可發現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特性，並於持續的交互作用下推動兩國的競逐漸漸擴大。同時，在其逐漸發展的過程中，權力結構因素與規範結構因素會相互強化；例如在 2003 年及 2011 年以後兩國的區域衝突中，以教派動員支持者的可行性可證明教派主義的強化，而兩國逐漸形成具教派差異的兩大團體則可說明權力結構的集中。在沙國與伊朗的雙邊關係中，權力結構與規範結構的矛盾在彼此交互作用下共同推動競逐朝擴大的方向發展，且兩因素互動下產生之效應多為不可控的。

根據上述兩點研究發現，由於權力及規範結構因素對沙國—伊朗競逐皆具影響力，故探討此議題時兩項因素皆不能忽略。若偏重權力結構因素，可能忽略濫用教派主義存在之潛在風險，因特定概念在受到持續推廣後也可能產生實質影響，進而成為推動衝突發生的因素之一；反之，若過於強調規範結構因素之作用，便無法完整考量兩國政策背後實際利益之考量，也可能無形中強化教派分歧的概念。因此，筆者認為沙國與伊朗在其競逐過程中，應謹慎審視以教派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工具之風險，並減少對教派身份的強調。如此一來，可防止雙方在區域內的教派競逐集團持續擴大，從而加劇區域不穩定性；同時亦可避免激化遜尼派與什葉派國家之衝突，有利於推動跨教派團體間良性關係的發展。

參考文獻

中文期刊

崔進揆 (2017)。衝出封鎖線？伊朗與「什葉新月」勢力之建構。《歐亞研究》，1，31-40。

陳立樵 (2021)。2021 年伊朗與中國大陸簽署合作協議的觀察及歷史反思。《展望與探索》，19(5)，21-28。

英文文獻

Adib-Moghaddam, Arshin. (2021). *What is Ira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ive Musical Pieces*.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hmadian, Hassan. (2018). Iran and Saudi Arabia in the Age of Trump. *Survival*, 60(2), 133-150.

Aljabri, Maisa. (2017). *Gulf Security: Peninsula Shield Force and Iran*. Thi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ference.

Ansari, Ali, & Aarabi, Kasra. (2019). *Ideology and Iran's Revolution: How 1979 Changed the world?* 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

Ayoob, Mohammed. (2015). The Iranian Nuclear Deal: Long-Term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Insight Turkey*, 17(3), 41-48.

Barzegar, Kayhan. (2008). Iran and The Shiite Crescent: Myths and Realities.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5(1), 87-99.

- Barkin, J. Samuel. (2003).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5(3), 325-342.
- Beblawi, Hazem. (1987). The Rentier State in the Arab World. *Arab Studies Quarterly*, 9(4), 383-398.
- Beydoun, Khaled A., &Zahawi, Hamada D. (2016). Divesting From Sectarianism: Reimagining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the Arab Gulf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9(2), 47-64.
- Bishara, Azmi. (2018). Ta'ifah, Sect and Sectarianism: from the Word and its Changing Implications to the Analytical Sociological Term. *AlMuntaqa*, 1(2), 53-67.
- Brew, Gregory. (2020). COVID-19 and the Oil Price Crash: Twin Crises Impacting Saudi-Iran Relations. *IJI Commentaries*, 20(35), 1-6.
- Cakmak, Cenap. (2015).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Shiite Crescent: Does ongoing change. serve Iranian interests? *The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nal Affairs*, 13(2), 52-63.
- Ceroli, Luíza Gimenez. (2018). Roles and International Behaviour: Saudi–Iranian Rivalry in Bahrain’s and Yemen’s Arab Spring. *Contexto Internacional*, 40(2), 295-317.
- Çetinoğlu, Nur. (2010).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after U.S. led Invasion of Iraq: Toward a Security Community? *Uluslararası Hukuk ve Politika*, 6(24), 91-114.

- Clausen, Maria-Louise. (2020). *Iran's Successful Transnational Network: Iranian foreign policy utilizes partners*.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Even, S., &Guzansky, Y. (2019). *Saudi Arabia and the Oil Prices Challenge*. (INSS Insight No. 1125).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 Faramarzi, Scheherezade. (2018). *Iran's Sunnis Resist Extremism, but for How Long?* Atlantic Council South Asia Center, 1-10.
- Fattouh, Bassam. (2021). *Saudi Oil Polic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ra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 FIDH, & Ligue de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 en Iran. (2003).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Iran*. FIDH-LDDHI.
- Ghoble, Vrushal T. (2019). Saudi Arabia-Iran Contention and the Role of Foreign Actors. *Strategic Analysis*, 43(1), 42-53.
- Guzansky, Y., Shavit, E., &Shine, S. (2019). *The Attack on the Saudi Oil Facilities: A New Level of Iranian Audacity*. (INSS Insight No. 1214).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 Haddad, Fanar. (2011). *Sectarianism in Iraq: 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ggman, Bertil. (1998). Rudolf Kjellén and modern Swedish geopolitics. *Geopolitics*, 3(2), 99-112.

- Haidar, Ribale Sleiman. (2018). *Saudi Arabia and Iran: Beyond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LSE Middle East Centre.
- Heiden, Patrick van der, & Krijger, Alex. (2018).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Atlantisch Perspectief*, 42(2). 11-15.
- Homayounvash, Mohammad. (2017). *Iran and the Nuclear Question: History and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England: Routledge.
- Ighani, H. (2016). *Managing the Saudi-Iran Rivalr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Jones, Toby. (2007). Saudi Arabia's Not so New Anti-Shi'ism. *Middle East Report*, 242, 29-32.
- Juneau, Thomas. (2016). Iran's policy towards the Houthis in Yemen: a limited return on a modes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3), 647-663.
- Kabalan, Marwan. (2021). The Al-Ula GCC Summit: An End to Gulf Rivalry or Just Another Truce? *Insight Turkey*, 23(1), 51-59.
- Kaddorah, Emad Y. (2018). The Regional Geo-sectarian Contest over the Gulf. *Insight Turkey*, 20(2), 21-32.
- Kausch, Kristina. (2018). Identity Politics and Regional Order in the Leva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5(60), 21-29.
- Khalid, Iram, & Hashmi, R. Saeed. (2020). Iranian Nuclear Deal: Future Persp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Pakistan Vision*, 15(1), 16-39.

- Khan, Zeba. (2019). Sectarianization of Identit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1(1), 114-141.
- Leon, Bernardino. (2017). Reducing Middle Eastern Sectarianism. *Horiz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9, 178-183.
- Litvak, Meir. (2017). Iran and Saudi Arabia: Religious and Strategic Rivalry. *Saudi Arabia, the Gulf, and the New Regional Landscape*. (pp. 49-54).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 Mabon, Simon. (2017). Review: Saudi Arabia and Iran: Friends, Rivals or Foes in Geopolitical Flux. *Bustan: The Middle East Book Review*, 8(1), 38-53.
- Majidiyar, A. Khalid. (2013). Saudi Arabia's Forgotten Shi'ite Spring.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5, 1-8.
- Mason, Robert. (2014). *Foreign Policy in Iran and Saudi Arabia: Econom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I. B. Tauris & Company
- Matthiesen, Toby. (2014). The Local and the Transnational in the Arab Uprisings: The Protests in Saudi Arabia's Eastern Province. In M. Seikaly & K. Mattar (Eds.), *The Silent Revolution: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Gulf States* (pp. 105-143). Germany: Gerlach Press.
- Mattis, Aaron. (2010). Oil Sheik-Down: Saudi Arabia's Struggle to Contain Ira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2(1), 10-11.
- McMillan, Joseph. (2006). *Saudi Arabia and Iraq Oil, Religion, and an Enduring Rivalry*. (pp. 1-16). US Institute of Peace.

- Meijer, Roel. (2016). Review: Citizenship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 Journal*, 70(4), 667-673.
- Neo, Ric. (2020). Religious securitisation and institutionalised sectarianism in Saudi Arabia. *Critical Studies on Security*, 8(3), 203-222.
- Nevo, Joseph. (1998).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4(3), 34-53.
- Ostovar, Afshon. (2016). *Sectarian Dilemmas in Iranian Foreign Policy: When Strategy and Identity Politics Collid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Ostovar, Afshon. (2017). Sectarianism and Iranian foreign policy. In F. Wehrey (Eds.), *Beyond Sunni and Shia: 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pp. 87-111).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sha, A. K. (2016). Saudi Arabia and the Iranian Nuclear Deal.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3(4), 1-18.
- Pinault, David. (2010). Sunni-Shia Sectarianism and Competition for the Leadership of Global Islam. *Tikkun*, 25(1), 45-47.
- Potter, Lawrence G. (2015). Sec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Great Decisions*, 29-40.
- Renfrew, Nita M. (1987). Who Started the War? *Foreign Policy*, 66, 98-108.
- Rezaei, Farhad. (2018). Iran's Nuclear Agreement: The Three Specific Clusters of Concerns. *Insight Turkey*, 20(2), 167-199.

- Robinson, H. M., Connable, B., Thaler, D. E., & Scotten, A. G. (2018). *Sec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US: RAND Corporation.
- Saab, Bilal Y. (2018). *Beyond the Proxy Powder Keg: The Specter of War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Middle East Institute.
- Sharifi-Yazdi, Farzad Cyrus. (2015). *Arab-Iranian rivalry in the Persian Gulf: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England: I.B.Tauris.
- Siegel, Alexandra. (2015). *Sectarian Twitter wars: Sunni-Shia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Seznec, Jean-Francois. (2015). *Crude Oil for Natural Gas Prospects for Iran-Saudi Reconciliation*. Atlantic Council.
- Teitelbaum, Joshua. (2016). *Domest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Escalated Saudi-Iran Conflict* (No.324).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 Valbjørn, Morten. (2020). Sectarian identity politics and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first post-Arab Uprisings decade— from 'whether' to 'how,' 'where' 'when' and for 'whom'. *POMEPS Studies*, 38, 18-23.
- Watanabe, Lisa. (2014). Testing times for Saudi Arabia. *CSS Analyses in Security Policy*, 153, 1-4.

- Wehrey, F., Karasik, T. W., Nader, A., Ghez, J., Hansell, L., Guffey, R. A. (Eds.). (2009). Sectarianism and Ideology in the Saudi-Iranian Relationship. In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pp. 11-43). Santa Monica, US: RAND Corporation.
- Wehrey, Frederic. (2013). *The forgotten uprisings in eastern Saudi Arab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Wehrey, Frederic. (Ed.). (2014). Loyalties Under Fire: The Saudi Shi'a in the Shadow of Iraq. In *Sectarian Politics in the Gulf: From the Iraq War to the Arab Uprisings* (pp.105-121). New York, U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ndecker, Gidon, &Sendrowicz, Peter. (2015). Cooperation Among Antagonist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ulf States and Iran. *Kas International Reports*, 5, 73-94.
- Windecker, Gidon, &Sendrowicz, Peter. (2016). Cold War in the Gulf. *Demographic Change: A Fateful Challenge*. (pp. 80-95).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 Yosufi, Abdul Basir. (2016). The Rise and Consolidation of Islamic State 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Sectarian Conflict. *Connections*, 15(4), 91-110.

網路資料

- AlSaied, Najat. (2021). *Sectarianism and ideology: The cases of Iran and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 Institute.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sectarianism-and-ideology-cases-iran-and-saudi-arabia>

- Aman, Fatemeh. (2016). *Iran's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its Sunni minority*.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irans-uneasy-relationship-its-sunni-minority>
- Asadzade, Peyman. (2018). *Sunnis in Iran: an alternative view*. Atlantic Council.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iransource/sunnis-in-iran-an-alternate-view/>
- Byman, Daniel L. (2006). *Syria and Iran: What's Behind the Enduring Alliance?*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syria-and-iran-whats-behind-the-enduring-alliance/>
- Gambrell, Jon. (2019). *Iran's revolution bridged sectarian rift before deepening it*. AP News. <https://apnews.com/article/syria-ap-top-news-international-news-iraq-iran-revolution-anniversary-b303be00a1434be09f1b377679890ced>
- Hassan, Hassan. (2018). *The Eclipse of Sectarianism*.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8/10/end-sectarian-violence-middle-east/573580/>
- Kabalan, Marwan J. (2019). *Middle East Sectarianism: A Symptom to a Cause*.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middle-east-sectarianism-a-symptom-to-a-cause/>
- Koven, Ronald. (1978). *Moslem Faction Opposes Monarchy*.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78/11/12/moslem-faction-opposes-monarchy/34083b50-ad87-431d-ae83-54474ea48be9/>

Lumsden, Andrew. (2019). *Myth vs. Fact: Iran's Sunni Muslims*. American Iranian Council. <http://www.us-iran.org/resources/2019/10/16/myth-vs-fact-irans-sunni-muslims>

Lynch, Marc. (2013). *The Entrepreneurs of Cynical Sectarianism: Why the Middle East's Identity Conflicts Go Way Beyond the Sunni-Shiite Divide*.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3/11/13/the-entrepreneurs-of-cynical-sectarianism/>

Nasrawi, Salah. (2006). *Saudis reportedly funding insurgents*. The Seattle Times. <https://www.seattletimes.com/nation-world/saudis-reportedly-funding-insurgents/>

Reuters staff. (2018). *If Iran can't export oil from Gulf, no other country can, Iran's president say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oil-iran-idUSKBN1O30MI>

